

文化的先进性与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

□ 李宗桂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当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的论断, 揭示了先进文化建设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与中国先进文化的生存发展联系起来, 从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昭示了党的发展方向, 揭示了党的先进性质; 中国先进文化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时期的中国先进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先进文化; 文化的先进性与建设先进文化的执政党密不可分; 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 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质和发展方向; 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 必须坚持文化的民族性, 充分重视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特色, 才能坚持中国文化的先进性, 实现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

[关键词] 先进文化 文化建设 基本目标 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2000) 08- 0005- 05

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 是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这个伟大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 是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质言之, 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而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就有必要认真领会、积极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是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的思想。

江泽民同志指出, 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自身。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

能够始终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 能够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就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江泽民同志的这些论断, 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 提出了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党的工作的战略方向和目标, 丰富和发展了新时期的党建理论。作为思想文化研究工作者, 我们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的观点,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党

的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宣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先进文化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从“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高度,揭示先进文化建设对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与中国先进文化的生存、发展联系起来,昭示了党的发展方向。同时,从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这较之过去着重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来揭示党的先进性质,更为全面、深刻。

既然要谈“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当对何谓“中国的先进文化”作一简要的说明。大致说来,所谓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反映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的文化基本精神,是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反映着中华民族发展的正确方向,反映出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一致,代表并昭示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从文化的民族性的一面来看,它应当体现中华民族世代相继、前后一贯的奋进精神,具有超越时代、地域、阶级的特点,反映的是民族文化中具有中国特质的普遍性的一面,以及作为人类文化重要构成的、表现人类共性的一面;从文化的时代性的一面来看,它应当体现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具有对旧时代、旧文化的较强的超越性,以及对新的时代的呼唤和展望;从文化的世界性的一面来看,它应当能够呼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声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类文明前进的脚步,使得中华民族文化融汇进世界文化的发展大潮之中。在今天,所谓中国的先进文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先进文化,是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满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而又融贯当代世界文明的基本精神的现代新型文化。

文化的先进性与建设先进文化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密不可分。回顾中国共产党将近80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那天起,就自觉地与先进文化联系在一起,推动着先进文化

的进步,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早期,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唤起工农千百万”,不屈不挠地反对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诞生而坚韧奋斗。

在20年代初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战中,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他尖锐地指出:“宗法社会及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所以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①他还指出:“仁义道德说之真正的平民化及科学文明之真正的社会化时,就是一切旧社会的末日”,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现代新型文化,“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祸,方能正当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②显然,瞿秋白关于文化问题的论述,实质上是要破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压迫,而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在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双重压迫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谓新型文化、所谓先进文化,从理论形态和思想实质来说,便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此,毛泽东有系统而深刻的论述。他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重构观,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模式。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的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发扬光大。”^③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指出,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奋斗的根本目的,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中国共产党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因

此,“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④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⑤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⑥毛泽东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反映了新民主主义时代的时代精神,昭示了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发展的精神方向,从文化建设的层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

1956年以后,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从那时到现在,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在实践中逐渐清晰、完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显然,八大的思想和三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四化”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力图忠实地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忠实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忠实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本质特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共八大和三届全国人大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的理论观点,但其表述已有了这个意思。这些表述阐明了当时条件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价值目标,即: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以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共八大和三届全国人大确立的文化建设目标,没有能够得到顺利的贯彻实施,而被十年浩劫所中断。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

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为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的创建开辟了道路。1982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大明确指出,经济、政治方面的特征不足以涵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⑦这是从思想理论建设的高度,明确提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还不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的全面表述。经过数年的改革开放实践,1986年产生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⑧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目标,是“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⑨1987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最终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些理论观点,不仅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的思想,而且已经蕴涵着“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这样一个创造性提炼的思想萌芽。

199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这些基本要求,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了文化服务的对象,确定了繁

荣文化的方针,科学地处理了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创建中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些基本要求,正是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体系的价值目标。只要我们牢牢把握这些基本要求,按照这些基本要求去进行文化建设,就是把握着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就能够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价值体系的建设。

1996年10月,根据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在充分肯定市场经济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明确指出了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对精神生活的影响,强调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规范。《决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于此前诸多有关文件的内容,是明确提出了要把研究如何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作为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来认真解决。《决议》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要求,以及今后15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在全民族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积极健康、丰富多彩、服务人民为主要要求的文化生活质量的显著提高,实现以社会风气、公共秩序、生活环境为主要标志的城乡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在全国范围形成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这个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适应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方面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

实践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质和发展方向。

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他概括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此,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第一次就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作了明确回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同时,他还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功能和作用,认为“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致,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促成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建设,这些思想,是总结建国以来思想文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而作的富有创造性、超越性和指导性的提炼、概括,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从新的高度说明了何谓文化的先进性,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仅与先进文化休戚相关,而且忠实地、真诚地代表并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后,特别是她成为执政党以后,始终注意正确处理自身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关系,努力推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自觉而理性地引导中国先进文化的进步轨迹,从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忠实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她能够通过文化建设的实践,总结经验,记取教训,始终以发展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为中心,注意理顺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把先进文化的建设看成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整体综合素质、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文化建设的实践,把握先进文化的特质,发挥先进文化的功能,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和根本任务,抓纲带目,推动全盘,从而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文化的品质,增强其先进性,为文化建设基本目标的实现,为全民族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形成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壁垒。毫无疑问,我们应当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进程,以便增强中国文化的先进性,实现我们的文化建设的预期目标。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中,有人总是要弄出一些偏题、怪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人总是要将其变形为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甚至臆想为“一体化”。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不过是在新的科技条件和世界形势下,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以高科技为手段,以跨国公司(特别是西方跨国公司)为依托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的再调整。诚然,经济全球化必然对民族文化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它最终决不可能消解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始终存在。⑩中华文化、

印度文化、日耳曼文化、法兰西文化、拉丁文化、美利坚文化、大和文化,等等,可能在相互交流中相互吸收、借鉴、渗透,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融化为一。那种自欺欺人的“一体化”高论的鼓吹者,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或者十足糊涂,至少也是对世界文化大势、对中国文化状况知之甚少!我认为,要坚持中国文化的先进性,要建设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不能忘记、抹杀文化的民族性,而要充分重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首先是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并发展中国文化的先进性,顺利实现我们的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

①瞿秋白:《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

②同上。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5月27日。

④《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624页。

⑤同上书,第626页。

⑥同上书,第669页。

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3—24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页。

⑨同上书,第8页。

⑩详见李宗桂:《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性》,载《人民论坛》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叶金宝

社会文化的经济功能与生成机制

——兼论历史唯物主义新范式

□ 鲁品越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 社会文化以来自实践的时代精神为核心内容, 以传统文化为表达形式。时代精神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的主观反映, 一旦通过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表达出来, 便具有塑造社会经济制度, 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乃是精神化了的社会物质力量, 是社会生产力对经济制度的决定作用的体现。以此来解释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 并且得出关于人类如何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新范式。

[关键词] 社会文化 时代精神 经济制度

[中图分类号] 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0) 08- 0010- 07

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的古代社会相比, 近代社会可以说是奇迹发生史。其中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经济上的奇迹, 包括下面一系列事件:

18 到 19 世纪, 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接踵而至的工业革命;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后来的苏联解体;
二次大战后日本的兴起, 70 年代其生产力跃居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二位;

80 年代, 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出现; 以及随后发生的东南亚金融风暴;

80 到 90 年代,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国的迅速崛起;

如何解释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开始, 出现了一种影响巨大的解释范式——将社会文化看作这些事件的产生根源。社会文化被视为塑造社会制度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一、社会文化的力量

1、从新教伦理到企业制度的生成

在上述事件中, 对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事件, 恐怕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以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的的、其手段是合理组织劳动和生产的“企业”, 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事物, 它塑造了整个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传统社会中, 生产活动有的依附于家庭, 有的则依附于政府。而当这些生产活动与家庭与政府相分离, 进行独立的核算, 成为追求自身的独立目标——利润时, 便出现了企业。①那么, 现代社会所特有的这个“怪物”——企业, 是如何来到人间的呢?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著名的宗教文化起源说。他认为, 在赴美洲的移民中, 具有不同精神的民族移民, 建立了不同的经济制度, 可见无形的精神是有形的制度之母。人们先有某种资本主义精神, 然后在这个精神的驱使下进行社会活动, 才会产生着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事物——企业, 进而产生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精神由两个要素构成: 一是以无限追求金钱和财富自身的积累为目的, 为此而采取禁欲主

义的生活方式，而不像传统社会那样，以追求对财富的消费与享受为目的；二是以理性科学为手段，它使一切赚钱的行为走上制度化与科学化的轨道。在这两个要素中，以追求金钱与财富的积累本身为目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灵魂，而理性不过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的手段。

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现，并非始自韦伯。早在韦伯之前，马克思已经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②这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淋漓尽致的刻画，而且深刻地道出了这个精神带有禁欲主义的宗教性质。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发现的重复。

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马克思与韦伯在此问题上分道扬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来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而韦伯则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一种特殊的宗教伦理——也就是他所说的新教伦理。正是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并由此而生成了现代企业制度。

韦伯由此创造了一个用社会的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制度起源的思想范式。这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经在美国社会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帕森斯，沿袭了韦伯的这一思想，认为不同的社会制度是由社会的文化系统中“图式变元”的不同价值取向而产生的。所谓现代化过程，并不是引进现代生产力的过程，而是文化观念的变革过程：从传统的价值取向转变为现代的价值取向。^③许多学者则按照韦伯和帕森斯的这一范式，来解释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

2、东方文化和“东亚模式”的功与过

二次大战后，日本从废墟上崛起。20世纪70年

代，日本从一个落后国家，一跃而为发达国家，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如何理解日本经济的腾飞？许多学者把日本的成功归结为日本的文化。

到了80年代，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的兴起，跃升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许多华裔用“儒教文化圈”来解释“四小龙”的兴起。2000年前孔夫子的学说，被认为是产生东南亚地区新工业文明的“新教伦理”。

“四小龙”的社会文化结构，是儒学文化与西方文化二元文化结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政治与法律制度领域内，形式上是西化的，实际起作用的不仅有西方文化，还有儒家文化，在某些方面，儒家文化还占有主导地位。

那么，儒家文化又是如何能够产生出这种“儒家资本主义”的呢？

首先，儒学所倡导的敬祖爱国思想是艰苦创业的力量源泉，倡导的勤劳节俭精神是发财致富的根本途径。原始资本的积累需要勤劳。在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中，首先包含着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精神。而华人为了能够敬祖爱国，必须尽可能通过艰苦创业来创造财富，同时节俭精神则将这些财富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于是，敬祖爱国代替了新教伦理中对上帝的忠诚，而成为勤劳致富的力量源泉。

其次，儒家所倡导的群体和谐是民族资本互相扶持的思想基础。作为后起的工业文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其竞争对象是强大的国际跨国公司。儒家倡导的群体和谐精神于是成为新兴资本团结起来的思想纽带，使他们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其三，儒家所倡导的重视教育是自强不息的有效方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重视教育，通过教育来光宗耀祖、振兴家业的儒家传统思想，使儒教文明圈中的新兴资本家能够把积累的财富投资于教育，送子女到国家名牌大学深造。这非常有利于提

高后代在国际竞争中的声望与地位,有利于打开国际市场,有利于提高民族资本的品质,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④

然而,当人们沉浸在对东亚模式的推崇与颂扬,以至认为正在到来的21世纪是亚洲世纪、儒家文化圈的世纪之时,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而日本经济则从90年代初开始便步入衰退,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其雪上加霜,韩国经济也受到巨大打击,于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扩张为东西金融危机。面对此等现实,一些学者开始把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也归结为东亚文化——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社会文化对社会经济制度具有何等巨大的塑造作用,社会文化建设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这对于更深刻地理解社会经济制度的底层所渗透和贯穿的社会文化因素,为社会制度建设提供新的思路,是十分有益的。

3、社会文化结构

然而,如果我们的观点仅仅停留于此,认为社会制度起源于社会文化,经济的兴衰由文化所决定,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究:那些能够塑造出新的社会制度的文化,其结构如何?它们来自何方?

对上述历史事实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历史上那些能够塑造新制度的文化,已经不完全是从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在单纯的传统文化下,人们只能再生产出与传统社会一样的社会制度,而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制度。否则,人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诞生于16世纪上半叶的新教(指加尔文教)伦理,为什么到18世纪末才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且新教伦理本身又是从何而来的?日本的团体主义文化已经有千年历史,为什么到20世纪后半叶才发挥其发展资本主义的作用?如果儒家伦理能够产生出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受到的阻力几乎是世界之最?所以,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归结为某种传统文化,是站不住的违

背历史事实之论。

实际上,那些真正能够塑造出新制度的文化,在其实质内容上并非传统文化,而是具有某种全新的时代精神的新文化。而这种新文化在现有的文化环境上生长之时,总会采取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形式。这种以新文化为内容、以传统文化为表现形式的文化,才是能够塑造出新的社会制度的文化。由于其外在形式采取的是传统文化形式,所以人们往往会把这种文化看成是某种传统文化的复兴,而忽视了它的内在的新文化的实质。

只有具备新的时代精神的人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形式的同时,把自己的时代精神渗透其中,所产生的文化,才是有能力塑造出新制度的文化。以韦伯的新教伦理说为例,如果西欧人和北美的移民只是新教伦理的“原教旨主义”者,原封不动地恪守“神定论”等新教教义,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把新教教义改造为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塑造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将只能再生产出某种宗教制度。实际上,那些塑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驱者们,已经在新教教义的“旧瓶”中装进了“新酒”——把金钱的积累看成是上帝交付的责任,把为抽象的“为上帝而禁欲”的形式,具体化为“为金钱积累而禁欲”。这是反映那个时代特征的新的时代精神,它借用新教伦理中的神学信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

同样,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继承的实际上只是儒家文化的形式——重视人际关系和群体力量,重视政府力量等等,而同时加进了新的内容——这就是以赚钱为目的,进行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与国际资本进行竞争。儒家文化不过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可供利用的文化形式。

所以,塑造社会制度的文化力量,并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力量;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渊源,并非仅仅是新教伦理;导致亚洲工业文明的,也并非仅仅是儒教伦理和其他的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精神内容与传统文化形式相结合,才会产生出那些能够塑

造出新的社会制度的伟大的文化力量。

那么,这种加进到传统文化形式中的新的时代精神,又是从哪里起源的?

二、社会文化的形成机制

1、来源于当代实践的时代精神

这个时代精神,当然只能来源于人们所处的时代,决不可能来源于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它的实质,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人们头脑中的表现,因而是一种目的性精神。人生和社会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任何一个社会文化的灵魂,是社会文化最深层本质的内容。如果说,资本主义精神的灵魂是追求金钱和财富的积累,那么社会主义精神就是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共同富裕。那么,人们头脑中的各种各样的目的,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是唯一的: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当代的社会实践!

众所周知,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实践活动追求的目的,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说到底人们的利益目的。而同一利益目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那里,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形形色色不同的目的——例如,资本家追求的是资本的积累,而农民追求的是拥有土地,工人追求的是工资福利,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目的,都是由人们从事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实践的性质,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等等,决定了它具有什么样的目的。于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形形色色的目的,以及围绕这些目的所发生的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冲突,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构成了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整个上层建筑的聚焦点。这些聚焦点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第一,关于社会资源,特别是核心资源的所有权与支配权的价值观念。人们的利益目的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资源来实现,社会实践告诉各个时代的人们:什么是最重要的核心的资源,这些核心资源应当归谁所有?谁是资源的合法拥有者?围绕这类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资源支配权与占有权的合

法性观念。

第二,关于社会利益的各种价值观念。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总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于是,围绕着物质利益,必然也会形成一系列价值观念,例如:什么样的利益追求是合乎道德和合法的,什么是违背道德和违法的?应当如何组织社会资源进行生产活动?生产出的物质利益在社会成员中应当如何分配?公共福利产品在全社会总的产品结构中应当占怎样的比重?在这些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会塑造出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历来是社会意识形态交锋的前沿。每当社会变革时期,围绕这些问题的交锋最为激烈。改革开放中我们遇到的许多思想阻力,都来自这一领域中的陈旧的意识形态。

第三,关于社会政治权力的价值观念。在组织社会成员利用资源进行的物质生产和其它实践活动过程中,人们的等级与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观念。这是围绕着人对人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关系的观念:如关于权力合法性观念,关于社会政治体制的观念,关于人权的观念,关于社会成员的等级观念或平等观念,等等。

围绕着上述目的问题而形成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等领域的价值观念,是自古至今上层建筑的聚焦点。每个时代,生活在一定社会实践条件下的各个阶级与阶层,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围绕着这一系列问题,产生一系列价值观念,其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念形成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建立了主宰社会生活的上层建筑。

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灵魂,正是上述关于目的的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当时的社会实践告诉人们,并非土地,而是金钱是社会的核心资源。而通过劳动和市场获取资源是合法途径。正是在这个社会现实条件下,产生了以追求金钱最大化的目的,而新教伦理、儒家观念等等,无非是表达这个目的、为实现这个目的服务的文化形式。

2、传统文化:时代精神的表达形式

采取社会业已普遍接受的传统文化形式，在传统文化的旧瓶中装上来源于当代实践生活的时代精神新酒。传统文化于是成为新的时代精神的表达形式。新的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这种巧妙结合，具有如下功能：

首先，它使新的时代精神迅速具有了合法性。被社会普遍承认的、已经融化到社会生活中和人们的思想习惯中的传统文化，在社会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价值准则。例如，在中国，儒家所教导的爱国敬祖精神，被视为天然合理的价值准则，违背这个价值准则，则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在西方社会，基督教伦理是人们公认的价值准则，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因此，新的时代精神要被社会真正持久而广泛地接受，不是要推翻这些公认的价值准则，而是采取这些传统文化的形式，同时变革它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很多的历史时期内被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广泛接受，第一是由于它所追求的目的，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与生产力的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一致，是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它采用了社会主义信仰传统与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表达形式。这种社会主义信仰一直是下层被压迫阶级所承认的具有天然合法性的信仰，虽然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它未曾居于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扎根，必须采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采取的形式，也即必须实现中国化，与中国普通百姓的实践生活融为一体。没有实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少数学者们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缺乏生命力。

其次，传统文化形式，不仅使新的时代精神获得社会合法性地位，从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同时也使其获得了实现其目的的方法与途径。我们说过，时代精神本质是一种目的性精神，体现的是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的。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而传统文化则给这些手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例如，近代社会产生了

以金钱积累为目的的时代精神，而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则为赚钱提供了理性手段，它使赚钱活动制度化、理性化、科学化。我国的华侨也利用儒家思想中重视血缘伦理和国家至上的文化传统，成功地结成相互支持的社会关系网络，消解经济活动中的矛盾，从而使华人能够成功地与国际资本相竞争，立足于国际经济界。

由此可见，那些能够塑造社会制度的文化力量，不是单纯的社会传统文化力量，而是当代实践生活所产生的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体。这个结合体，即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时代精神是其实质内容，而传统文化是表达时代精神的形式，和实现时代精神的工具。因此，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实践生活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才是对历史发展的真正揭秘。

而这种作为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结合体的社会文化，是社会正在起作用的价值观念，是真正起作用的社会意识形态。我们知道，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精神关系的总和，其内容十分庞杂，含有各个阶级和阶层、各种观点和观念，而社会文化则是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的，融化到社会生活中的社会意识形态，因而是对社会发展起着现实作用的意识形态。

那么，这个意识形态是从哪里来的呢？

三、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范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解释范式。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释原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决定政治上层建筑。这个解释方式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在人们阐述与应用这些原理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人类主体的作用，单纯地强调社会客体的决定性作用，那么，就会导致恩格斯晚年所批评的那种“唯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在晚年（1890年）曾经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

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⑤

既然经济因素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还有什么其它的决定因素呢?我们应当到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中去考察。

实际上,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一切社会事项,一切社会设置,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而人类实践总是主体与客体的结合:客体提供实践对象和条件,而主体则提供实践的目的和方法。因此,一切社会事物都是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说主体是社会事物之父,那么客体就是社会事物之母。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历史辩证法的方法论准则。如果我们违背这一准则,就会产生下面的不正确的倾向:

如果单纯地强调社会事物产生原因的客体方面,强调客观自然条件或客观经济存在是社会事物的唯一产生原因,会导致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唯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唯物主义,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客观条件下,不同的社会创造出不同的生产力、不同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

如果单纯地强调社会事物产生原因的主体方面,强调人的主体目的与精神的决定性作用,会导致历史唯心主义,它不能解释:人们的主体又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同一主体在不同的客观环境下会创造出不同的社会结果。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强调二者在实践中的结合,才是社会事物的产生原因。

根据这种主张人类社会由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实践活动所创造的观点,可以得到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结论:

第一,作为人类利用资源创造物质利益的能力的社会生产力,并不单纯地由客观的自然条件所决定,而是由自然条件与人类主体开发自然的精神解放状态,特别是其创新精神状态所共同决定。人们

所处的自然条件——也即人们所能获取的自然资源,决定生产力的对象和内容;而人们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创新精神状态,则决定生产力所采取的目的和形式,在该对象和内容上所达到的水平。通过这个主客体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人们创造了社会生产力,由此而使人们自身成为拥有一定生产力的“技能人”。

其二,作为人们利益关系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并不单纯由生产力所决定,而由生产力与由以往社会所形成的争夺着利益与资源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格局共同决定的。社会生产力决定这些社会力量所争夺的对象和内容,从而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而各种社会经济力量的格局则提供人们建立生产关系的目的,塑造出对社会资源与利益分配的结果,决定着分配社会资源与利益的组织形式。通过这个主客体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人们创造了社会生产关系,由此而使人们自身成为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生活的“经济人”。

尽管如此,人们通过实践创造社会的过程并未就此完成。人类一旦创造出生产关系,并使自己成为经济人之后,便产生了更高层次上的实践活动:这就是创造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体现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个创造过程,同样也是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实践活动的创造过程。这是继创造生产力、生产关系之后,人类社会的第三层次的创造过程。

实际上,每个社会成员不仅生活在生产关系中,也生活在由历史流传下来的社会文化中,带着一定的文化背景来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这个社会文化背景,渗透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文化精神。因此,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从它刚开始表达自己的时候起,就通过人的主观精神,打上了传统的社会文化的烙印,穿上了传统文化的制服,并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下逐渐生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成为各个阶级和阶层表达自己的

意志、表现自己价值观念的工具与外在形式,为这些新产生的价值观念穿上了合法性的外衣,从而能够在社会扎根,同时也提供实现这些价值目标的手段与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渗透到人们灵魂深处、成为人们主观文化精神的传统文化,是社会意识形态之父。正是由社会经济基础作为生母,和由社会传统文化作为生父的结合,才产生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进而产生了体现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上层建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经济基础提供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内容,而社会文化则提供了这个本质内容的表达形式与实现方式。

正因如此,扎根于同类生产方式的同一阶级或阶层的意识形态内容,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下,会获得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不同的实现方式。例如,同样追求资本积累和企业扩张的价值观念——这是扎根于资本主义发展客观需要的文化观念,在欧美社会采取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形式和理性主义实现方式,而在日本采取的是“公司主义”的团体文化形式,在亚洲其它“儒教文明圈”中采取的则是强调尊祖爱国,建立以血缘、乡情为纽带的团结互助的文化形式和实现方式。同样是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农民,在西方的基督教背景下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而在中国的儒教、道教背景下,产生了陶渊明式的“桃花源”和后来太平天国理想。

而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创造过程,也是人类创造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自身获得新的层次的属性——成为“文化人”和“政治人”。因此,

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人,是生产力层次的“技能人”、生产关系层次的“经济人”和上层建筑层次的“文化人”与“政治人”组成的有机整体。社会结构的生成与发展过程,于是也就成为人的发展过程。

如此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将如本文前面所说的那样,在实践中发挥出文化的巨大力量,塑造着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东亚模式等等。韦伯等人所揭示的文化的力量的确存在,然而这种文化本身,其内容又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同时又以传统文化为表现形式。因此,由社会文化塑造社会经济制度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存在通过社会意识而自我决定的过程。社会正是在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中不断前进。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模式。

①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56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2—653页。

③参见H·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8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④参见李书友:《儒学与现代文明》,第五、六章,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501页。

责任编辑:何蔚荣

论真理的实践形态

□ 董玉整¹ 董 莉²

- (1. 广州医学院社会科学部教授, 广东 广州 510182)
2. 广州医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摘 要] 所谓真理的实践形态,指的是在实践活动中,真理以其对实践活动的观念规定而表现为一定的矛盾运动,以实践的形态存在着。一、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掌握着的真理,是系统而不是零碎、确定而不是任意、本质而不是形式、辩证而不是绝对的掌握。二、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实践着的真理,因为真理确定实践者的立场和态度,形成实践者的实践理念,提供实践者的实践标准。三、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检验着的真理,检验真理的层次、真理的阈域、真理的价值。四、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发展着的真理。在实践中,实践者坚定真理的信念、发现真理的矛盾、探索真理的路向。

[关键词] 真理 实践形态

[中图分类号] B0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0) 08- 0017- 05

作为认识活动的结果,真理以其对客观对象的观念逻辑再现而表现为一定的理论,以理论的形态存在着(理论形态并不等于完备的理论体系);作为社会运动的因素,真理以其对时代精神的观念浓缩而表现为一定的社会事实,以社会的形态存在着;作为实践活动的灵魂,真理以其对实践活动的观念规定而表现为一定的矛盾运动,以实践的形态存在着。没有理论形态,真理不成其为真理;没有社会形态,真理不会被社会承认和承接;没有实践形态,真理不可能得到确证、运用和发展。可见,真理的实践形态,是真理存在和发展的必然形态。

一、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掌握着的真理

实践是实践者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实践者之所以是实践者,之所以不同于认识者,就在于实践者根据一定的认识,通过一定的活动,达到改变实践对象,从而也确立并改变了实践对象与实践者之间的关系的目。一定的认识,是实践者进行实践活动的起点和依据,实际上也是实践活动得以进行和展开的内在逻辑。认识相对于实践是逻辑

地在先,没有认识便没有实践,不仅实践活动的发生是如此,实践活动的展开也是如此。所谓实践活动,就是不断将认识变成行动和结果的过程,就是不断否定认识的自身规定,使其不断获得实践的规定的过程,就是不断否定认识的观念形式,使其获得实践运动过程中的客观形式的过程,就是认识逻辑外化为实践的轨迹和结构的过程。因此,认识的性质、层次,也就必然影响着实践的性质和层次。

真理对实践的影响,是通过人们掌握了真理并进行现实的实践活动而现实地实现的。在这里,“人们”要变成现实的“实践者”,真理要现实地被“实践者”所掌握,变成现实的进入实践活动的要素。当真理现实地被“实践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们”)所掌握时,真理也就获得了实践的形态,成为实践中的真理。此时,真理便由理论形态或社会形态,或两者兼而有之,发展为实践形态,否定既在形态而获得了新的存在形态。

实践者只有真正掌握了真理,才可能否定真理既在的形态而赋予真理以实践形态。所谓真正的掌握,指的是真理真正由既在的实践者的外在形式变成当下实践者的内在内容,是当下实践者之所以是实践者、之所以和真理发生必然且现实联系的真

正依据。在这里,实践者真正获得了真理的内容,使真理成为了实践者的内容;真理也真正获得实践者的形式,使实践者成为了真理的形式。实践者因而成了真理的现实存在,成了真理存在的现实。在某种意义上,因为实践者真正掌握了真理,实践者也就成了真理的表征和化身,成了存在并活动于整个实践过程中的真理。真理也就成了实践者的内容,内在规定和影响着实践者的整个实践活动,成了贯穿于整个实践活动过程的实质上的实践者,成了内在的实践者,真正的实践者。真理由于被实践者真正掌握,成为了实践者的灵魂、思想、观念、意识和一系列的精神驱动力,成为了实践者之所以为实践者、之所以不断地生成为实践者的内在依据。

实践者对真理的真正掌握,是真理获得实践形态的关键所在。要达到真正的掌握,就必须是:(1)系统而不是零碎的掌握。真理是客观逻辑的主观逻辑再现,是客观系统的主观系统再现,因而真理是系统。真理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及其逻辑关联而生成的,它有自己的基本因素、相对稳定的结构、独特的功能和具有一定走向的辩证过程。实践者只有将真理的主观逻辑转换为实践者的观念逻辑,将真理的主观系统转换为实践者的观念系统,才算掌握了真理,真理才获得了实践形态。真理系统中的片言只语,虽然也是真理系统中的成份,但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真理,而且它们的意义也只有还原到真理系统中去,才能得到本来意义的理解和确证。事实表明,背离真理系统对真理零碎的掌握,往往是导致实践活动受挫甚至失败,玷污真理尊严的内在原因。

(2) 确定而不是任意的掌握。真理是对客观实在的主观创造,是客观实在的主观存在形式,因而真理是客观的,它的内容是确定的。实践者只有将真理的客观确定的内容转换为实践者的观念确定的内容,才算掌握了真理,真理才获得了实践形态。对真理的任何任意的理解和把握,只是对真理的主观宰割,是对真理客观性的否定,对真理确定性的

扭曲。用主观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待真理,只会使真理的价值丧失殆尽。

(3) 本质而不是形式的掌握。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精神的主观提炼,是客观事物精神的主观展现。因此,真理旨在揭示、展现客观事物的本质,而不只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再现,尽管这也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实践者对真理的掌握,当然就要将真理的本质主观创造为自己的内容,把握真理的精髓,而不能拘泥于复述真理的字句。形式主义者或许能将真理的字句背得滚瓜烂熟,但却不理解这些字句间的真正联系,不明白这些字句的真实意义。

(4) 辩证而不是绝对的掌握。真理是对客观对象生长、发展过程的观念再现、逻辑展示。客观对象运动变化的绝对性,决定了真理具体形态的相对性,决定了真理系统的开放性和真理发展的过程性。真理是过程。因此,实践者对真理的掌握,就不能采取绝对主义的态度,认为真理系统中的每一字句都是真理,而应该从矛盾发展过程的意义上来理解和掌握真理,这样才不致于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二、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实践着的真理

实践者真正掌握了真理,使真理具有了实践者的主观形式,其直接的目的在于进行现实的实践活动。根据列宁的解释,实践活动是主观和客观的交错点,即是主观和客观辩证矛盾运动的展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观要变为客观,主观要改变自己的单纯主观片面性,力求以客观实在的形式来确证展现自己,力求以客观实在的逻辑来客观再现自己的结构和实质,再现自己的本质精神。主观成为实践活动中的积极因素,成为左右实践者实现实践活动的内在依据和现实力量。主观要变为客观的内在冲动,使得实践者真正成为实践行动者,成为改变主观的形式,使其变为客观的执行者、实行者。

这里的主观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观意识,而是实践者已经掌握了真理,是以实践者主观形式存在的真理。所谓主观变为客观的冲动,也就是真

理要成为实践活动、成为实践过程和结果的内在趋动,也就是真理要进一步否定真理实践形态的观念形式,成为真理实践形式的过程形式和客观结果形式的内在趋动。这个趋动,因实践者的现实实践活动而得以实现。在一定的意义上,实践者是真理的现实存在,因此,真理要变为现实运动及其结果的内在趋动,与实践者要改变现实,创造现实的行动是一致的。从实践活动的过程来看,真理的实践形态主要通过以下的环节来实现。

(1) 确定实践者的立场和态度。实践活动真正开始时,实践者便依据已经掌握了真理来确定自己在整个实践过程中的立场和态度。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一种立场和态度的展开。立场和态度,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建立实践关系的趋动,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之间要建立实践关系的定位。真理的实践形态,在这里就表现为确定实践者的实践立场和态度,确定实践者和实践对象之间要建立的联系。立场和态度,既是实践活动发生的原动力,又是贯串于整个实践活动过程的恒久因素。没有立场和态度便没有了目的和方向,便没有现实的实践活动;丧失立场和态度,实践活动的延续便中断;改变立场和态度,实践活动的延续便受阻。立场和态度是实践活动发生和发展的现实力量,而确定实践立场和态度的内在依据不是别的,正是实践者已经掌握了真理。真理通过实践者的实践创造活动,变成实践者进行现实实践活动的坚定立场和坚决态度,从而获得真理实践形态的新规定。

(2) 形成实践者的实践理念。实践者进行现实的实践活动,是实践者实践目的的物化过程。要达到实践目的,就必须要将实践目的具体化,制定达到实践目的的具体步骤、方案、措施,使实践目的中所隐含的逻辑具体展现出来,使实践目的具有更现实的操作性。这一过程便是形成实践思维具体的过程,形成实践理念的过程。所谓实践理念,在这里就是指实践活动的观念预演、思维操作过程所产生的结果。实践理念是整个实践活动的在先“实

现”,是客观实践活动实现之前的主观实践活动,是实践活动客观形态形成之前的实践活动主观形态。它是实现实践活动极其重要的环节,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在这里得到较集中的体现。实践理念的逻辑展现和系统构成,实际上是真理逻辑和系统的一种现实具体的观念转换和创造。实践理念的形成,使得真理成为了实践的靈魂,内在导引着实践的发生、发展,从而也使得真理的实践形态进一步深入到实践活动的内部,成为实践活动结构中极其重要的因素、部分、动力。

(3) 提供实践者的实践标准。实践理念毕竟是主观的创造物,它关于现实实践活动的预演、思维操作,很多都是基于一种对未来的假设、推测,并不就是未来的真实。这种主观假想性,使得实践理念在现实的实践活动展开过程中,必然要根据新情况而作出修改、充实和调整。当然,同时也要坚持和展现,因为实践理念的正确性反映出原先预计的情况和现实实践活动的情况相一致。坚持和修正,这是同一个实践活动过程的两个方面。坚持什么,修正什么,其依据一是客观的现实,一就是真理。真理的逻辑继续被当作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逻辑,以此来规范实践的、现实的逻辑,现实出现的具体情况被视为真理一般逻辑的特殊存在。实践者继续坚持真理,从而保证实践活动的顺利完成。实践者不能坚持真理,实践活动往往就要走样、失败。在具体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是在根本的意义上),真理是实践者的实践标准,真理成为实践者自觉规范实践活动的内在准绳。实际上,这也是实践者的实践立场、态度的进一步确证,是实践理念的更充分展示,是真理实践形态内涵更深层次的丰富。

三、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检验着的真理

现实的实践活动的展开,是实践者的主观与实践对象的客观不断结合、交错的过程,是主观变为客观和客观变为主观的双向辩证运动。一向是真理不断地转换为实践活动,另一向是实践活动不断地

内化、上升为真理。但这双向活动的实现，都有一个中介环节，这便是真理的检验。真理向实践活动的转换，现实地检验着真理；实践活动向真理的内化、上升，也检验着真理。检验真理是使真理进入实践活动，成为实践活动现实因素的必然环节。

实践者在转换真理形态，使自己获得真理的内容成为真理的现实存在形式的同时，也客观地审视真理，把真理作为评判的对象。这种审视，依据的是真理的精神、实践的精神。所谓真理的精神，指的是以真正真理的意识和标准来重新审视现实真理，确定其品位，判断其价值。既肯定真理之为真理的质的确定性，又分析真理系统中的非真理因素，包括既在的因素和可能的因素。所谓实践精神，指的是以实践活动的逻辑和结果作为依据来审视真理，分析研究真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转换成了实践，转换成功的原因，转换不完备和不成功的理由，进一步确定真理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理顺两者之间的结构和逻辑。将真理精神和实践精神结合起来，实践者实现着对真理的检验活动。真理精神和实践精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将它们结合起来，并不是否认实践标准对于真理的根本性意义，而是使实践标准对于真理的根本性意义更加具体。实践活动表明，缺乏真理精神的所谓实践检验，往往是经验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表现；而缺乏实践精神的所谓实践检验，往往是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表现。

实践者在实践活动中对真理的检验，表现在：

(1) 对真理层次的检验。任何真理都处于无限真理系统中的某个层次，任何真理自身又都具有特定的层次。因此，真理才具有了具体性、客观性、现实性。实践者进行的实践活动都是现实具体的，也有一定的层次。真理转换成实践活动中的现实因素，获得实践形态，这一过程是否顺利实现，很大程度要取决于真理层次与实践层次之间的关系。为了建立两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就必须确定它们的层次品味。不同的对象决定了真理的不同层次。实践者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将掌握了真理再物化为

实践活动的过程，进一步检验、确定真理的层次性，从而也就确定了真理具体实践形态的层次。

(2) 检验真理的阀域。所谓真理的阀域，即是真理适用的范围。任何具体真理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都与具体的客观对象相关联。真理的具体性便由此而获得规定。真理的阀域，可以从真理的对象及其内在结构来判断，真理的对象及其内在结构是真理阀域的客观注释。但这种判断实际上是一种还原法，这种判断的结果并不一定完全是真理阀域的实际。真理的阀域是相对于实践活动而言的，因此，对它的最终解释，只能是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真理由于通过实践者的掌握和运用、创造而获得实践形态。在这个过程中，真理与实践者的联系、与实践对象的联系都是很具体的，这些具体联系的成立和展开，充分说明真理的阀域，究竟适合不适合现实的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合现实的实践，或者，这一具体的真理，究竟适合什么类型、什么层次、什么范围的实践。

(3) 检验真理的价值。实践者的实践活动检验着真理的价值。任何真理因其具体性而具有了具体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只有从客观事物的整体系统性和辩证过程性上来理解才能获得准确的答案。从大的方面来划分，真理可以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整体价值和部分价值、当前价值和长远价值、直接价值和间接价值等等方面。有的真理在整体上具有价值，但其中的部分却失去了现实意义甚至是谬误；有的真理当时具有重要价值，现今时过境迁则失却了真理的光辉；有的真理甚至是以错误的形式而存在的，真理隐藏在错误之中。这就要求实践者对真理采取客观辩证的态度，检验真理的价值，从而在实践活动中给真理的实践形态以准确的定位，并进行现实的转换过程。有价值的都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却一定是有价值的。任何不导向实践，不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可能是真理。

四、真理的实践形态是实践者发展着的真理

真理进入实践领域并不只是真理对实践产生影响,实践对真理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实践活动对真理的影响,是通过实践者的努力和创造而实现的。实践者既将真理的主观形态转换为客观实践形态,同时也将实践的客观形态转换为主观的真理形态。将这两个活动统一起来,实践者便实现了现实的实践活动。实践者在掌握、实践真理的同时检验着真理,认识着实践活动中新的现实,并不断地再创造、再探索,从而也就实际地促进了真理的发展,使真理的实践形态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更强的内在逻辑性,使真理层次提升、阀域拓宽、价值增加。

(1) 坚定真理的信念。实践者通过亲身的实践活动,充分体会到真理对实践活动的内在指导作用,充分认识到真理在实践活动中的现实价值,从而更坚定了真理的信念。实践者的实践活动证明离开真理的实践是无目的、无依据的实践,是没有实际价值甚至是有害的实践;只有自觉地以真理为依据、为标准,实践活动才会是有效的、积极的,才是符合实践者的意愿、同时又符合实践对象的内在逻辑的。对真理信念的进一步坚定,为今后具体的真理实践形态的形成和现实展现,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从而也就为真理的发展,提供了实践者更可靠的观念保证。在这个意义上,坚定真理的信念便有效地促进真理的发展和实践的拓展,有效地促进真理由理论形态、社会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换,也就成了真理获取实践形态的现实因素。

(2) 发现真理的矛盾。一是真理与现实的矛盾。实践活动过程中遇到的许多新情况是真理所说明不了的,有的甚至是直接矛盾对立的。此时,实践者便理性地认识现实,给现实定位,确定现实与真理之间的真正关系,找出真理与现实之间矛盾的真正所在,找出真理的阀域,于是便从真理与现实的矛盾中发现真理发展的方向和拓宽真理的途径,使真理与现实的矛盾在真理与现实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得到解决。二是真理系统内部的矛盾。通过实

践活动的系统过程,实践者发现真理系统内部存在着不一致、不和谐的方面,发现真理系统内部存在着非真理的因素。这便打破了真理的自在封闭状态,使真理的开放本性清楚地展现出来。尽管不足和缺憾并不意味着开放的实质,但它们的存在却是真理系统开放的现实理由。实践者发现了真理系统内部的矛盾,就为真理系统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方向,提供了真理系统内部要否定的对象。也就为解决真理系统内部的矛盾、促进真理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3) 探索真理的路向。实践者即使遇到真理与实践相矛盾的情况,也会创造性地思考、实践,在试验性的实践活动中重视解读真理、规划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从而确定新的真理因素,确定真理进一步发展可能和现实的路向。真理得到修正、充实、丰富,真理的实践形态便包含了实践活动过程中新增加的真理因素,以及这些新因素给实践者和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新影响。

经过实践者的创造和发展,真理的实践形态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它与实践者在实践活动开始时所掌握的真理,以及实践活动过程中的实践立场和态度、实践理念、实践标准等等,都已不一样,它是完全新的真理实践形态了。伴随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真理由真理实践形态的生成发展到真理实践形态的再生,是一个质的变化过程。一方面,真理实践形态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正是实践活动发生和展开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实践活动发生和展开的过程,也正是真理不断获取实践形态、不断确证和否定自身的过程。实践的生成,正是真理的生成;实践的发展,正是真理的发展。所谓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目的、标准和动力,在此一目了然。同时,没有脱离真理的实践,更没有脱离实践的真理。真理与实践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它们的逻辑展开,便构成了人类永恒的实践活动和对真理的无限追寻。

责任编辑: 罗 苹

存在“感性真理”吗

□ 方 真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053)

[摘 要] 弄清是否存在“感性真理”或正确的感性认识是否真理的问题, 对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具有直接意义。笔者认为, 有无“感性真理”的问题, 涉及到认识论的各个方面, 只有从认识的各方面进行全面的考察, 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 这就是: 不存在“感性真理”, 真理只能是正确的理性认识。

[关键词] 真理 感性真理

[中图分类号] B02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8-0022-04

一、从“真理是个过程”来看, 不存在“感性真理”

首先,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要经历一个过程, 因而获得真理也必然有个过程。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 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逐渐显露出来的, 而人的认识能力本身的局限性又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一下子认识事物的全体。为什么作为认识过程的开始之感性认识还必须经过思维加工才可能成为真理呢? 黑格尔说得很清楚: 存在只“是直接的东西。因为知识要想认识什么是自在的和自为的存在的真理, 所以它并不停留”“在直接的东西及其各种规定上, 却透过直接的东西而深入到里面去。”^①也就是说, 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隐蔽的, 认识不能停留在事物的外部联系上, 只有深入到事物“之内”, 才能把握真理。列宁赞成黑格尔的上述看法, 并得出结论: “真理不是在开端, 而是在终点”, 因为“真理不是最初的印象”。^②亦即, 最初的感性认识并非真理, 真理只能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结果。

其次, 真理的发展是个过程。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 都只能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近似正确的反映, 随着实践的发展, 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断深刻、全面, 从而使真理得到发展。列宁说: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 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 这就是认识真理, 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

③这就是对真理是个过程的概括性的表述, 既说明了真理的形成是个过程, 又说明了真理的发展是个过程。毛泽东对认识的全过程概括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黑格尔在反对把认识的开端当成真理时说: “当一种事情在其开始时, 尚没有实现。”^④

主张存在感性真理的同志认为, “真理是个过程”还包含着真理自身是个过程的意思, 即真理由感性真理发展到知性真理再发展到理性真理的过程, 因而感性真理是存在的。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因为, 如果认为真理自身是个过程就表明某一具体认识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是真理, 就不仅与获得真理是个过程的观点相矛盾, 而且这种看法本身也是违反逻辑的。同时, 如果将真理自身是个过程理解为从感性真理到知性真理再到理性真理的过程, 那就是只承认了在实践基础上获得真理是个过程, 而否定了在实践基础上真理的发展, 因为从所谓感性真理到知性真理再到理性真理的过程, 都是在思维领域中实现的, 它没有说明真理在实践和认识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无限循环中得到发展这个过程。

二、从真理和实践的关系看, 不存在“感性真理”

首先,任何真理都是实践的产物。真理是个过程,最根本的就在于实践是个过程。“感性真理”论者认为“现象等等往往是表面的,外露的,它直接地表现于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它的认识无须中介过程”,并视这种认识为真理。这实质上等于说,有些真理无须经过社会实践便能得来,也无须经过实践而丰富和发展。

其次,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⑤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正确地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正因为它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那么,为什么只有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才能指导实践取得成功呢?这是由客观事物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任何事物都是本质和现象以及其他各种关系的对立统一体,都是变化和发展的,而决定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的趋势的只能是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所谓认识指导实践,就是以已有的认识理论指导未来的实践。这样,已有的理论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趋势,才能使实践符合于事物的运动规律,从而顺利地进行下去。然而,正如列宁所说“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⑥因而,凭具体的感性认识无法把握事物特别是复杂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我们也就无法用它来指导实践。不能用来指导社会实践正确进行的认识,也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真理”。

任何真理都能经受实践的检验,凡未经实践检验的认识,都无法判定其有无真理性。而实践所检验的都是已被用来指导实践的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本身不能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只有当它在更高的程度上被包含在理性认识之中、在理性认识得到实践的检验之后,才能判定这理性认识中的感性因素是否与客体具有一致性。然而,这里的感性因素已非具体的感性认识本身了。所以,脱离了完整的理性认识,对具体的、单个的感性认识,是无法通过实践来检验的。可见,离开了实践标准的所谓“感

性真理”是不存在的。这里要注意的是,认识的正误必须通过实践来证明,而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都是理性认识,因而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只是针对理性认识而言的。所谓认识一开始便是真理与谬误的矛盾统一,是指有人类认识以来,认识便是真理和谬误的统一,而不是具体的认识过程的每一阶段都是真理与谬误的统一。所以,“感性真理”论者认为否定感性真理的存在便与认识一开始便是真理与谬误的对立统一的观点相矛盾,也是没有根据的。

认为有感性真理存在的同志还认为,在人类早期,指导人们实践的主要是感性真理。这种看法也难以立足。由猿到人的转变这一过程中,不仅类人猿的形体在向人的形体进化,其智力也在向人的智力过渡。当这种渐变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发生质的飞跃,猿变成人,然后又在新质的基础上进行人类自身发展的量变过程。因而,在由猿到人的转变完成以后,便产生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这些区别表现在,人能够运用语词、概念进行抽象思维;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实践活动等等。

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类“自始就在思想,因为只有思维才使人有以异于禽兽”。^⑦而人的思维的特点是只有借助于概念和语词才能进行。这就表明了人类一开始便能形成概念。尽管当时人们还不能进行高度的抽象,形成的概念也比较低级,但毕竟也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形成的概念也毕竟具有一定的概括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早期人类实践的水平低下,因而进入认识范围的客观对象也非常有限,但他们对这些极其有限的客观对象的认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的,否则,他们为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的实践活动,如种植、狩猎、建筑等等,也是无法进行的。如果人类早期的“思维方式只是达到感性思维,不具有知性和理性的形式”,那么它们就无法形成哪怕是最简单的概念,从而也就无法运用它们进行抽象思维,因而其认识能

力还只是处于动物的思维萌芽状态。可见,这种观点混淆了人类思维与动物思维萌芽的质的区别。

三、从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来看,也不存在“感性真理”

首先,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包含,但不能相互等同、相互代替,这是由客观事物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所决定的。事物及其内部诸因素之间并不因其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而相互等同。“感性真理”论者从真理中有感性认识的成分来说明感性真理的存在是不妥当的。

其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同一认识过程中相互联系但又是不同的认识阶段,它们分别是人们不同的认识能力与客体接触的产物。感性认识只能反映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只有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而某物之所以成为某物,是由其内部所固有的区别于他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所决定的,因而认识与事物相符合,也就是认识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相符合,而个别的感性认识是达不到这一点的。

既然如此,我们的一定的认识能力就不能超出一定的认识范围去反映事物。如果离开感官所提供的大量经验材料,单凭理性思维去认识事物,只能导致神秘的直观;而企图直接用感官去反映事物的本质,那就必然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我们只有把两种认识能力结合起来,把感性认识作为获得真理的经验材料,对其进行思维加工,达到理性认识,才有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事物。

四、承认有“感性真理”也违反了事物自身的性质和真理的特点

首先,我们从事物自身的性质来看。任何事物都是由诸多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一切事物自身都是矛盾的,并且正因为这一命题的意义是这样,所以它和其他命题比起来是能够表达事物的真理和本质的。”^⑧如果将对事物片面、个别的感性认识视为真理,那么对同一个事物来说,就必然同时具有无数个相互矛

盾的真理,这无异于否认了任何真理的存在。列宁指出:“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仅仅)是观念(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还需要现实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也只是好像独立的和单个的(独立存在着的)。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⑨单个的存在只是真理的部分和方面,而真理则是由组成它的众多的单个方面有机构成的整体。

我们再从真理的特点来看。一般唯物主义都强调真理的客观性,这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在真理观上的根本区别。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强调真理的全面性和具体性,从而克服了在真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错误,又使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同形而上学真理观区别开来,成为科学的真理观。

真理的具体性要求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的具体经过思维的抽象再达到思维的具体即达到对具体事物的本质的、整体的认识。唯物辩证法同时要求真理的全面性,强调在获得具体真理的过程中,不仅要把握事物内部各种矛盾的对立统一,而且要考虑到它与别的事物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发展。列宁曾说:“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⑩真理的具体性包含了真理的多样性,具体真理是对具体事物的全面、正确的认识。而“片面的规定是没有真理可言的。”^⑪真理的具体性和全面性都是由客观事物自身的关系所决定的,违反了它,也就离开了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

现在,我们看到,如果将仅仅具有客观内容的认识都当作真理,实质上就与形而上学真理观没有划清界限。要彻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就不能主张有“感性真理”存在。

五、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是否认在感性认识阶段有真理的

主张存在感性真理的同志还以黑格尔、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论述来说明感性真理的存在。其实,要是对这些论述作全面的、仔细的分析,所得结论

正好相反。

黑格尔说过：

“我们所有的观念，是经过不同的阶段。”

“观念的真正内容不是别的，只是我们前此曾经研究过的整个体系。”

“绝对理念”是“至当不移的全部真理。”^⑫

以这些论述来说明黑格尔主张有感性真理存在，是没有根据的。首先，“我们所有的观念，是经过不同的阶段”，即指“绝对观念”经过存在、本质和概念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是“绝对观念”自身的表现，是它自身发展的一个过程或环节。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观点，也与感性真理不相关。相反，黑格尔认为，“在理念的进程中，‘开始’表明其自身还是自在的东西”，对于真理来说，在存在阶段“尚没有实现。”^⑬其次，黑格尔说“观念的真正内容不是别的，只是我们前此曾经研究过的整个体系”，恰是表明了他主张在“存在”阶段尚无真理可言。因为，第一，真理既然是“整个体系”，当然就不是感性认识所能代替的；第二，黑格尔是在《小逻辑》一书的最后才说这句话的，这“整个体系”是指他在本书中所阐述了的“绝对观念”由存在到本质再到概念中达到自身的同一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没有表明存在阶段有真理，而且恰恰相反。第三，在黑格尔看来，“至当不移”的认识只是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他说：“感性的东西是个别的，是变灭的；而对于其中的永久性东西，我们必须通过反思才能认识。”^⑭因而，“至当不移的全部真理”只能是系统的理性认识。

至此，黑格尔又何尝承认过有感性真理的存在？

恩格斯呢？恩格斯也一样。他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滥用“永恒真理”一词时说：“然而，不正是存在着如此确凿的、以致在我们看来给予任何怀疑都无异于是发疯的那种真理吗？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些不都是这种真理吗？”

^⑮为什么恩格斯要在真理前面加上“这种”、“那种”呢？因为恩格斯在这里说的“真理”是指杜林的“永恒真理”、“终极真理”，并以此来讽刺杜林将那些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事”也视为“永恒真理”是在小事上“用大字眼”。而恩格斯自己的观点则是与杜林根本对立的。他说，可以按照当时已有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并指出谁要是想在其中获得“永恒真理”，那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至多不过是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而在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⑯可见，恩格斯在此恰恰是否认“永恒真理”——感性真理的存在。

至于列宁在《唯批》中提出的：“有没有客观真理，就是说，在人们的表象中能否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不依赖于人类的内容？”^⑰只是强调了真理必须具有客观内容这一唯物主义真理的前提，并没有说具有客观内容的认识都是真理。这段话也不是给真理下定义；列宁在这里说的“表象”也并非感性认识阶段的那种“表象”的反映形式，而是指认识对客体的反映。因而，以之说明感性真理的存在是没有理由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认识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黑格尔的观点来看，“感性真理”都是不存在的，真理只能是正确的理性认识。

①②③⑥⑧⑨⑩⑪列宁《哲学笔记》，第133、182、181、134、144、209、210、140页。

④⑦⑫⑬⑭黑格尔《小逻辑》，第197、191、422、197、7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

⑯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8页。

⑰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13页。

从结构角度看转型期代价问题

□ 陈 春

(天津市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哲学硕士, 天津 300050)

[摘 要] 作为一个价值哲学范畴, 代价的存在本质上源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内在矛盾。具体说, 是价值选择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使代价不可避免, 社会结构是代价研究中理论和现实的结合点。本文从社会结构角度入手, 结合系统论的方法, 对代价作了哲学的探讨。文章分析了结构冲突与转型时期代价凸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并结合我国“外生促动”型的特殊转型模式, 尝试提出把社会结构整合作为当前代价问题的解决出路。

[关键词] 社会转型 代价 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8-0026-05

社会转型期代价问题的不断出现, 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 对于代价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 不少学者就代价问题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见解, 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在笔者看来, 我国学术界关于代价问题的研究依然有两方面不足: 首先是把代价问题简单化, 如不少学者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实现进步和发展, 如自然界的演化、物种的演化和社会的发展, 都有一个‘投入’与‘产出’的过程, 即都是在付出一定代价问题下发生的, 这是任何事物进化以及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代价作为成本被内在地、直接地对象化为事物发展的结果”。^①还有学者把代价定义为“对现代化发展所花费的‘社会成本’进行‘成本-效益’、‘投入-产出’分析的综合性概念”。^②这些观点虽然力图指出代价付出的必然性、必要性, 但却把代价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 从而使成本与代价的含义和界限变得非常含混, 增加了代价理解上的难度。“成本”作为经济学概念是指生产某种产品所必须消耗的东西(原材料、能量、劳务)等。但很明显, 对于最终产品而言, 所消耗的东西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并没有消失, 而是

转移到产品中, 因而不存在“价值”损失的问题。而发展的“代价”恰恰表现为某种价值被压抑、被牺牲。如果发展的代价就是指成本的消耗, 那么发展中的代价问题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另一倾向是把代价问题抽象化理解, 在代价研究上过分拘泥于寻找产生代价的终极原因, 于是“人性”、“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劳动的二重性”、“实践的内在矛盾”等所谓的“深层动因”纷至沓来, 似乎只要找到某种终极原因, 代价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种终极原因决定论往往局限于抽象的因果逻辑分析而忽视了代价的具体社会关系结构, 忽视了其活生生的发展现实, 因此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之感。代价问题是一种不断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性的历史现象, 过于抽象化的理解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

从哲学高度讲, 代价问题首先不是纯道德问题, 也不是认识论问题, 更不是“技术操作性”问题, 而是人的生存方式问题。我们知道, 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 也就是说, 人在活动前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价值目标。社会也一样, 社会并不是盲目

发展着的,它也有着不止一种价值目标,如真、善、美、自由、平等、博爱等都是。这些社会价值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人们的价值选择。人们受自己的利益支配,有意识地选择一定的手段或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价值选择。人只要是社会的人,他就必须进行价值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社会发展也就是人们进行价值选择的过程。人们的价值选择可以大致区分为“利益取向”和“文化取向”两个基本方面。利益取向是指人们把自身经济利益的实现作为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并力图使社会结构或社会的制度安排更符合自身的利益。文化取向是指人们把人作为“类的存在物”所具有的普遍特征的实现(如自由性、平等性、自觉性)作为价值目标,并力图使社会结构或社会制度安排更符合人作为人的发展要求。这两种价值取向是相关联的,但同时又总是处在矛盾状态中。其中,利益取向往往是对人的价值选择的最强有力的引导,“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③相比之下,文化取向则经常受到利益取向的压抑。

人们的价值选择并不是凭空实现的,它需要一定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的形成使人类生产和交往活动得以制度化、规范化和稳固化,从而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这些确定的形式使人们的活动规范化的同时也将人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的有限形式之内,使之受到一定的约束。这就是说,人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使人不得不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结构形式之中,而社会结构一旦形成,它作为一种中介又会超越于个人之上产生为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力量。这是因为人作为对象化的社会存在物,社会状况是他的活动赖以出发和进行的基础与前提;对于特定历史时代的人在社会中如何进行活动,即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自我,这并不能由人自身进行任意的选择或决定,而是必须以社会结构所提供的活动方式为现实根据。社会结构与社会规律既为人的各种活动提供了可能性的空间,同时也是人的活动自由与不自由的现实的界限。这样,由于

社会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有限性,价值目的只能有限地实现。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社会结构制约着人们能否自由发展。正是人类自身生存方式的这种样态,使得在人类活动中,便出现了目的无限性与目标实现的结构方式有限性这一对矛盾。价值选择的合理性要靠社会结构的合理性来得以体现。因此,人类为了获得自由发展必然先以某种服从或自我约束为代价。从更深层次上看,人类价值选择活动的实现或能否实现,必须先以中介的选择即现实社会结构的选择为基本前提和保证。还拿公平与效率这两个社会所不可或缺的价值目标来说,为什么在我国社会转型之前即在原有的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通常把“公平”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而在转型后,即在发展市场经济时,则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呢?如果把答案仅仅归结为某种观念的变化是不行的。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恐怕应该是转型前和转型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改变,“效率优先”恰恰是市场经济形态的结构要求。再进一步说,从社会系统的运行机制本身来看,社会结构演化趋向有多种可能性,但人们的社会价值选择活动经过社会结构功能体系这一中介环节的“过滤”,往往只能实现主要的社会价值目标和追求,而不得不放弃其他的价值目标和追求——这就是社会代价。

可见,作为一个价值哲学范畴,代价本质上源于人的生存方式的特殊展现,其一方面是主体的价值选择,另一方面是主体得以依存的社会结构。人的社会性本质使这两方面必然产生矛盾,这种人的生存方式的内在矛盾反映在人的价值观念上就是代价。因此,把握人的生存方式是研究代价问题的“制高点”。从人的生存方式到社会结构再到现实代价,这是代价现象发展的必然逻辑。而社会结构也就成为代价研究中理论和现实的结合点。

二

所谓社会转型,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一种从

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性结构转变的过程。它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政治、思想文化、制度规范等其他社会层面的结构转换。由于社会转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它必然不同于社会累积性渐变或某一方面的突变,而是要突破已有的社会体制框架,不可避免地打碎传统的结构整合模式,彻底改变传统社会结构性质以及内在功能机制,在此基础上,力争建立起一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结构整合模式。这种新的结构整合模式较原有模式必须结构更合理、功能更优化、价值目标更贴近社会发展与人的进步。从实质上说,它是围绕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进行的以调整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创新,是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向更高层次的迈进。当然,旧的结构整合模式被打破后,新的结构整合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结构重组过程。从旧的结构整合模式被打破到新的整合模式建立这一阶段就是所谓的社会转型时期,简称“转型期”。可见,社会转型期是具有过程性的一种过渡期,它的直接目标是要建立起一种与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相符合的结构整合新模式。

为什么转型期代价会凸显?这是与非市场经济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这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结构模式之间的转变有着必然的联系。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一般特征是,商品经济不发达,交换手段不充分,即使存在着一个社会分工体系,但分工的各个领域之间、各个部门之间以及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之间也主要不是通过市场交换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亦即在全社会范畴内不存在统一的市场机制。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条件下,维系和保证社会统一性、秩序性的整合力量,便不可能是经济的力量,而只能是借助于经济以外的政治活动的强制力并辅以精神文化活动的精神凝聚作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把个人相互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越大。也就是说,在缺乏普遍的市场关系的社会中,

除了强化共同体的强制作用,并无其他的社会整合机制。政治不过是共同体强制力量的实现方式。通过这种社会整合方式所形成的社会即是迪尔凯姆所谓的“机械团结”的社会,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社会皆属于此类社会形态。这种“机械团结”使社会政治结构的维系秩序功能上升为社会结构体系的突出的中心地位,而经济、思想文化结构则得首先服从于秩序的需要,从而使社会整合方式成为一种刚性的外在的约束机制。

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社会分工与交换比较发达,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存在,商品生产不是为生产者自身需要而生产,而是为市场生产,统一的市场使每个人的生产都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时也使每个人的消费都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控作用,市场交换手段本身就形成了一条内在纽带把每一个社会成员通过利益上的相互依赖性而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无须凭借政治强制力来进行外在的整合,此即迪尔凯姆所谓的“有机团结”式的社会整合。比之非市场经济社会刚性的整合方式,随着政治中心作用和泛化作用的消失,以往社会那种以政治的统合性为特征的领域合一状态转变为领域分离状态,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领域显示出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取向的特殊性。所以,作为支撑社会一切活动存在的组织形式及关系环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结构比以往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结构具有更大的容量,能够容纳更大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市场交换关系这种有机整合机制使经济活动从传统的政治强力下获得了解放,经济效率极大提高,为政治和思想文化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而后者的独立、健康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样一来,社会每一结构领域的活动都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追求并实现其各自的功能价值。

然而,当传统的非市场经济整合模式被打破以后,新的市场经济整合模式并不会马上就形成,从

其结构重组到整合机制确立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期间,随着传统强力整合的瓦解,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在结构分化、重组的过程中出现结构冲突。一方面传统整合模式下的模式惯性仍会顽强地维持其作用力,另一方面新的结构生长点又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伴随着结构分化和结构冲突,社会各方面发生结构的反复调整、利益的再分配以及社会成员地位、角色的变更。这些反映到社会精神层面,必然对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产生深刻的冲击,导致价值观念、价值标准的相互冲突,造成整个社会心理混乱、失衡,人们的行为选择迷茫、失范。正是这种价值冲突和价值困惑造成了转型时期代价的凸显。可见,介于新旧两种整合社会之间的社会结构冲突的客观存在使得转型期代价凸显难以避免。转型期代价凸显即是这种结构冲突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它又为结构冲突的加深“推波助澜”。代价的凸显虽然看上去只是社会价值问题,但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其背后社会结构的裂变,阶级、阶层、组织、群体、社区、家庭等等,这些组成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的社会单位都在这场结构冲突中发生着碰撞与分化。原来维系这些社会单位的整体的价值体系瓦解了,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又尚待时日,就是在这种“价值失重”的情况下,代价问题被提升到了社会评价的明显位置,甚至那些我们看来是正常的代价付出,也往往因过于敏感而被人为地夸大。

三

既然转型期代价的凸显与新旧社会结构冲突有着内在的联系,那么对某一具体国家来说,传统社会结构形式与状态如何就从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该国社会转型的性质与特征,从而间接地影响着其社会代价问题。

历史事实表明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基本上经历了一种“自然内生”型的转变过程。所谓“自然内生”,即指这一转型经历了从

16到18世纪大约200年的漫长的自然演进,现代性因素是在其传统社会结构内部得以培育、萌芽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无论是新教伦理还是市民社会,它们都是从封建社会中内在成长起来的结构分化的产物。此外不同结构中的新要素,由于其同质性而能够很快地结成互动关系,发挥功能效应,从而使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的变革往往相互补偿、互相推动。因此,这种自下而上式的社会转型尽管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社会冲突和震荡,但由于上述原因,使得这些社会冲突和震荡在漫长的自然演进过程中得以分散和弱化。

与西方发达国家“自然内生”型的社会转变相比,中国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形成了以农业为中心、以家国为网络的一种整体化的内在机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政治领域的宗法专制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儒家正统文化构成了一种高度平衡的刚性状态,使我国始终难以建立起完善的商品经济(更不要说市场经济)体系,因而也就不具备从根本上冲击传统社会结构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我国传统社会结构内部缺乏一种自发内生的现代性因素,现代化对我国传统社会来说不可避免地具有异质性。这就决定了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然内生”型相对应的一种“外生促动”型的特殊模式。正是这一“外生促动”型的转型模式,使得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结构冲突更为激烈,各种结构关系更为复杂,而我国转型期的代价凸显正是这种激烈的结构冲突在人们社会价值层面上发生的必然的客观的反映。

毋庸置疑,无论何种社会形态下,必要的代价付出都是难以避免的,要想逃避这种必要的付出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但在此前提下,如何使代价减到最小,却是我们应面对的主要问题。结合我国“外生促动”型的特殊转型模式,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在我们把握和解决代价问题时应尤为予以重视。

1. 我国非市场经济历史较长久,对整个国家和

民族产生的影响较深,尤其是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统治下而形成的一些封建、保守、腐朽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糟粕更是很难在短时期内清除干净。这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体系传统根基比较牢固,一旦着力发动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变革时,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就会形成“短兵相接”的局面,属突发性的正面交锋。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还是国民的心理承受能力都缺乏自然过渡、逐渐融合的演进过程。这就需要在把握转型期代价的同时,也应相应提高全民族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背负代价的能力。

2. “外生促动”型的进化模式,决定了我国的社会转型只能走一条自上而下的自觉强制的定向发展道路。而不能仿效西方先发国家那种自下而上式的渐进模式。时代发展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必须用较短的时间去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所取得的成就,这使得我国的社会转型必须根据实际国情对各结构部分的轻重缓急有所取舍,在必要时甚至不惜以牺牲或暂缓某些方面的发展来换取另一方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先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又告诉我们,社会转型发展也不能片面地追求“单项突进”式的战略,而必须努力使社会结构整体都获得转变,这才符合社会转型的真正的本义。而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基于结构选择所带来的发展战略的矛盾,对这一矛盾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转型期代价问题

的解决。

3. 与早发国家不同,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所面临的已是崭新的世界发展格局。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同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是同一的,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则是在“世界历史”已经形成且自身明显处于落后的背景下才开始的。这时,发达国家利用其雄厚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优势已经牢牢地控制了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经济格局。改革开放一方面为处于后发位置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一些有利的外部条件,使得中国能够在较高的起点上赶超发达国家;但另一方面它也使本国社会结构不可避免地与国际社会结构体系发生直接的碰撞。由于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客观存在,这种碰撞无疑会加剧国内的结构冲突,使转型期代价的付出大大提高。当然,这种国外因素在转型期里是次要的,但却也不容忽视,尤其随着日后国际交往程度的日益加深,这种代价的威胁将会更为突出。如何解决依附与发展关系,怎样尽量减少这种外来的潜在代价,将是我们值得重视的长期课题。

①李欣雁:《实践:代价与发展的统一》,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96年第1期。

②王雅林:《“代价”范畴及其意义》,《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责任编辑:罗 苹

从价值观与社会结构 来看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 林勤青

(嘉应大学教务处, 广东 梅州 514000)

[摘 要] 公有制的价值意义使其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和主体地位,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质量上, 而不是在数量上。从社会结构来看, 公有制有与其它社会构成要素协调的必要性。在现阶段,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

[关键词] 公有制 价值意义 社会结构 所有制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2000) 08- 0031- 02

“十五大”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要对我国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 对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要“抓大放小”, 公有制的主体和主导地位主要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总的方面是要加强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私营经济, 而相应地缩小公有制所占的比例, 以提高公有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本文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价值意义、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等方面就上述问题进行论述。

一、公有制的价值意义使其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和主体地位

公有制是私有制的对立物。资本主义社会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 从社会价值观的层面来看, 它以物为核心, 一切社会关系都以物的关系表现出来。资本家以物作为人的生产行为的价值取向和目的, 忽视了创造物的人的存在和价值。公有制使生产资料成为劳动者的所有, 人(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人, 人的需要和价值实现成为活动的中心, 所以, 当私有制发展到物的创造与人的价值实现不相符时, 必然会出现以人为本的公有制。公有制的价值意义

在于: (1) 它不仅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所有制, 更重要的是在于实现了人们对生产资料平等的占有这一伟大的理想。(2) 它消灭了剥削, 使劳动与报酬相联系, 实现了人们对财富占有权利的平等要求, 实现人的行为价值的物质要求。(3) 它体现了人们生存权利的平等, 只有靠劳动, 才能生存。人们具有平等的参与劳动的权利和平等获得报酬、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权利。分析公有制的价值意义, 不难看出: 其具有理想性和物质性。

从公有制的价值理想性来看, 公有制作为人们要求平等, 特别是经济利益平等的理想, 强调了人(劳动者)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意义, 这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强调物(资本)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存在能极大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比较, 具有无比优越性。

公有制的价值意义还具有物质性。公有制的先进性必须要表现为能使社会生产更快地发展, 能为社会创造比私有制条件下更多的社会财富, 实现在此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 使人成为完全的“自由人”。公有制使人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 以人为本, 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满足了劳动者自尊、自爱、

渴求自我的愿望,并把这一满足转化为生产的动力,创造出巨大财富。

公有制的价值意义使公有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中不仅是主导、而且是主体。公有制的价值不仅是精神的,而且是物质的,如果说它的主导体现在人的价值目的上的领先性——如前所述,是人们对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平等权利的追求及实现,即人的价值体现,那么它的主体地位就必然应表现在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上,这就要求,公有制必须有引导经济运行的强劲的实力。公有制的主体作用,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更明确地说,是在于它在创造物质财富时的创新力和增殖力。这是所有制结构调整中应予充分注意的。

二、公有制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要素与其它社会构成要素协调的必要性

从社会结构来看,一个社会的结构有着许多的层次,有重要的、宏观的层次,也有次要的、微观的层次。不同的层次,在社会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其价值也就不同,但无论哪一个层次,都是构成社会的一个要素。另一方面,社会的结构又是复杂的,它不可能是单一的结构。公有制是构成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中的生产资料结构的要素,它从属于社会所有制这个大的社会构成面之中,它在这个层级领域中发挥作用。其它的所有制也是构成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要素,它们也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公有制同其它的所有制形式一起发挥作用,因而必须与其它所有制协调发展。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实质上就是所有制各要素的关系调整,这个关系的调整表现在数量比例及质量上。公有制的价值意义,使它成为起主导和主体作用的要素。在社会主义诸多的所有制形式中,由于公有制符合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符合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价值理想和物质的要求,所以必然处于主导和主体的

地位。

与此同时,公有制作为社会结构的要素或层面,其所占比例的多少,完全取决于社会结构整体的需要,要使社会结构合理,各部分比例协调,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在安排其内部各要素时必须要有主、次排列及位置分布和数量比例。社会结构的安排基础是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和结构。从我国目前来看,生产力的状况总体上来说生产水平不发达,多层次,不平衡。在我国农村中畜力或小农机生产仍占大头,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国营的大农场占的比例不大,但产值高。工业中大量存在的是半机械化的生产水平,虽有一些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的尖端产业,但数量不多。因此,这种生产力状况决定了多种所有制并存。非公有制经济还有发展的很大潜力和优势,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逐年上升。现实的经济状况和结构告诉我们,公有制不能占绝大多数的比例,如国营农场。另外,在人们的头脑中,多年来的封建小农思想还在作怪,还没有完全接受和理解现代社会经济及公有制的价值意义,而把对公有制的认同停留在“大同”“平均”的认识上,这一社会意识领域的思想状况,也使公有制不能实现其价值意义而成为占社会所有制结构绝大多数的所有制。当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必然是适当减少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比例,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以实现社会结构的总体平衡。

参考书目:

[1] 唐家柱:《从价值观看中华民族文化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载《社会主义研究》(京) 1999 年第 5 期。

[2] 刘永佶著《经济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 1998 年版。

[3]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教研室编《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责任编辑:叶金宝

一本阐发社会发展观的力作

——读李恒瑞主编《世纪难题的破解——社会改革开放新论》

□ 余少波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管理研究所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1)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8-0033-03

李恒瑞教授主编的《世纪难题的破解——社会改革开放新论》一书(以下简称《新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我们广东省学术界值得庆贺的事情。《新论》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是省委党校一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在李恒瑞教授带动下“群体攻关”的辛勤劳动的结晶。它的出版发行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研究、坚持、运用邓小平理论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意义。我有幸较早阅读书稿,觉得该书有如下特点。

一、富于创意

“创新”是哲学与任何科学理论的灵魂,然而“创新”是非常艰难、复杂和严肃的。《新论》立意新颖,在理论上富有创新精神。诚如作者在“绪论”所指出,“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提出的路线、政策、思路,也是颇具特色的新的理论观点,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们经过长期的研究,把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新鲜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观的丰富内容有机结合起来,提出“改革开放”首先是一个“时代特征问题”、是“社会发展普遍性、常规性现象和客观规律性问题”,并从主客观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特殊与普遍相统一,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这在学术上就富有创新精神。全书从社会发展观的视角,对

社会改革、社会开放这一对范畴的基本内涵、它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演进线索、在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国家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发展中的(特别是近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它们演进的规律性都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and 论证,初步构建起“社会改革开放理论”的体系。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和学说建设,该书可贵之处还在于总体的逻辑结构比较严密完整。除了“绪论”对全书思路从总体上描述外,第一篇对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论作了多向度的概括和阐释。第二、三篇分别对社会改革论、社会开放论作了条缕分明、深入细致、材料丰富、有血有肉的说明和论证。第四篇,集中阐述作为社会发展观的改革开放,强调改革与革命一样,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方式,开放则是创造社会发展的良好交往环境。从而在哲理上论证了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的“根本发展战略”。这样的理论框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体现了该书的实践指导意义。正如作者所声明,他们在研究过程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参阅、吸收国内理论界同行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资料。然而作者们没有停留在引述同行的观点和资料上,而是能够继续前进,经过自己的再认识、再创造,升华出“自成一家”之言。如对“东方社会主义论”创新的概括;对“更加开放的当代世界”的分析和

开放政策的功能的概括;对改革开放这对范畴的理论概括和它在社会发 展观体系中的定位的分析等等。

二、阐释清新

《新论》另一突出的特点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发 展观作为自己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作者们在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结合它的时代背景,着重阐发它的精神实质。强调从我们当代的实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发 展观的核心——社会结构论,作多向度的解释。可以说,这是作了一项很有意义的“返本开新”的学术工作,也表现了作者们能够真正掌握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已过去一个半世纪了。诚如作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得出一系列的科学结论,阐发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们的继承者列宁、普列汉诺夫、斯大林,也从不同角度作过概括和阐释。事实上,毛泽东、邓小平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情况出发,也有自己特色的理解和阐释。作为学者,就必须进行对比研究,对理论的精神实质作出多向度的概括,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新的发挥。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唯其如此,才能避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才不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

我觉得,该书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结构的经典概括、列宁的独特概括、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以及斯大林“简单化的概括”是实事求是的。对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的分析,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多种划分方式,以及学界争议最多的“三形态图式”与斯大林“五形态公式”的关系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充分显示了李恒瑞教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深厚功力。更为可贵的是,作者立足社会生活的实际,提出自己的社会结构学说的新见解。作者忠实于马克思社会结构的方法论原则,依据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对社会结构作出新构想、新概括,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说明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

揭示社会结构系统的演进;根据我国近现代社会特殊情况,提出“复合结构”(包括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观点;进而提出社会经济结构对生产力的“复合适应”,提出走出“单一经济基础论”,创立“复合经济基础论”,提出从“复合经济基础”看政治形态等等。尽管这种观点会引起不同的意见,甚至尖锐的批评意见,但我认为它是颇有解释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的功能的,是有学术价值的。显示了李恒瑞教授勇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出新的阐释和发挥的创造精神。

三、有历史感

把改革开放作为实现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提出而加以实施,这是邓小平的重大贡献之一。作者进一步提出,社会改革开放不单单是一个主观方面的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特征问题,一个社会发展的客观的普遍规律性问题。那末,如何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事实来加以论证,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该书作者对此非常重视。他们努力搜集中外古今各国的有关资料,选择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事实来加予论证,材料翔实,有说服力。使人们读后,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改革问题、开放问题,有较深刻的印象,有丰厚的历史感。《新论》力图说明社会改革的历史形态,依次对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作了较详细的叙述,还着重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改革的情况和经验进行分析。这方面主要是用西方社会的事实。同时,作者还对比分析了我国与前苏联社会改革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也颇有启迪。至于社会开放的问题,作者对比了社会的封闭与开放状态,用较充分的材料证明,社会是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趋势。近现代东西方走向开放经历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开放道路尤为复杂曲折,这也有相当力度。

还应指出,对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即社会结构论,该书在作出新的构想、新的概括时,特别着力于我国社会在近现代发展的历史状况的剖

析。用以证明,作者提出的观点,不仅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方法,而且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概括。对此我读后倍感亲切。掩卷而思,作者的“复合结构论”、“复合适应论”,是令人信服的。是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解释的一种科学的构想。相信经过作者继续努力,加强其涵盖性和深刻性,是会被学界接受的。

四、现实性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它不仅表现在研究者要根据现实的需要、现实的情况,提出课题,进行探讨,发现本质和规律,而且表现在研究者作出的结论、假说、构想,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充实、修正、完善。社会改革开放新论当然也不能例外。该书作者充分重视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立足于当代世界的现实和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来展开该课题的研究。同时,又重视这种研究,不是“纯学理”、“纯学术”的,而是紧密结合于、服务于我们正在做的伟大实践,力求其学理性、学术性的说明,能用之于社会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去。

该书对社会改革的研究,凸出对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经验的哲学思考,强调要在改革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强调社会主义改革应注意发挥改革主体的积极性;强调社会主义改革要处理好改革策略的选择和控制;强调要处理好改革的共性与改革模式的多样性的关系;还指出要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前进性与曲折性。这些都是很有针对性、

现实性的。对社会开放的研究,也紧密结合我们社会开放的现实问题。作者在发挥邓小平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的时候,强调社会开放的观念和政策。指出要适应世界潮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事业,如不继续破除“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封闭观念,树立开放观念、开放意识,党的开放政策是难以得到坚持和发展的。另一方面,全方位的开放,在当前的世界政治格局、文化背景、经济结构的现实中,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冲突、交流、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该书针对20年来的情况,提出处理好“开放中的互动关系及矛盾”,强调要掌握好开放“度”等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很有现实性的。

当然,作为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特别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说建设,我希望作者还应继续努力。例如,某些篇章的逻辑结构还可更加严密;对社会经济结构,不要忽略与生产、交换、分配关系相适应的消费关系的研究;对于社会的文化结构,则是该书研究薄弱的环节,希望作专门研究。还有一些提法不够准确,应在修改时修正。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可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唯物史观与社会发展观、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别与联系。但是,瑕不掩瑜,纵观全书,确实是一本阐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力作,是一本阐发邓小平理论重要内容的优秀著作。

责任编辑: 罗 苹

中国文化与心理学

□ 高 岚¹ 申荷永²

- (1.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博士, 广东 广州 510631)
2.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

[摘 要] 本文从中国文化的角度, 对心理学以及当代心理学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阐述了中国文化所包含的心理学的意义, 以及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及其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文化 心理学 中国文化心理学 东西方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 B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0) 08-0036-06

我们于2年前, 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一文, 表达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 来分析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的意义, 进而发挥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心理学的精神与思想。那么现在, 以“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为题目,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 从中国文化来看心理学; 来看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 或者说应该具有的影响。我们拟就三个方面, 来展开我们关于“中国文化与心理学”的思考。

一、为西方提供智慧——接触“东—西方心理学”

“东—西方心理学”又被称作“智慧心理学”, 是西方心理学家们对东方文化和心理学思想的一种追求。“西方的科技与东方的智慧”, 是人们所常听到的。就心理学而言, 实际上, 西方学者们对“中国智慧”的神往, 往往并不亚于中国的心理学家们

对西方“认知心理学”的迷信。“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成为西方心理学的学院派主流, 但是, 心理学的意义与发展往往并不局限在“学院派”的掌控之中。且不说“人本主义心理学”一直是西方认知心理学的重要补充, 而作为心理学发展之真正主流内容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分析, 包括心理卫生与心理教育, 便一直在认知心理学涉及的范围之外, 一直受着传统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 “东—西方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新的发展, 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在考西尼 (R. Corsini) 1984年出版的《心理学百科全书》中, 便已经写入了有关“东—西方心理学”的词条。在我们的理解中, 东西方心理学并非强调东西方心理学的差异, 而是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的沟通交流与整合。对于这一发展中的心理学领域, 同样需要我们的理解。

若是把“东—西方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术语,那么它的基本内涵是要把东方的哲学与心理学思想传统,包括中国的儒学、道家、禅宗以及印度佛教和印度哲学、伊斯兰的宗教与哲学思想、日本的神道和禅宗等,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及实践结合起来。由于“东—西方心理学”这一概念主要是西方心理学家们提出来的,所以,它所强调的是对东方思想传统的学习与理解。

早在 60 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墨菲 (G. Murphy) 便已经开始关注东方的心理学思想传统。随着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类潜能运动,东方的禅宗与道家思想迅速在西方传播。我们考察了 70 年代后期以及 80 年代出版的《人格心理学》专著,“东方心理学”开始成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的章节。比如,霍尔 (Calvin S. Hall) 与林哲 (Gardner Lindzey) 在其经典性的《人格心理学》新版的时候 (1978),提出“由于人们对东方思想日益增长的兴趣,我们认为有必要提供有关东方人格理论的内容,以及论述这种人格理论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①于是,霍尔与林哲专门邀请后来以“情感智力”而闻名的东方心理学研究者高尔曼 (D. Goelman),撰写了其中的第 10 章:“东方心理学”。

1996 年,我们作为富布莱特 (Fulbright) 学者前往美国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时候,曾经与内布拉斯加奥马哈大学心理系的格尔登·柏克 (Gordon Becker) 合作,一起为学生主讲“东方心理学”的课程。格尔登·柏克是最早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之一。他自己坚持“坐禅”已经有 20 余年,其老师是曾经在 60 年代参与建立美国旧金山第一所禅院的大忍和尚 (Dainin Katagiri)。按照其原来的教学计划,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印度的哲学与佛教,以及日本的神道与禅宗。尽管他会提到中国儒学和道家哲学,但并非重点。于是,我们的合作也正是从把“中国文化心理学”作为东方心理学的主流,乃至主要内容开始。整整一个学

期的授课获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于是,我们开始邀请其他一些在美国大学开设“东方心理学”课程的教授们,一起研讨了“东方心理学”之课程设置与内容,以及东方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发展。

后来,我们前往曾经建立美国第一个“东—西方心理学系”的加州亚洲整合学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并且与负责东西方心理学专业的莱朗 (Leland van den Daele) 博士一起合作,进行“东—西方心理学”的有关研究;同时为帕露·阿图 (Palo Alto) 的“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 (Institute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的博士研究生们讲授“中国文化心理学”。当这些有关东方心理学的体验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获得了某种系统性的理解;当我们逐渐深入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与理解的时候,“东—西方心理学”的深层意义也日益呈现。

二、为智者提供灵感——中国文化与西方心理学家

我们曾经读过一本《爱默生与中国儒学》的书,感叹不已。西方智者如爱默生,竟然与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内在的联系。于是我们告诉自己,之所以如此喜欢爱默生,大概也是因为我们具有这种内在的接近吧。我们也会看到《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的专著,作为近代数学大师、计算机原理的奠基者,竟然如此热衷于中国的《易经》,并且从中直接获得灵感,同样让人感叹不已。同样的故事有许多。心理学中也是如此,能够称上智者的心理学家如荣格,如马斯洛,如弗洛姆,无不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接触,也都直言不讳从中所获得的灵感。

(一) 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

当马斯洛在创立其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的时候,他也勾画出了“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最初思路。马斯洛自己正是在借助于东方思想的基础上,来提出其“自我实现”主张的。伴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发展的个人潜能运动,东方传统的禅思与冥想 (meditation) 技术,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心理与行

为发展。

早在 50 年代,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系形成的初期,马斯洛曾经在其日记中记录下这样的想法:“东方文明中的出世者,如禅师与和尚等,是否比西方文明中的自我实现者在情感上更加和谐呢?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于是,马斯洛意识到:“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把东西方文明中关于自我实现和内在和谐的观念结合起来。”^②在霍夫曼撰写的马斯洛传记中也提到,通过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者韦特海默,马斯洛接受了东方思想的影响。那是在 1942 年前后,马斯洛听了韦特海默的著名讲座:“存在和行为”。其中韦特海默强调指出,西方心理学的偏见在于太看重“目标寻求”行为,需要学习东方思想家对人类经验中诸如游戏、好奇心、畏惧、审美乐趣以及神秘状态等“无动机的”和“无目标的”性质的重视。韦特海默的“这一演讲对马斯洛正在形成中的人格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霍夫曼这样总结说。同时,霍夫曼指出,马斯洛这时还接触了中国道家哲学的文献。“马斯洛开始阅读论述东方哲学的书籍,尤其是关于中国道家的书籍。”^③

“超越性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同时也是东西方心理学的进一步发展。马斯洛在 20 世纪 60 年代,便已经提出了“超越性心理学”的构想,后来,在美国的帕露·阿图成立了国际超越性心理学研究院,该学院随即成为致力于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国际中心。

1980 年,沃尔斯(Rogers N. Walsh)等人主编了体系更为成熟的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取名为《超越自我》(Beyond Ego: 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in Psychology)。作者们把超越性心理学描述为:“旨在发展一种与健康和幸福有关的人类体验和行为的心理学。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的潜能,超越性心理学要整合西方的科学与东方的智慧。”^④10 余年后,他们又出版了该书的续篇:《超越自我之路》(Paths Beyond Ego: The Transpersonal Vision)。在这新版的

超越性心理学教科书中,作者们强调了超越性作为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意义。其实,其中所反映的,恰恰也就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所提出的人心与道心的结合所重视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 荣格与分析心理学

瑞士心理分析家卡尔·荣格,是 20 世纪心理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突出贡献的人物,而他的突出贡献,充分反映着中国文化的意义与影响。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中,他曾以其童年对石头的冥想为其心理发展的重要开端,荣格后来知道,那是他与道的缘分,一种心灵的感应和沟通。与许多西方的智者一样,荣格对被称为“蝴蝶道者”的庄子从来都是心向往之。

在其自传的最后一页,已经 80 余岁高龄的荣格,心有感触地说“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这正是此时的我所感受的。老子是具有超然领悟力的典范,他能够体验到价值与整体,体验到一致性。于是,老子在其老年的时候,愿意回归其自身本来的存在,回归于那永恒而未知的意义之中。”

^⑤这也就是荣格自传的结束语,于是,我们不难看出,荣格与“道”的内在沟通。

荣格通过汉学家卫礼贤,充分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精蕴,他被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所深深地震撼了。荣格曾经这样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⑥这是荣格对于《易经》的理解,以及其对于《易经》之情感的表达。荣格说,“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生而有幸能够与维尔海姆,与《易经》的预见性力量,做直接精神交流的人,都不能够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个‘阿基米德点’,而这一‘阿基米德点’,足以动摇我们西方对于心理态度的基础”。^⑦这个“阿基米德点”,是荣格对于《易经》的接受和理解,而这个

“阿基米德点”，也正是荣格心理学发展的关键。

荣格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表达：“维尔海姆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和具有价值，是因为他为我解释与证实了我过去一直在追求、在思考、在向往以及在从事和研究的东西”。荣格说，“维尔海姆的工作，给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基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世界观的中国文化基因”。^⑧这是荣格对于维尔海姆工作的理解，也是荣格对于中国文化的向往。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荣格将自己称作维尔海姆的学生，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學生。

（三）中国文化的广泛影响

除了荣格、马斯洛之外，中国文化对西方心理学乃至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影响是广泛的。我们仅在此选择所熟悉的几位西方心理学家，作一综合性的描述。

与荣格和马斯洛同样具有影响的弗洛姆，曾经出版《禅与精神分析》，那是他从东方获得灵感的切实体验；其中弗洛姆对道家人格和思想的向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弗洛伊德，也会在他的著作中，借用或者是引用中国文化，从中获得启发。他本人也曾经在写给将其传记翻译成中文的章士钊先生的信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其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⑨

尊敬的教授先生：

无论您采用什么方式完成您的设想，无论是在您的祖国——中国开辟心理分析这门学问，还是为我们的《意象》杂志撰文，以贵国语言的材料来衡量我们关于古代表达方式的推测，我都非常满意。我的讲义里引用的中国材料，出自大英百科（第十一版）的一篇辞条。

顺致崇高的敬意

您的弗洛伊德

1929, 5, 27

最近十几年来，加德纳（Howard Gardner）的智

力新理论一直是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最重要的理论发展之一。加德纳本人是目前美国认知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但他的研究和理论，以及他目前研究与发展的方向，皆表现出一种对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呼应。他本人曾于1987年访问中国，随后不久他在美国《今日心理学》上发表了“我们应该从中国学习教育吗？”一文，详细描述了他所感受的中国文化及其影响。1989年，他出版了《敞开心灵：中国对解决当代教育困境的启迪》一书（Gardner H. 1989），更加全面地论述了他从中国文化中所获得的心理学意义。

高尔曼（Daniel Goleman）曾经在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关于情感智力的研究，并且于1995年出版了《情感智力》一书，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当我们与高尔曼博士通讯和交往之后，始知道他是一位重要的“东方心理学家”。他曾经深入地研究佛教心理学，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道家的心理学思想传统尤为倾心。

黑尔曼（James Hillman）是当代“原型心理学”的主要发展者，其著作等身，多有真知灼见，影响深远。我们曾与他交往多年，听他本人的演讲应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对于中国文化，对于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黑尔曼从来都是充满感慨与感激。正如他本人所说，那中国的太极图就是一种永恒的原型，永远都散发着启迪人心的灵光。

当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主席托马斯·科茨（Thomas Kirsch）与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下任主席等人代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在1994年访问中国的时候，所演讲的题目便是“中国的道与分析心理学”。1995年8月，我们曾受邀前往瑞士苏黎世，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第13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议。与会者超过500人，来自世界各地，表现了目前国际间分析心理学或荣格学者的强大阵容。尽管这些分析心理学家遍布世界各地，其各自所使用的语言和研究兴趣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却都有着一种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中

国文化的仰慕和追求。大部分分析心理学家，都是把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作为自己心理学发展的一个基础。我们曾经在 1998 年 12 月组织与主持“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⑩与会中外学者 80 余人，会议所收到的几十篇论文，正是对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总结，正是东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反映，也正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的体现。

利策玛 (R. Retsema) 博士曾任爱诺思基金会 (Eranos Foundation) 的主席 40 年之久，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爱诺思《周易》本版的主要翻译与撰写者。而“爱诺思”本身，即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家，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的纪念碑。“爱诺思”⑪这个名字在西方具有东方的象征性意义，因为从其孕育和产生之日起，她便与中国文化，尤其是《易经》，结下了不解的渊源。爱诺思的创始人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夫人 (Olga Froebe-Kapteyn)，最初正是由于对《易经》的兴趣，邀请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或《易经》学者聚会，如理查德·维尔海姆 (Richard Wilhelm)、鲁道夫·奥图 (Rudolf Otto) 和卡尔·荣格等，为爱诺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年都要举行的“爱诺思圆桌研讨会”，早已成为国际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活动，也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心理学，影响世界的见证。

三、为心理学立心——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

我们在“心理学与中国文化”⑫一文中曾经说过，西方的心理学家将中国作为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在追求中国的文化与中国文化中的心理学；而我们中国的心理学家则是在“念佛生西方”，将心理学单纯作为源自西方的科学。所以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因为引进了西方的“psychology”，接受了西方的“mind”，而丢弃或忽略了自己的“心”。在我们看来，惟有“心”与“脑”的结合，才会产生真正的心理学的智慧，也才能够有真正的人性的思维。

实际上，通过西方心理学家们的努力，当代的心理学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躯体，并且五官俱全，也有了一个注重认知的头颅。但是其所缺少的，正是一颗“心”。而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理学中，所蕴含的也正是这种“心”的意义。

若是说我们心理学的目的是增进人对其自身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自我或自性的发展。自我的发展应该是一种整合性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一种理解和信念。我们不但要发展我们的 Ego，而且要发展我们的 Self；我们不但要发展我们的头脑，而且要发展我们的“心”。

于是，一种为了人的整合性发展的心理学，也应该是一种自身具有整合性的心理学。因而，心理学的整合与发展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当我们初次读到查普林和克拉威克合著的《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的时候，便曾经为他们对于心理学整合性发展的期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其著作的“结论”中说：“当这本书的第一版约 20 年前出版的时候，我们曾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认为未来心理学家的任务，是最终发现一种能整合一切观点于一体的统一的原理。”但最后他们谨慎地说：“心理学的遥远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难说。就近期而论，似乎这一领域的研究将继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重点经常转移，定义性的观点、方法和理论非常繁复。因此，我们只能总结说，心理学在保留这些特征时将反映出人的本性。”⑬若是心理学能够真正反映出人的本性，那么这种心理学就必然是一种整合性的心理学。

在准备“第一届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们为大会设计了一个会标，取自汉字“思”的象形，上面为“头”，可比喻为西方心理学，下面为“心”，可象征中国文化心理学。

我们在大会上也专门为此作了一个说明：东西方文化，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学意义，既有明显的不同，又有潜在的一致性。作为其不同，可以成为我们相互学习的理由，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与交流来相互补充；作为其潜在的一致性，可以作为我们共同努力与探索的目标。这正如分析心理学的目

的,追求一种对人类心理的整合性的理解,并且致力于促进这种整合性的发展。尽管会议的主题是东—西方心理学的对话,但是我们以“思”为象征,所强调的并非是东—西方的差异,而是其中的统一性或整合性;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文化心理学,以及我们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追求,也在于其中的统一性与整合性。

《易经·系辞》中注解“咸卦”之感应时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其中所包含的意蕴,也是一种理论的整合性,也是心理学的整合性意义。我们希望,心理学的这种整合性发展,将真正体现东西方心理学的价值,将真正成为反映人的本性的心理学。于是,我们在国外以“Psychology of Heart”(“关于心的中国心理学”)来讲学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弘扬我们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意义,同时,也是想以此题目,来引发西方的心理学家们,对于自己本心及心灵的重视。这心,是人类之心,是人类所禀赋的天地自然之心。因而,这心是同一的,这心具有统一性。当我们的心理学真正拥有了这心的时候,我们也就拥有了一种统一的整合性的心理学。

①Calvin S. Hall and Gardner Lindzey. *Personal-*

ty Psycholog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e 1978.

②马斯洛《洞察未来: 马斯洛未发表过的文章》,霍夫曼编著,许金声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4页。

③霍夫曼《马斯洛传: 做人的权利》,许金声译,改革出版社1998版,第107页。

④Rogers N. Walsh. *Beyond Ego: Transpersonal Dimensions in Psychology* J. P. Tarcher, Inc. Los Angeles 1980, P. ii, Introduction.

⑤Jung C. G.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5, P. 359.

⑥⑦⑧Jung C. G. Wilhelm R.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New York: Causeway Books, 1975. P. 141—147.

⑨转引自《中国心理学史资料选编》第四卷,燕国材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

⑩高岚、李群《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载《学术研究》1999年第2期。

⑪爱诺思: Eranos, 国际著名基金会,欧洲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位于瑞士阿斯科纳。

⑫申荷永《心理学与中国文化》,载《光明日报》1997年3月1日。

⑬查普林等《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林方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64页。

责任编辑: 叶金宝

为什么会有免费的午餐

——自由软件产品的经济学评析

□ 周兆生

(复旦大学经济系, 上海 200437)

[摘 要] 自由软件 Linux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产权不受商品化软件的版权的制约, 可免费、自由地使用; 它的生产不是由传统经济组织实现, 世界各地有数十万计算机专业人士、经验丰富的黑客等共同改进和维护着这个系统。自由软件的上述特征, 它究竟是社会现象、技术现象还是经济现象? 本文抛开目前流行的局限于技术甚至心理的解释, 着重对其作出技术经济分析, 指出网络外部性、正反馈效应与对创新的管理等是自由软件流行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

[关键词] 自由软件 Linux 操作系统 网络外部性

[中图分类号] F0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0) 08- 0042- 05

一、问题的提出

Linux 是一个学生首先创作的、得到无数计算机专业人士及软、硬件公司的支持。自由操作系统软件, 其在性能上已经超过 Windows NT, (服务器)市场占有率 1999 年已达到 23%, 暂居第二位, 已对微软形成重大威胁。

Linux 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 GNU (自由软件体系) 的一员, 遵循公共版权许可证 (GPL), 秉承“自由的思想, 开放的源码”的原则, 成千上万的专家/爱好者通过 Internet 在不断地完善并维护它, 由于“好事者”众多, 所以它的功能 (尤其是网络功能) 十分强大, 可以做网关、路由器、嵌入式系统等等, 随着 Linux 的发展衍生出来的应用远远出乎开发者 Linus 本人最初的预料。经过业界的共同努力, Linux 已成为一套成熟的操作系统。

目前软件业是靠的“Copyright”版权法, 迫使客户花费巨额资金购买软件, 而自由软件运动倡导依仗提供服务 (如技术支援、训练) 来获取应得的

报酬, 基本准则就是“资源免费, 服务收费”。这种商业模式获得了软件与硬件商的大力支持。

本文的目的丝毫不在于鼓吹自由软件的免费特点, 反对盈利。相反, 作者认为利润不仅是一种商业目标, 也是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完善手段: 程序员的开发活动, 必然要付出代价, 而付出这一代价值不值得? 小到个人行为, 大到公司的商业战略, 如果没有经济体系提供的竞争手段, 必然会失去优劣比较的依据, 从而迷失方向。本文的分析旨在指出一个基于互联网而存在的普遍现象, 那就是现存经济组织在吸收外部资源的机制和手段上有待调整, 尤其是针对知识产品的生产。网络作为一种信息交流机制可以上升为一种协调机制, 从而依据这种协调机制构建虚拟组织; 网络甚至可能直接传递和交易智力成果, 形成基于网络的交易以及参与交易的组织形态。尼葛庞帝曾在中国演讲时说过: “正如电梯改变了建筑物的形态, 汽车改变了城市的形态, 比特也将改变现存组织的形态, 包括公司、国家和

社会的结构。”

二、为什么免费？——网络外部性分析

1. 网络外部性：不少人发现因特网上有大量的免费软件可以下载，最近甚至有免费的 PC 提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免费的午餐”，它们究竟是一些商业把戏，还是世道变迁的产物。我们在这里尝试提供一个关于“免费”的经济学分析。

假定消费者之间不发生相互影响，按照经典经济学的分析，对某一软件必然存在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然而，在网络经济中有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就是产品的价值受网络外部性 (Katz and Shapiro, 1986) 影响。例如第一台传真机几乎没有价值，因为几乎不能给谁传递什么东西，但是从第二台传真机开始，传真机的价值开始增加——传真机的应用范围越广，单个传真机的价值越大（不过这种增加的速度是递减的）——由网络外部性决定的“网络附加价值”是递增的。因此消费者购买一件网络产品，如电话、传真机等，他的需求曲线应该是“传统需求曲线”+“附加值曲线”，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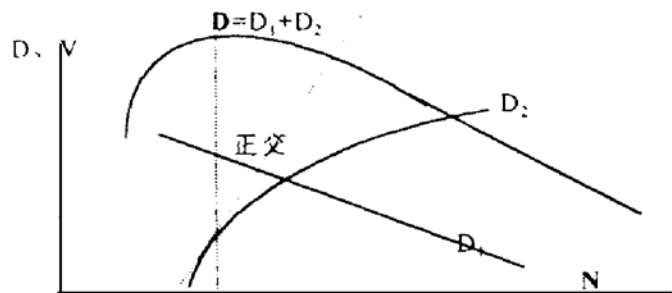


图1对网络产品的需求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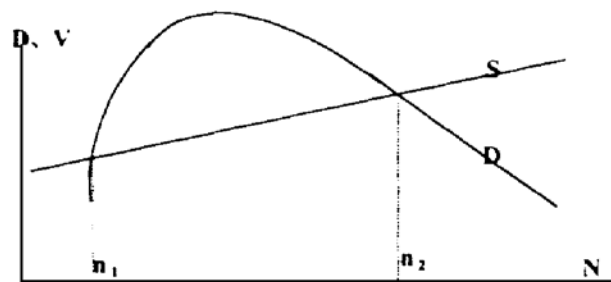


图2：网络产品的供求均衡

加价值曲线， D 表示二者之和)

从图 2 可以看出，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交点可能有两个，而第一个交点是不稳定的，在这一点以下，由于使用者甚少，网络价值极低，消费者“传统需求价值+网络附加价值”甚至低于厂商的供给成本，为此，厂商只能采取补贴或全部免费的办法来扩大该软件的使用者群体，以增加网络价值。一旦越过某个临界数量，网络效应开始展现，厂商开始盈利。图中 n_1 相当于自由软件应该免费赠送或补贴出售的规模， $n_2 - n_1$ 是可以按高于成本的价格出售的数量，曲线包围区域的面积代表软件厂商最大利润。

网络外部性源自多种要素。一种是交流的需要，比如电视机接受图像，传真机发送到另一台传真机，电话、铁路、电脑等设备构成的网络越广，交流的机会越多；另一种是互补性产品的存在，例如以前存在两种制式的录像机 (beta 与 VHS 制式)，它们都需要各自互补性产品——录像带 (互不兼容)。对消费者来说，录像机的价值部分取决于录像带的丰富程度，而录像带的生产者与出租者考虑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即哪一种录像机更流行。于是一种占上风的录像机会促进更多的录像带生产与出租服务，反过来又促进录像机本身的销售，最终是一种制式生存下来，另一种被消灭。

操作系统的应用同时具备上述两种原因导致的网络外部性效应。第一，互补性产品和服务：应用软件是操作系统的互补性产品，一种操作系统应用越广，基于这种操作系统的应用软件越是丰富，操作系统的网络附加价值越高；现在大量的 web 服务器采用 Linux 系统，部分原因是看中网上有大量基于 Linux 的网络应用软件，而之所以有大量基于 Linux 的网络应用软件，这与 Linux 主要由网络爱好者在网络环境下开发有关，而微软孤家寡人式的开发方式在这方面先天不足。第二，交流的需要。当你安装操作系统，你当然关心多数人在用什么操作系统，因为你担心对方的文件在你这里无法打开或者相反。

(图中 D_1 表示传统的需求曲线， D_2 表示网络附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与对方的操作系统之间没有逻辑性联系,比如各自消费不同的桌子、板凳,你当然不必关心兼容或解决兼容的标准问题。知识产品由于适合网络传播甚至网上生产,因此知识产品的网络外部性尤为重要。某一知识产品的使用者越多,该产品的“网络附加值”越大。为了达到某一临界值,一些软件开发者宁愿免费或提供一段试用期以培育市场基础。

2. 扩大网络范围的手段——兼容性与标准:按照 Katz、Michael L 和 Shpiro、Carl (1985) 的分析,在考察网络外部性时,“网络”的范围取决于产品的兼容性,相互兼容的产品属于同一个网络,相互提供正的外部性影响。生产的标准化有助于解决兼容性问题,按照标准生产使不同产品组件能协同工作,不同厂商的同类产品能相互替代。软件开发者发现在被广泛接受的标准下开发产品非常有用,操作系统是软件开发的平台,开发者都希望在被普遍接受的平台上开发产品,以便获得最大的潜在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说,广泛应用的操作系统等于事实上的标准。目前市场上存在多种互不兼容的操作系统,众多厂商与个人能团结在 Linux 旗下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希望统一标准。

自由软件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成为事实上的标准,这方面的例子有 TCP/IP 协议。TCP/IP 协议是免费的,伯克利软件公司随 UNIX 操作系统免费提供这些协议,所以很快流行,成为事实上的标准。Linux 已经具有这些特性,它对所有开发商都是平等和开放的,所以发展很快,在开发商中越来越流行。其“网络外部性效应”,一方面体现在已安装的 Linux 服务器的数量上,另一方面,网络中存在大量基于 Linux 系统的软件使其可以完成更多的功能。有人预计 Linux 将占据互联网和企业计算的市场,甚至预言 Linux 将“毁灭”和取代今天“专有的”操作系统,从而成为一种标准的操作系统。

三、为什么自由?——软件生产力分析

Linux 的生产方式可以归结以下几点:源代码开

放、自由开发和网络环境。源代码开放有利于提高生产率,自由开发模式有利于对创新的管理,而网络环境则是物质基础。Linux 的开发环境是一种基于网络的开放性正反馈系统。开放性正反馈系统是指使用者也是创造者,其一个成员的创造性成果可以立即零成本传播,惠及所有使用者,并增加原系统的吸引力,吸引新的使用者,这样完成一次扩张。Linux 开发模式的缺陷在于经济动力不足,优势在于基于网络的程序员为数众多,以及创意的偶发性使得其利用成本低于一定阈值。

网络是 Linux 开放式生产模式的物质基础。Linux 是通过 Internet 协同开发出来的,Internet 把 Linux 软件带到每一个“网虫”面前,历史上第一次所有人都可以站在同一条“生产线”(internet)上。全世界的 Linux 编程爱好者义无反顾并不计名利地不断为 Linux 的发展添砖加瓦,所以说 Linux 也是网络时代的特有产物。网络使程序员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企业内部的员工几乎是一样容易,这种信息交流既是协调机制,又是传递中间产品的“运输”过程。

但是,任何一家企业的管理效率决定其边界不可能囊括如此众多的程序员。管理程序越严格,成本越高,所能管理的范围越是受到限制;越是松散型的组织越是容易聚集众多的人,几乎任何使用 Linux 的程序员都可以成为 Linux 扩张体系中的一员。这种由程序设计人员和用户组成的合作团体极其令人信服地说明,开放源码软件有可能更加安全、更加可靠,而且比任何一家公司产品能更好地进行测试。

但是自由软件的缺陷在于不能提供直接的经济激励,因此自由软件基本上是走逐步改良的道路。可以说软件的灵魂在于创意,而创意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有一定的偶发性。市场规则是竞价高者得之, Linux 是免费的,实力不敌微软,微软一定会花大代价购买之,就像它一直积极进行的兼并一样。但是程序设计的创意往往是在应用与学习过程中偶然产生的,这种偶发性,使得这种能力或产品的提供有

随意性、偶然性,具有相对较低的成本,可能受到好奇心或成就感、荣誉感的驱动就能满足。Linux 记载每位开发和测试人员的姓名,可能这就是一种类似学术荣誉的认可机制,显然这种激励机制没有经济激励那么强大,但它也构成一个临界值,在这临界值以下零星的改良和发明活动都足以被呼唤出来。如果说微软的工程师几乎每天都在为微软加班,那么可以说全世界每天都有无数的工程师在为 Linux 加班,他们的思想火花就像黑夜里的流星,是自由的,只属于一个自由的团体,不能被微软之网所捕获。开放系统的扩张机制使得一颗颗水珠终于汇成湍急的河流,一个和软件巨头微软提供的几乎同样强大的产品竟然以免费和无报酬的方式被创造出来。关键原因是基于网络的开放系统可以更灵活地获得广博的外部资源,而任何一个经济价值组织(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四、经济组织的缺陷——规模经济与创新管理

显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好的生产环境,而生产的知识产品甚至能直接在网上传播。传统经济组织在这种“网络+知识”的经济时代,对管理创新和提供激励有没有缺陷呢?钱颖一(2000)写道:“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创新不是发生在已有的、技术力量和资金都很雄厚的大企业,而是产生在那些看上去既无技术力量又无资金的新立小企业。比如,个人电脑是由苹果公司的两个年轻人发明的,而不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发明的。又比如,个人电脑操作系统最初是IBM向微软购买的。显然,无论技术还是资金,当时的苹果和微软公司都无法与IBM相比。”钱颖一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激励。大公司无法给创新者提供足够的报酬,因为风险太大,报酬要足够大。缺乏激励导致许多新想法无法在大公司中生长。二是约束。大公司内部创新往往会受到软预算约束的困扰:在一个大公司内部,停止一个项目或关闭一个部门是一个困难的决

定。而市场淘汰一家小公司则轻而易举。”因此我们看到,许多创新是通过创业来实现的。

究竟创业者的创新机制与大公司进行的研究与开发机制有什么内在的差异,使得看起来技术和资金力量都很薄弱的创业小公司能频频创造新型甚至重大的科技成果,青木昌彦(2000)在分析硅谷现象时认为,大公司层级式开发组织先有整体系统设计,然后是各模块的开发,必然是模块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使到某一模块一旦出现意外,必然引发一系列的调整,系统测试和改版必然十分费时费力,但在创业投资家的协调下的分散创业者并不企图生产大而全的产品,他们既利用市场资源,也希望自己的产品被市场广泛应用,他们一般是专业化的,将产品的界面标准化,从而“能增强产品体系的可重构性”,“在工程环境的事前不确定性特别高或工程环境迅速变化的情况下,创业资本协调下的信息封闭系统的这种演进性特别富有创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层级式组织的事前集中化产品设计的风

险很大。”为什么大企业的层级式研发一定要使各开发小组之间具有互补性,从而为创新留下障碍呢?显然这种安排能减少重复劳动,源自规模经济,而企业规模的扩大正是沿着规模经济进行的,不论是来自生产线上的规模经济,还是内部职能分工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企业规模扩张的动因,因此只要我们讨论的前提是大企业,那么必然存在追求规模经济的痼疾,这种体制对创新的管理是低效率的。提高创新效率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规模经济,正如青木昌彦(2000)指出的:“……但是创业资本协调下的信息封闭体制的这种灵活性的成本是在研发工作和研发费用上的重复性”。显然,追求规模经济会阻碍创新性(或“灵活性”),而增加“灵活性”又导致研发活动的重复(规模不经济),二者在本质上是矛盾的,谁也不能简单模仿对方。

上述分析对微软也是恰如其份的,每一次,微软都是推迟新产品上市,Windows2000更是推迟了

近一年时间,程序越编越大(已多达6000万行),Bug越补越多(每一行程序的运行既要兼容过去的版本,又要符合整体设计)。自由软件Linux采用分布式开发模式,使得Linux是模块化的,再开发者只需了解所需要的相应模块。Linux只有100万行,却能更有效、更稳定地工作。可见传统经济组织在扩展职能分工,利用规模经济的同时,对创新的管理产生了低效率。

五、结束语

网络能使无数人联结在一起,“天涯若比邻”,从而能在一定的机制下实现某种任务。网络能完成信息交流,且不仅是信息交流;信息交流可以上升为某种协调机制,甚至不仅仅是协调机制,它还能进行现实的交易,如智力产品的交易,起到虚拟市场的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亚当·斯密200年前就指出交换(交易、贸易)有利于经济增长,市场的扩大有利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加深——由于水运的便利,使地中海沿岸成为经济上相对发达地区;从埃及的尼罗河到印度的恒河流域(水道构成的网络),出现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繁荣;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一度孕育出灿烂的古代文明;世界各国的沿海城市都是率先接受外来的文明和贸易,然后上升至经济发达地位。与上述相比,今天的信息网络在渗透广度、深度等方面恐怕要远胜过河流、海洋提供的运输网络,它在促进交易,尤其是在促进知识交流上将胜过任何有形贸易,现在的问题是

在“网络+知识”经济中,如果企业仍然沿规模经济扩张,而不能兼顾沿“创新能力”扩张,那么他们必然在知识生产上陷于被动。

主要参考文献:

1.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20页。

2. 钱颖一:《硅谷的故事》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1期。

3. 青木昌彦:《硅谷模式的信息与治理结构》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1期。

4. 石磊、周兆生:《信息经济中的企业》,《经济学家》1998年第5期。

5. 郑维敏:《正反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6. Katz, Michael L., and Shpiro, Carl 1986, "Technology Adoption in the Presence of Network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4 No. 4.

7. Katz, Michael L., and Shpiro, Carl 1985, "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June, 1985): 424-40.

8. Steven Hamm:《微软公司有多脆弱?》载《商业周刊》(中文版)1999年第5期。

9. Timothy Mullaney and Peter Burrows:《突然间,软件不再是产品,而成为服务》载《商业周刊》(中文版)1999年第9期。

责任编辑:谭湛明

中国进入 WTO 与企业所有制结构变革

□ 杨永华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WTO 文件实质上规定进入市场的企业主体是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只有在进行纯粹的商业活动时才能进入市场。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企业所有制结构正在朝着这个要求调整、发展, 中国入世的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条件逐步成熟。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同, 民营企业天然进行追逐利润的纯粹商业性活动, 国有企业既进行一些商业活动, 也进行大量的非商业活动。政府要进一步改变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态度, 纠正一些不符合 WTO 要求的制度和管理方法。

[关键词] WTO 企业所有制结构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中图分类号] F12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0) 08-0047-04

中国入世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尤其是企业所有制结构。本文对此作一些讨论, 就正于学术界同仁。

一、民营企业: WTO 的企业主体要求

WTO 文件实质上规定进入市场的企业只能是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只有在进行纯粹商业性活动的情况下才能进入市场。事实上, 加入 WTO 的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主体都是民营企业, 即没有与政府的政权力量加入的纯经济组织。这实际上提出了进入 WTO 的企业所有制结构要求。

进入 WTO 的企业所有制结构要求对我国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民营企业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解放初期, 民营企业在企业所有制结构中处于主体地位。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 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体户、私营经济等被改造成国营企业或准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参照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管理制度进行管理, 实际上成为准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际上只有国营企业和准国营企业, 因而从总体上看, 市场体系事实上不存在, 只有残缺不全的消费品市场。斯大林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不存在商品经济, 即使存在的话, 也只是商

品的外壳, 理由很简单, 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商品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由于不存在或者说基本上不存在商品经济, 资源配置只能通过政府使用行政机制进行。经济学家的分析已经证明, 行政机制配置资源浪费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所以, 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的 20 多年里, 经济发展慢, 人民生活贫困。

改革开放以来, 企业所有制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 结构的调整在广东表现得十分明显。工业总产值由国有工业和民营工业两部分组成。1997 年广东国有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结构中的比重, 从 1978 年的 63.82%, 下降到 12.72%, 下降 51 个百分点。民营工业产值由 1978 年的 36.19% 上升到 1997 年的 87.27%, 提升了 51 个百分点。民营工业产值又由集体所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两部分组成, 非公有制经济由个体经济、其他经济成分, 即由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以及港澳台商经济组成。从 1978 年到 1997 年, 集体所有制经济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结构中的份额略有下降, 从 1978 年的 35.48% 下降为 32.67%, 减少 3 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成份

的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结构中的份额快速上升, 1978年, 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不到1%。民营经济大约分三个时期, 一是从1978年到1985年, 非公有制经济的起步时期, 发展速度不太快, 原因可能是基数太小; 二是1985年到1992年, 发展速度加快了; 三是1992年以来, 非公有制经济持续的高速度发展, 1997年, 个体经济(包括私营经济)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达到11.90%, 包括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商经济的其他经济成份的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高达42.70%, 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份额高达54.60%, 已经超过了国有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的份额。广东工业经济结构中, 国有经济份额的下降, 民营经济份额的上升。这不是国有经济的衰落, 而是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广东工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207亿元增长到1998年的13799亿元, 增长了67倍, 年均增长率达到24%。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86亿元增长到1998年的7919亿元, 增长43倍。扣除物质上涨因素, 以可比价格计算, 增长14倍, 年均增长速度为14%。比1952—1978年年均增长5.2%快8.8个百分点。这说明, 广东所有制结构的演变, 特别是民营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 有利于经济健康成长。民营经济的崛起是中国能够进入WTO的一个前提条件。

在西方国家, 民营经济与私有企业是相等的概念。私有企业是从产权的所有权属于私人所有这个层面定义的。从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程度, 私有企业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的形式, 如单个业主制企业和合伙企业, 一类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企业, 如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大型股份公司, 股东作为所有者, 由于股东人数众多, 每个股东拥有的资本占企业总资本的比例可能相当小, 因而不少股东往往不参加股东大会, 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仅仅凭资本所有权分享一点红利, 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掌握在

由经理为首的经营管理者手里。这种所有权与经营管理分离的现象, 美国经济学家贝利(A. A. Berle)、米恩斯(G. G. Means)、伯纳姆(J. Burnham)、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等称为经理革命。这种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分离的企业与公有制企业是有区别的。改革开放以来, 形成了经济力量强大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公有制企业的一种形式。在市场经济下, 由于资本市场日趋发达, 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经过市场, 互相渗透, 组合成股份公司。不少股份制企业既有公有的股份, 也有私有的股份, 甚至有的股份制企业中的公有股份与私有股份十分接近。我从来认为, 要分清这种股份公司的性质究竟是公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 是有困难的。^①民营企业是与国营经济、国有经济相对应的, 包括城乡集体所有制经济、城乡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商投资经济等。

WTO文件对国有企业进入WTO的市场经济进行经营活动有一个严格的限定。1994年关贸总协定组成文件中, 专门有一条国营贸易企业的条款。国营贸易企业的定义是“被授予包括法定的和符合规定权利的垄断权, 或特殊的权利或特权的政府和非政府企业, 其中包括市场营销管理委员会, 在运用这些权力中, 他们通过购买或者销售, 对进口和出口的水平或方向产生影响。”规定国营贸易企业要按照商业的考虑进行贸易, 包括价格、质量、资源多少、推销难易、运输和其他购销条件等方面只以商业上的考虑为依据, 并按照商业上的惯例进行活动。这就是说, WTO规定, 只有国营贸易企业进行纯商业活动时才能进行活动, 进行纯商业活动的企业样板是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或非公有制企业: 第一, 没有政府授予的垄断权, 而是参与市场竞争活动中的一个普通成员; 第二, 只进行商业活动, 不进行带有非商业性质的活动。国有企业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 才可以进入WTO的市场经济进行经济活动, 否则要被罚出局。目前国有企业进行的大量

活动是商业活动,也有大量经济活动可以看作是非纯粹的商业活动,比如接受政府的授权取得某些垄断权,可以不计成本和盈利,代替政府接收过多的劳动力。面对 WTO,政府必须转变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态度,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

二、要进一步转变对民营企业的态度

既然民营企业是进入 WTO 市场的企业主体,那么,中国进入 WTO 后就得遵守 WTO 规则对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要求。

所有制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政府投入的一项内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说过:形成经济制度是政府的一项职能,内容有“支持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是支持竞争还是垄断,是支持私营经济、合作社,还是支持国营企业,每个政府必须对这些问题采取一种态度,而且,还要决定政府的态度是否以立法和行政行动为后盾。”②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所有制态度已发生了重大转变。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所有制的态度是支持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限制各种非公有制企业,这种态度可称之为单一公有制态度。过去人们相信,这种态度既能坚持社会主义,又能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的事实证明这种预期目的并没有达到,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这才推动了政府对所有制态度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实际上采取了第二种态度,在支持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同时,也支持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并且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贯彻这种态度。这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态度,我简称为产权主体多元化的态度。

根据 WTO 的要求,民营企业进入市场的活动是纯粹的商业活动。这是由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决定的。私人产权与公有产权一样,具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私人产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重合于一个社会主体的企业,或者

说私人产权的所有者同时就是经营者,这种企业形式如单个业主制和合伙制。这种企业形式在早期资本主义是最重要的一种企业形式,现在仍然大量存在。马克思没有充分估计私人产权的另一种实现形式,即股份制公司。这种公司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所有权和管理者由两个社会主体承担,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公司制度越来越普遍,资本主义经济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从表面上看,这种企业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经理们不追逐利润,其实,深层次的动力机制仍然是取得最大利润。人们购买这种公司的股票还是为了取得红利或其它利益,这是显而易见的。私人产权以物质利益原则作为动力机制。这好像没有动力的机器是一堆废铁,有了动力,机器才能发动起来。物质利益当然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然而没有物质利益是绝对不行的。在现代企业制度里,股东作为私人财产的所有者,他们的决策之所以不会乱来,是因为受到财产的硬约束,如果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是他自己的财产,决策者不会拿自己的财产开玩笑。

国有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实际上是国家。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由政府任命,国有企业的活动,虽然多数是商业活动,也讲究利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活动是非商业活动,不讲究利润。从政治上看,国有企业负有政府赋予的政治任务,即使经济活动也常常从政治角度考虑,比如接收劳动力,本来是一个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属于纯粹的商业性活动,因为安排劳动力是政府的一项任务,国有企业容纳过多的劳动力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对国有企业也很关照。比如,授予某些方面的垄断权,优先取得资源,亏损了由财政补贴。用科尔奈的话来说,国有企业与政府的父子关系。这样,民营企业、外国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肯定是不公平的。所以,WTO 规定国有企业只有进行纯粹商业活动时才能进入市场。这就要求政府转变对国有企业的态度,放弃“父爱主义”,要像对民营企

业、外国企业一样铁石心肠。国有企业应该剪断与政府的脐带,独立地进行商业活动。当然,这样一种模式的最后实现,有一个过程。

三、要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管理

如上分析并不是说政府对民营企业 and 国有企业可以放手不管,任其进出市场,进行追逐利润的纯粹商业活动。问题是进行纯粹的商业活动要有一个规则,WTO 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政府应遵循 WTO 的要求对企业进行管理,也要根据国情实际作出具体的体制衔接与更加明确的管理规定,进行具体的管理。在当前,政府要从进入 WTO 要求出发,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创造一个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可以平等竞争的环境,同时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管理。

(1) 政府要规范和拓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领域。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个体私营经济仅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一种补充,这种思想反映在个体私营经济的市场准入上,出现了逐步放宽的态势。要进一步拓宽民营企业的投资范围,可以投入农业、能源、水利、交通、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领域,鼓励民营企业投资于使科研成果商业化的领域,鼓励民营经济参与农田水利、农村电网、生态环境、小城镇建设,参与公有制企业的改革。

(2) 政府要创造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平等取得生产要素的政策环境。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生产要素的分配一直用行政方法调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引入了市场机制,但行政调拨仍然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行政调拨的结果是生产要素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倾斜,使得民营企业在贷款、征地、获得重要生产要素方面不能与国有企业处于平等地位,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我认为,金融部门要加大民营企业的信贷投入,按其信用等级确定担保或信用贷款,拓宽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民营企业可依

法取得国有土地所有权。

(3) 政府要改革对民营企业的管理体制,改进管理手段,适时研究制定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协调解决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定期监督检查有关民营经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4) 政府要逐步完善对民营经济业主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并且增加保护措施的力度。建议有关立法机关通过立法规定:私营企业对企业的合法财产享有所有权,私营企业投资者对其所有财产依法享有处分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敲诈、勒索或以其他手段侵犯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破坏私营企业的合法经营场所。私营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向其摊派的人力、物力、财力。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应有更明确的规定,似乎要提到与公有财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度,而且要有完备的保护措施,要加强保护力度。

(5) 根据中国加入 WTO 的需要,政府对民营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无歧视原则。即各缔约方要在无歧视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任何缔约方都不得对其他缔约方的产品实施歧视待遇和差别待遇,要求每个缔约方在任何贸易活动中都要给予其他缔约方同样的待遇,使所有缔约方能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贸易。无歧视表明政府对不同经济成份在法律、法规等方面一律平等。这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和政府建立统一的、适用于各类企业的法律法规。

①杨永华:《关于私营经济几个理论问题的再认识》,《经济研究》1993年第11期。

②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78页。

加入 WTO 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 赵景峰

(广东商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 中国加入 WTO 可以借助外资和外在的推动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但也给有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发展带来严重冲击。为此, 我们必须以一个全新的态度对待国有企业改革, 从调整产业布局和企业组织结构、适当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等几个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关键词] WTO 国有企业改革 产业布局 组织结构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2000) 08- 0051- 03

对中国来说, 加入 WTO 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特别是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 可以借助外资和外在的推动力, 突破改革进程中的瓶颈问题,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

一、加入 WTO 将进一步推进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增强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活力, 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我们采取了通过政策放权和让利, 以期增强企业获取盈利的动力, 同时积极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使企业改革目标明确, 能在经营机制和经营行为上寻求稳定和安全的长远发展道路。但是, 应该看到, 我国目前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随着这种转变过程的推进, 许多旧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 而且, 由于改革越来越涉及到对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 这就使改革的抗拒力有所增强。因此, 如何才能将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下去并尽早达到建成现代市场经济的目标,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加入 WTO, 必将为改革注入强有力的外部动力。因为 WTO 是个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其运作基础的组织, 它所依赖的一系列规则都十分直接和十分具体地反映

了市场经济的要求, 加入 WTO 将使我国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步伐, 按国际惯例办事,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因此, 加入 WTO 将会进一步推进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的深入。

加入 WTO 也将进一步加快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1) 加入 WTO 是我国国有企业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最有效途径。WTO 促进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可使我国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参与国际分工, 这将能有效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源利用效率, 国有企业能从国际范围选择其所需的原材料或投入品, 降低其投入成本。(2) 加入 WTO 有利于更好地吸收外国资本, 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增强我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加入 WTO 有利于国有企业引进外资和扩大跨国经营, 有效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中最大的部分——跨国兼并和收购。还有利于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如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机制、制订适应国际环境的经营战略、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和信息网络、贯彻国际质量标准、转变经营观念、健全企业营销组织体系等等。(3) 有利于企业家的迅速成长和国有企业员工队伍素质的提高。加入 WTO 意味着我国国有企业将更多地开展国际间的交流、合作甚至

竞争。交流合作需要有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作桥梁,与国际企业开展竞争更需要高素质的企业家。因此,加入WTO后我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强敌”的竞争中将比以往更加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并积极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加入WTO后我国国有企业将被推上国际舞台,置身于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一大批具有在广阔国际视野上处理事务的知识和能力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将会成长起来,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中流砥柱。

二、加入WTO也给我国有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冲击

由于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技术落后、设备落后、管理落后、创新能力低、企业规模太小、市场意识不强、重复建设严重、服务质量不高等等,因此,在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的降低,非关税壁垒的逐步取消,将对尚处幼稚期的中国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企业产生冲击,这些冲击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市场冲击。加入WTO后,西方跨国公司 will 大举进入中国,它们看中的是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它们与中国国有企业在市场上以互相竞争关系为主,它们往往依靠其雄厚的资本实力,通过收购、兼并、合资控股等形式,将中国国有企业转变为外资控股企业,利用国有企业现有的生产条件、廉价劳动力,用他们自己的商标生产、销售高价商品,以达到其大范围地争夺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的目的。

2. 创新能力冲击。加入WTO后,技术竞争将成为新的竞争的核心和焦点,谁掌握了高新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竞争的主动权。我国国有企业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投入占销售总额的比重约为0.5%,发达国家的企业为5%—10%或更高,电子信息产业高达10%—20%,我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同时,中国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普遍淡薄,加入WTO后实行知识产权保护,失去了免费模仿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要使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必须支付高额的转让费。特别是医药、计算机等行业创新能

力低,其处境将非常艰难。

3. 价格、质量冲击。由于关税将逐步降低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国有企业中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将失去价格优势,例如汽车等。我国目前的市场竞争主要集中于价格竞争,产品差异很小,科技含量低,在国外科技含量高、质地优良的产品的冲击下,许多国有企业的产品将面临被逐出市场的危险。

4. 营销手段、售后服务冲击。国外的企业携带先进的营销战略、管理理念、雄厚的资金和优质的售后服务涌入中国市场,将对我国国有商业企业、金融企业、保险服务企业等产生很大的冲击。

三、加入WTO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举措

加入WTO后将带来更多的国际投资,我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将更加国际化,因此,我们必须以一个全新的态度对待国有企业改革,其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进行国有经济产业布局的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1) 国有经济的产业集中度很低。除农业外,我国国有经济几乎在所有产业中都占绝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在各产业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但结构分布不合理的现状仍未根本改观,分布面广,太分散,产业集中度偏低,产业主导性不明显等问题继续存在。(2) 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我国产业同构化主要表现在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趋同化。“九五”期间,国家提出将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和建筑业作为支柱产业。这成为各地区主导产业选择的样板。据统计,全国有25个省、市、自治区选择机械工业作为主导产业;选择电子工业的有24个;选择石化工业的有23个;选择汽车工业的有22个。这不仅不能提高支柱产业的集中度,还使产业同构化现象日益严重,造成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低水平过度竞争,使国内产业难以融汇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3) 重复建设,盲目发展。改革开放20年来,国有经济整体发展和建设是正常、健康的。但

是,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相当严重,几乎遍及每个行业、每个地区、每个部门,而且屡禁不止,反复重复。由于重复建设,许多厂上马之日,就是亏损之时,不仅投资收不回来,还影响到原有生产能力的利用,造成大面积停业半停产,设备闲置,人员闲置,亏损增加,效益下降。这些最终都集中到国民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上。重复建设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恶性赘瘤和主要矛盾。

国有经济的发展要集中力量于真正体现“主导”经济的产业领域,在“主导”领域培育出真正有竞争力、控制力的大企业,在实现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同时,实现规模经济,提高资源配置的总体效率。从各个产业领域来看,对涉及国家和社会安定的产业,国有经济要保持完全垄断地位,实现国家对这些领域直接控制;对基础设施和重要基础产业国有经济要保持绝对优势地位,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对社会公益性行业应以国有经济为主,对其它经济成分进入,国家应给予一定政策性补贴;对高新技术产业,应通过国有资本的投入,引导和带动其它社会资本向该领域投资,充分发挥它们改造和促进国民经济基础行业与主导行业发展的作用;对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国有经济要发展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形成以母子公司为特征的国有控股经营组织体系,使国有企业上规模、上档次,尽快具备与国外大公司竞争的实力。

2. 适当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在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下,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不属于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放手让非国有经济经营,既减轻国有经济的负担,又给国有企业带来市场竞争的压力,有利于尽快搞活整个社会的经济。对于不属于国有经济重点发展领域的、连续几年亏损且竞争力很弱的这类企业,如钟表、眼镜、家具制造、服装加工、食品业等,国有经济应首先考虑退出;对于比较竞争力减弱、亏损不太严重,近期尚能生存的行业,可将重组与改制相结合,视社会资本的承接能力以及社会就业承接能力,分批分步退出。

需要说明的是,适当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既不意味着国有经济的全面退出,也不意味着国有企业不能再进入这些领域。

3. 调整企业的组织结构。产业布局调整是以产业结构变化的内在要求为依据,促进各部门的投入与产出总量构成的合理配置与比例关系的优势。产业布局调整与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相辅相成。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着组织体系间的相互封闭状况,组织结构的的不合理严重阻碍着我国产业总体竞争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在加入WTO的挑战下,更面临着国际大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因此,应采取市场与管理手段相结合的有力措施,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在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中尽快建立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实行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加入WTO的压力可以加快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尤其是石油、汽车、船舶等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应尽快打破行业、地区的界限,按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的原则,实行统一资本运营、集中决策与控制或授权经营。

4. 充分发挥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积极作用。由于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市场本身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市场调节经济的力度还不足,还不能充分胜任国有企业改革的重任,因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这些作用包括:(1)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总量平衡和大的结构关系的协调,以中长期计划、信息发布引导企业行为,以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经营方向,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一个平稳、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2)制定和执行各类市场和中介机构的法规,使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得以健康有序运作;(3)积聚增量资本,负责一些大型的跨地区的投资项目和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公益性事业、环保、教育等微利和无利行业,以弥补市场缺陷;(4)维护社会治安,惩治各种经济犯罪和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

5.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要通过市场,特别是通过产权

国有企业制度选择的国际比较

□ 梁 军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 广东 广州 510080)

[摘 要] 市场经济要求企业依据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基本准则运行。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依据准则进行各式各样的调整, 因而有着万变不离其宗的多元选择: 这是历史演变的结果。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国有企业的独立性与平等性, 探讨了世界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制度选择的多元化问题。

[关键词] 国有企业 基本准则 多元选择

[中图分类号] 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0) 08-0054-04

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是什么? 多年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询这个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包含着两层意义: 第一, 市场经济是具有市场主体的经济, 市场主体的基本特点就是独立、平等和自由; 第二, 市场经济是具有法基础的经济, 法基础保证市场的基本秩序。任何形式的国有企业都应在该框架下运作。本文主要对不同类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制度进行比较, 探讨国有企业的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与具体实现形式的多样化问题。

一、国有企业的独立性与平等性

企业的独立性是市场经济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准则, 它指的是在社会经济组织系统中企业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独立地行使权力、独立地承担责任的主体。从本源上看, 企业不是某种东西 (如政府) 的附属。在社会的生产、流通以及相关领域的所有活动中, 企业应该不受干预地依照自身的运

行规则实施自身的计划。

在一般情况下, 国有企业的独立性总是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在企业和企业制度演进过程中, 固然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以各种理由 (如强化宏观计划性) 来剥夺企业的独立性, 但这并不能阻抑企业独立性准则作用的发挥。计划体制国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 就是一个明证。从总的趋势看, 企业独立性的实现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了。

企业的独立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实现方式。在香港, 企业被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那些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企业, 这些企业基本上受制于自发的市场力量, 具有高度独立性。香港奉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其经济自由度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香港经济主要由这些具有高度独立性的企业来实现。即便这样, 香港也有大量的以各种方式受制于政府的企业, 如第二类企业, 归私人所有但受

市场和资本市场运动, 在国家的产业政策引导下, 通过引导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 借助于扩股融资、发行股票和债券、收购并购、兼并破产、债务重组等资本市场的运作, 实现国有资本从低效到高效、从分散到集中、从一般竞争领域到真正主导性经济领域的转移。为此, 必须培育资本市场中的各

类金融主体, 包括证券市场和信托投资公司、投资基金等, 使其接受市场硬约束, 真正形成市场竞争。同时, 建立必要的市场交易秩序, 规范并繁荣产权市场。

责任编辑: 谭湛明

到政府的监督,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公共部门,如供水、供电、供气、电话、轮渡、银行等。第三类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它们受政府的长期低息贷款支持,分布在如住宅建筑、农业等领域。第四类企业是官办公司,涉及到地铁、工业村等。显然,这四类企业的独立性存在着很大差别。但这并不妨碍企业在运行的层面上,完全依照市场规则,政府不加直接的干预。这类选择的结果充分地保证了企业之间的平等地位,即企业在法律意义上和市场竞争中具有相同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均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而不管企业规模的大小、实力的强弱。

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共有170万家企业,其中90%以上属于私有,具有完全独立的地位,同时还有3700家公共企业(或称为国有企业),其产值、就业人数占GDP的1/10,国家对这些企业拥有全部或部分股权,分别为三级政府(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所有。为了保证公共企业的独立性,保证其与其他企业的平等地位,德国的法律规定:公共企业要依照《私人公司法》来组建运行。由于公共企业所在的领域往往是市场的自发力量难以或不愿涉及的领域,公共企业的进入如果完全依照市场力量的话,就会使企业很难成为一个真正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这反而会造成事实上的企业地位不平等(公共企业的地位不如非公共企业),所以,在公共企业所承担的公共目标与经济目标相冲突的时候,政府就实施特惠照顾,以帮助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与其他企业有平等的地位和机会。但另一方面,政府对这些企业实行财政补贴或税收方面的照顾,往往又成为造成企业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根源之一。为此,政府依照法律,向全社会表明对公共企业实施特惠照顾的基本条件。

日本的情况与德国十分类似。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0%,而且多分布在基础性服务部门和重要的产业部门,如酒类、邮政、林场。日本的国有企业分为各种类型,有国家国营类,有地方国营类

(如水、电、气等公司),还有一种特殊公共法人企业(如NTT)。这些企业在获得某一领域的特许权的同时,也背上了许多包袱,尤其在那些公共事业领域,高投入、低收益的状态使其一开始就站在与其他企业不平等的地位上。没有政府的支持,就无法获得独立的和平等的地位。当然,在那些自然垄断性领域,国有企业的特许权有可能演变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垄断,导致以垄断来控制市场的结果。同时会造成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破坏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为此,许多国家或地区(包括计划体制型的和市场体制型的)都在着手对国有企业实施改革,其目的就是要调整各种权利关系,保证和维护企业之间的平等地位。增加非国有企业在一些部门的数量和比重,或实施限制性措施,也被认为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多面性使得人们要作出多样的选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其独立、平等、自由的地位和权益的获得,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实现方式。这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二、国有企业制度选择的多元化

探讨企业的独立、平等和自由问题涉及到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的市场主体,因为它的所有者是国家,而国家又是市场经济框架及其运行的监督者,是市场竞争的“裁判员”。反映这种特殊性的一个重要视点是有国有企业运行过程中的自主性,它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有关,当然就涉及到了国有企业能否真正依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运行的问题。

国有企业本质上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它的生存与发展自然要与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要有基本准则可循。投入产出比的衡量、企业内部的管理、产品质量的控制等等,都要依照市场的规则。但是国有企业又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组织,除了上面提到的政府对其在自然垄断领域中的劣势进行补偿之外,还有政府对它的干预方式和干预程度,

政府对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位置的变化、政策的变化。

法国在 1993 年初共有国有企业 2750 个, 主要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部门, 如能源、铁路、矿山、航空、金融、邮电等, 从其产值、就业人数来看, 属于欧洲最大的国有经济部门。从所有制构成看, 法国的中型企业和绝大多数小企业都是股份制, 通过对私有部门兼并、参股、合资等方式相互渗透, 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合资企业。国家对其中的企业实现控股 50% 以上的, 就掌握了董事会, 就成为国有企业。根据管理规定, 国家可以任命董事长, 决定企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国家完全控制的垄断性企业, 政府的干预是直接的和全面的, 如设置了决策前的财务和技术审查制度, 派遣财会监督员和政府专员。在市场方面, 国家与国有企业间签订计划和意向合同, 内容包括企业发展总体目标、社会目标、财务和经济效益目标。在这个意义上, 国家成为企业的董事会, 只不过这样的董事会的组织形式是政府的有关部门的联合机制。

在英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 国有企业也受到政府的管制, 但管制方式与法国不一样, 公司董事会负责企业的具体运行, 主管部门、财政、审计部门对其进行监督而不直接介入企业运行, 为的是保证国有企业能够获得国家的资助或免于破产。1979 年以后进行的改革, 根本方向是从以立法和行政手段来直接管理转向了市场经济方式管理, 如扩大了董事会的权力、减少了财政资助、引入了私人资本、打破了垄断地位、严格财政约束。这一切表明英国对国有企业运行过程中如何体现市场经济基本准则有了新的理解, 实施了新的作法。

日本的国有企业是由常设部门来管理的, 这些部门有权决定企业的人事、计划、投资、利润分配、产品劳务价格、税收、工资。对那些公私合营企业, 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保证企业依照市场规则 (而不是按照行政规则) 来运行, 如实施主承包商为首的系统工程承包合同制, 政府作为产品计划的招标人

来与企业发生关系, 还采取公私并举联合开发新技术的方法, 政府向企业提供研究开发资金, 鼓励新技术和新产品。可见, 国有企业的运行在日本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的, 这种情况与法国以前的情况相似。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各个国家或地区对国有企业如何真正体现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的问题开展了各种尝试。主要有两个方向:

第一, 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新加坡为了激活国有企业, 将一些国有企业民营化, 以股份制改造和上市的方式引入非国有资本, 以替代新的管理手段, 使企业获得新的独立地位。

法国从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不断进行着企业的国有化, 直到 1986—1988 年才开始第一次私有化行动。由于涉及到市场环境和政策法律体系的改造, 对一些国有企业实施民营化成为法国的重要政治问题, 但现实中被民营化的企业却显露出一定的生机, 被认为是一种希望。日本是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有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比美国更低),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它还是对一些国有企业实施了私有化和民营化, 如开放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的股权结构, 为的是吸引更多的资本推进公司的大发展。在德国的 20 世纪 50、60 年代, 国有企业存在着严重的政企不分弊病, 进入 70 年代初, 开始“企业化”改革, 即把行政附属物的企业还原为企业, 真正依照市场规则来运行。90 年代以后, 德国的大中型股份有限公司出现“股份社会化”和“股东职工化”的趋势, 个人持股比例上升, 国有企业由此而跃进了一大步。

企业股份的社会化对国有企业发展的实际意义在于使社会化力量介入国有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过程中, 国有企业的发展前景与社会化力量的结合打破了旧有的垄断格局或效益低下的格局。多元化股权结构使企业的决断受多种因素制约, 而这种制约的背后则是企业对市场需求和赢利前景的理性思考。这样, 在多元化股权结构和利益结构共同作用下达成的平衡, 就成为国有企业 (参股的或控股的) 进

入正常运行过程的前提。对市场经济基本准则的遵从是企业行为方式选择的基本出发点。否则,企业难以成为企业。

韩国的做法是值得思考的。韩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有四种形式:政府独资、投资控股、出资参股、投资控制子公司。还有地方政府独资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一般集中在金融业等服务领域。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开始出现垄断趋势,违背市场经济规则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企业的大型化、系统化、生产集中化、市场份额独占化倾向很严重,导致了市场资源的过分集中。这些企业依仗着政府的力量来影响价格、信贷等。政府意识到这些问题,开始民营化进程,例如不直接管理,减少对财阀的支持,向私人出售股权,把效益好且公益性相对较低的企业转为民营。政府以各种形式避免国有资本进入国营企业,而且鼓励国有资本向私有和外资渗透。不再新建国有企业,部分国有企业被“大众股份化”,成为真正的公众公司,以强化企业的外在约束。

第二,给予国有企业自主权。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因为各种原因还保留着一批国有企业。探索国有企业的市场化途径,是共同的选择,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韩国对国有企业本身的改革集中在实现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更是加快了改革步伐,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一部分原来不按照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行事的国有企业面临新的困境,也促使对这些企业更彻底的改造。新加坡的国营企业分两类:一类是兼有行政管理与企业经营两种功能的机构,如公用事业局、建屋发展局,主要领域是基础设施;另一类是政府有股份或控制的公司,主要集中在特定的产业发展方向和私人无法投资或不愿投资的领域。新加坡以市场化的手段来改造国营企业,他们不赋予国营企业在经营中的任何特权,在市场竞争中如企业面临倒闭,政府绝不出手援救。在企业的

日常运行过程中,财务监督和经营管理全无政府的干预,视同私人企业一样对待。体现国家对国营企业控制力的是除了企业董事会(政府官员也可进入董事会,但兼职不兼薪),更主要的是对国营企业采取增股或退股,以此来鼓励或限制其发展方向。另外国家有权任命国营企业的领导人,对企业资产的使用实行监督。这种模式说明了新加坡国营企业的国“有”而不国“营”的特色。这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成熟的国家或地区,让国有企业更直接地面对市场的最彻底的做法。

在不同类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或地区,国有企业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和现实理由,但对这些企业的管理在方式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般来说,在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即便得到政府的支持(往往以非市场化的手段),也不能背离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一些国家或地区以对国有企业的各种支持来交换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或是以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来交换对国有企业的各种支持,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大趋势是一样的——要向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准则方向演进。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1991—1998年。
2. 熊峰:《也谈企业的目标》,《光明日报》2000年4月4日。
3. 刘嗣明等《当代世界市场经济模式》,广东旅游出版社,1996年。
4. 《魏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5. 剧锦文:《国有企业:产业分布与产业重组》,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6. 邹东涛主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制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
7. 李新华、张树中:《外国国有资产管理理论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
8. 乔治·施蒂格勒著、潘振民译:《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责任编辑:谭湛明

管理创新的六个动向与 我国企业改组的六个要点

□ 李继红

(嘉应大学财经系, 广东 梅州 514015)

[摘 要] 文章分析了新经济时代企业管理创新的六个动向, 1. 前四代的管理正在走向以知识管理为中心的第五代管理; 2. 知识管理无人负责的现象由新设立的岗位——知识主管来填补, 使知识管理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3. 企业流程再造必然取代企业流程的原地踏步, 并成为持续再造的崭新基础; 4. 勇于挑战和创新的企业家将取代安于现状的老板阶层; 5. 系统性、整体性管理必然取代片面性、离散性管理, 从整体上打好企业管理变革这场仗; 6. 企业营销管理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点备受青睐, 并在企业中进一步被强化。面对全球化的企业管理的新趋势等, 作者提出了中国企业的改组应把握的六个要点。

[关键词] 企业 管理创新 动向 改组要点

[中图分类号] 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0) 08-0058-04

一、面向 21 世纪的企业管理创新新动向
以知识为关键资源的新经济浪潮正扑面而来, 面向 21 世纪的世界企业管理, 正进入一个新的创造性发展时期, 其中有六个值得重视的新动向。

(一) 前四代的管理正在走向以知识管理为中心的第五代管理。

回顾半个世纪以来, 世界的企业管理走过了科学管理 (1922—1933 年, 被哈佛商业评论称为科学管理年代, 主要强调经济决策权下放, 员工参与管理、企业重视员工培训。以下凡是哈佛商业评论不另注明); 政府调控 (1933—1940 年, 美国政府挺身而出, 出台了许多有关经济政策的规定, “主管叫跳, 部属就跳”的管理方式不再灵验, 要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决策的过程, 马斯洛还提出了有名的“需求金字塔理论”), 营销与多元化年代 (1947—1959 年, 组合分析, 企业集团、管理教育等成为大众讨

论的主题) 以及策略和社会变迁 (1960—1971 年, 麦克雷格的 Y 理论的软功夫取代了 X 理论的硬功夫, 詹森和梅克林的代理理论, 提出公司管理人和股东利益的不一致)。中国的企业管理, 虽未全面经历过前四代管理, 只经历了第一代、第二代管理, 但像我们只用了十几年时间便完成了其它国家要用几十年时间才能完成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一样, 我们的管理也必然会赶上三、四代并进入知识管理为内容的第五代管理。知识管理即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具体来说就是, 通过确认和利用已有的和获取的知识资产, 对各种知识进行的连续管理过程, 以满足现有和未来的开拓新市场机会的需要。其内容主要包括: (1) 促进新知识的研究开发和利用; (2) 支持从外面获取知识, 并提高消化吸收知识的能力; (3) 确保新知识能在企业内及时扩散; (4) 促使员工的利用与企业目标相关的知识; (5) 确保

员工知道知识在那里,以便需要时可及时找到。知识管理的任务,就在于为企业实现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共享提供新的途径。

(二) 知识管理无人负责的现象由新设立的岗位——知识主管来填补,使知识管理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目前,一些大企业已经设立具副总裁级别、专司知识管理之责的知识主管。知识主管的主要责任是把结构化的外在知识与直觉相结合,从而感知组织文化和行为中的隐性知识,保证将组织的智力资产最终转化为能为组织带来利润的知识产品。作为知识主管,不仅要通晓信息管理,而且还要懂得营销管理、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培训管理、市场分析管理等,以便把人力资源同信息技术与营销战略等有机结合起来,为企业制定经营战略服务。我国的企业也必然要走这一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逼近,知识管理的问题将变得日益突出。

(三) 企业流程再造必然取代企业流程的原地踏步,并成为持续再造的基础。

企业再造 (Re engineering), 也称之为企业流程再造。它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企业变革的一种模式。它是美国工业企业在全面学习日本制造业的全面质量管理 (TQM)、精益生产 (Lean produce)、及时制造 (Just-in-time)、零缺陷 (Zero Defect) 等管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全面变革企业经营、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的企业变革模式。正如其创始人米切尔·汉默 (Michael Hammer) 和詹姆斯·钱皮 (Jams Champy) 所说的那样: 再造 (Reengineering), 就是对公司的流程、组织、结构、文化进行彻底的、急剧的重塑 (Redesign), 以达到绩效的飞跃。或者说, 再造就是对战略、增值营运流程, 以及支撑它们的系统、政策、组织、结构的快速、彻底、急剧的重塑, 以达到工作流程和生产率的最优化。一言以蔽之, 再造就是推倒重来 (Starting over)。我们的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提出要重塑微观基础, 但当时主要就所有制改革、政府职能

改革等要求企业进行相适应的变革, 当时并没有对企业流程进行全面再造的认识。中国加入 WTO 指日可望, 知识经济也可以让有些条件比较成熟的省市先行进入, 加之中国企业一定要迈向世界, 由原有的流程推倒重来, 这是大势所趋。

(四) 勇于挑战和创新的企业家将取代安于现状的老板阶层。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 (J·A·Schumpter) 1934 年就在他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创新”的概念。值得重视的是, 熊彼得认为技术发明者不一定是“创新者”, 只有那些敢于承担风险, 把新发明新技术引入经济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据此, 他认为企业家与普通的企业管理者有所不同, 只有那些倡导并实行“创新”活动的企业管理者才是“企业家”, 否则只能称为“老板” (Boss)。从这个被当今国际高新技术产业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来看, 我国企业界成为“企业家”的并不占大多数。随着前面所述的“3C”经营环境所引发的挑战, 企业竞争其实是企业人才之争、企业领导者之争。而只有倡导并实行“创新”活动的“企业家”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成为赢家, 领导企业破浪向前。

(五) 系统性、整体性管理必然取代片面性、离散性管理, 从整体上打好企业管理变革这场仗。

新时代的企业, 因为它们面对着的是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 因而只有整体优化配置企业的全部资源, 特别是人力、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让企业中的各个层次、各个部门和各个岗位, 以及总公司与分、子公司、产品供应商与推销服务商和相关的合作伙伴协调起来, 统一意志, 协同行动, 才能发挥企业竞争优势, 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这一趋势是必然的,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六) 企业营销管理将作为企业管理的重点备受青睐, 并在企业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被强化。

市场营销涵盖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消费领域以及前生产领域的预测, 其内容包括: 市场调查、

预测、消费需求分析、产品构思、新产品开发、加工制作、产品定价、销售和售后服务等全过程,不论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利于产品的营销。有人把营销等同于销售,这是不正确的。企业的营销,应该以消费者为导向,不宜以销售为导向。近二三十年来,由于经营环境的变化,促销策略组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以“4C”为内容的创新,即消费者(consumer)的需求、消费者需求的满足成本(Cost)、消费者购物的方便性(Covience)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沟通(Communication)。因而,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以体现“4C”策略组合为特征的现代促销,以及现代营销管理要求它在企业管理中居于重要地位,并引起企业领导者格外重视,是顺理成章的。

二、当前我国企业改组应把握的六个要点

面对全球化的企业管理新趋势,中国企业改组改造应把握如下几个要点:

1. 摸清同行业知识管理的现状,设立知识主管,加强企业的知识管理。

企业设立知识主管,将有助于加强企业的知识管理,为知识的共享做好工作。比如:有的知识主管对企业的知识管理工作,是划分为六大步骤而循序渐进的:一是认清知识在知识型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二是对竞争对手的策略及其知识资产进行评估;三是把自己的知识分门别类归档,分清哪些已投入,哪些还未投入使用;四是对本企业的知识资产进行估价,并寻找增值的途径;五是进行智力投资,开发知识,缩短与竞争对手的差距,并击败他们,加强研究和开发,寻求新的专利技术;六是把本公司的新技术档案加以集中,等等。此外,为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还可组织“最佳经验发现小组”、“智力竞赛小组”、“合理化建议信箱”、“周末研讨例会”、“诸葛亮会议”等,以挖掘企业内部的知识资源,通过这些方法,普及知识,共享知识,加强知识管理,提高经营效率。

2. 在企业改革中把重塑微观基础与企业流程再造结合起来。

我国企业改革初期,曾思考过重塑微观基础,当时的侧重点在企业的组织形式(是国有国营制还是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近年来又提出企业的资本经营、资产重组,借助外脑改善企业的管理环境等等,但都没有从整体上去思考企业流程如何再造。在传统企业中,作为流程(指的是对客户而言具体体现一种有价值的任务的集合,不是作为流程片断的子流程)隐含在每个部门的功能体系中,没有人专职对具体的流程负责,流程成为片断式的任务流,任务与任务间的脱节随处可见。而在以流程为中心的企业中,每个流程都由专门的流程主持人负责控制,由各类专业人员负责实施,流程成了一种可以真实的观察、控制和调整的过程,仿佛每个购买者都得到了特殊对待,而流程本身变得紧凑,任务之间不再因冲突而拖延。过去的企业改革,只在机构调整、减员增效等方面下功夫,这固然需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将企业由过去的职能导向型转变为流程导向型。企业从现在起,就要瞄准目标,对企业的组织建设、员工激励机制、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新产品开发等流程进行再造,从根本上改革我国企业管理上的问题。

3. 以消费者为中心,全面变革营销管理。

回顾我们企业的营销,一直奉行“4P”的组合,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assaga)和促销(Push)的组合。就“4P”本身而言,营销组合并没有错。然而,企业在使用它们时,一是过于机械,成了创造力的替代物而不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二是只把产品而不是把顾客作为出发点,似乎只有产品自身有某种神圣的存在理由,强加给顾客;三是有“一本通书读到老”之嫌,经营环境变了,营销组合“4P”没变,似乎希冀以不变应万变。笔者认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4C”组合必然要代替“4P”组合。作为企业,为了适应“4C”新组合,应以顾客导向取代销售导向,把营销管理放在企业

诸管理门类之首,起领头的作用,而且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实施这一变革。

4. 企业管理改纵向垂直为纵横协调,形成良性的管理合力。

我国过去的企业管理,基本上沿着纵向垂直法进行。上有宏观(国家)、中有中观(省、市、县)和下有微观(企业)管理,是纵向垂直的。一旦遇到横向矛盾,就难于协调了。解决问题办法只有一个:必须设立综观管理部门,负责各纵向垂直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在协调中贯彻系统观和整体观。作为企业的微观管理,则要加强各管理门类及其流程的纵横协调工作。特别是要从联系紧密的管理部门的相互协调开始,并扩展开去,迈向全面协调,以实现管理目标。

5. 创新管理,形成一种动态机制。

当代世界的企业管理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特征是,组织上,以知识的网络化为基础;在管理上更注重人的使用和人际沟通;企业经营并行网络化(可同时进行一项到多项工作);组织结构更依赖小组和团队的活动(管理层次大为减少)等。作为企业,必须十分注意管理的创新,即由一次创新迈向持续创新;从专家一人创新迈向全体员工共同创新;从照搬西方经验迈向中国式的企业管理创新;

并在改革中逐步形成一种动态式的持续式的企业管理创新机制。

6. 必须企业管理人才选拔方式的更新。

一位经济学家说过:过去是,人需要产品才能生存;现在是,产品需要人才能生存。这说明人对于企业的重要。当前,企业寻找人才的方式和对雇员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特点是:(1)网罗人才的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瑞典某医药公司招聘技术主管,许多专家从网络上得知后去应聘。公司从全球各地30多位应聘者中选6位,并由该公司负责费用到瑞典面试,选中了3人,最后招聘1人。(2)选才十分重视文化背景。作为全球企业更必须这样做。比如爱立信、摩托罗拉等国际公司,一般都招聘熟悉所在国文化的人才以开辟市场。(3)十分重视培养未来发展的骨干人才,创造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我们的企业,一方面,老管理人员可送去“回炉”;另方面可给新手一定时间从事岗位实践。新、旧交替时,要毫无保留地以老带新,并传经送宝。作为企业,必须通过企业内部培训和送出国内外名校进修提高等办法,培养人才,储备人才,使卓越的人才为中国企业管理的创新服务好。

责任编辑:谭湛明

试论提高我国市场的有效度

□ 程民选¹ 钟思远² 刘基荣³

1.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

(2. 四川大学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四川 成都 610074)

3. 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 要] 市场化改革推动我国市场从小到大、市场体系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 市场机制已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但是, 由于我国的市场体系尚在发育过程之中, 市场体系进一步发育还面临着种种障碍, 这不能不影响到我国市场的有效度。提高我国市场的有效度, 必须从市场主体培育、市场秩序维护、市场体系完善、政府适度调控、经济信息指导和产权制度创新等多个方面着手。

[关键词] 市场 市场有效度 提高途径

〔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8-0062-04

始自 1978 年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以不断推进市场化为显著特征。然而, 现实经济生活中种种不利于市场体系发育的障碍, 又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市场有效程度的提高。下面我们从如何提高我国市场有效度的角度对市场经济的基本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确立多元市场主体格局, 将从事微观经济活动的非市场主体改造成为真正的主

体。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多元市场主体格局, 但由于微观经济活动中仍然存在着相当一部分非市场主体, 使到我国市场的有效度受到极大的限制, 为此, 要提高我国的市场有效度, 必须将仍然不是市场主体的微观经济活动者改造成为真正的主

体, 使多元市场主体的格局得以完全确立。迄今我国从事微观经济活动的非市场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虽然国企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与重视。但是, 历经 21 年改革, 国有企业的现状仍难如人意, 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一再突显出来。国有企业之所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尚未到位, 还没能成为真正的市

场主体。市场主体应是产权主体、利益主体和决策主体的三位一体, 而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主体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 产权不明晰, 国有企业不能形成基于产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不能抵制过当的行政干预, 也不能形成较长期的合理预期, 因而对所有者权益的侵害也就难以避免。在并非产权主体的情况下, 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

体, 不可能像真正的主市场主那样思考和计算、决策和行动。我国国有企业未能改造成为真正的主市场主, 否则, 这使到二元活动并存的现状就难以避免, 即市场主体遵循市场原则活动, 而非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则可能不按市场原则行事。国有企业尚不是主市场主, 不按市场原则活动的例子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胜枚举。譬如, 非国有企业在融资时一定会进行成本比较, 因而对利率的变化十分敏感, 通常利率变化会影响其贷款的决策; 但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化却毫无敏感性可言。又如, 非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必定听从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的指挥, 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就会减少生产, 甚至转产; 但国有企

业却可能无视市场价格信号,在库存积压、销售已成问题时照样生产,因而政府不得不一再要求其限产压库。国有企业不成其为市场主体,其行为与市场要求相左,这势必对市场有效度构成影响。有鉴于此,改造国有企业,使其成为真正的主体的市场,也就成为提高我国市场有效度的一个重要途径。

改造国有企业为真正的主体的市场,对于大中型国有企业来说,主要是进行公司制改造,通过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使其彻底转换机制,能够作为企业法人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求发展;对于小型国有企业而言,则可以视具体情况而选择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和出售等不同方式。通过改制,使企业经营者拥有相应的产权,能够从自身利益出发自主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从而成为遵循市场原则活动的真正的主体的市场。

2. 依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市场主体的增多,意味着市场活动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关系的扩展,因而对于市场有效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市场有效度的高低与市场主体的多少并非呈正相关关系,在市场主体发育欠成熟、行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市场主体的增长与市场有效度的提高不仅不可能同步,而且可能损害市场有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譬如在证券、期货市场上,虽然进入市场交易者增加了,但却一味追求投机套利,势必导致市场价格的不正常波动,从而损害市场效率。又如,在市场主体增多的同时,由于其行为的不规范,展开不正当或过度竞争,从而导致市场失序,必然造成市场效率的损失。

现阶段我国市场主体发育还不成熟,主要表现在其市场行为的极不规范上。面对此现状,显然不能指望由其自然而然成长起来并臻于成熟。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主体的成长,市场行为的日渐规范,主要是靠市场经济社会的法制建设。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规范市场经济各个领域、多个

方面活动的经济法律和法规,依法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和活动,使之只能合法地追求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而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利益;使之遵循市场进入、市场退出的规则,遵循市场交易的规则,而不能在市场活动中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使之在经济交往中与其他市场主体平等相待,相互磋商,互惠互利,公平竞争,而不能在市场活动中凌驾于别人之上,采用种种不正当竞争手段追逐一己私利……正是有的放矢、长抓不懈地进行了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因而建立起了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使市场主体的行为得到必要规范,市场竞争才能有序开展,市场关系才能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才能正常运行,市场效率也才能有所保证。

依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以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提升市场有效度,还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立法和经济执法工作。在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力,甚至执法者犯法的情况并不鲜见,诸如非法经营、偷逃税收甚至公开抗税、债事诉讼中判欠债者还钱但难以执行、打假变成假打,如此等等。这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状况如得不到认真纠正,尤其是执法者犯法的歪风如不能彻底刹住,不但无助于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建立起市场竞争秩序,而且会加剧不良行为和刺激无序竞争的滋长。从提高我国市场有效度的视角看,严格执法,使市场主体的行为能依法得到有效的规范,从而切实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开展,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 打破行政垄断,遏制经济垄断,推动有效竞争

对于竞争的有效开展来说,任何形式的垄断都是有害的。这是因为,一旦垄断力量形成,就必然会阻碍竞争,使之不能正常进行。因此,现实经济生活中,凡是垄断形成的领域,竞争就受到妨害,难以有效开展。要保证市场有效,就必须反对垄断。

反对垄断,推动竞争,从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首先是要全力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性垄断。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竞争几乎绝迹,市场力量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行政力量全面控制和左右了经济生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市场机制在我国经济生活中逐渐生成和作用增大,行政力量也随之逐渐式微,从大部分经济领域中一步步退出。然而在大多数产业已由市场力量支配,成为竞争性产业的时候,却仍有少数产业依然处于行政性保护之下,行政力量阻遏了其他市场主体的进入,因而在这些产业中缺乏竞争,活动于这些产业中的经济组织在行政力量庇护下形成了垄断,而这种垄断的实质正是行政性垄断。我国当前的电力部门和电信部门就是典型的行政性垄断部门。它们借助行政力量形成了独家垄断电力和电信的局面,造成了电力市场和电信市场的低效率,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极大损失。鉴于行政性垄断对市场效率的影响,为提高我国的市场有效度,必须全力打破行政性垄断,引入市场竞争。而引入市场竞争的关键,在于撤除进入产业的行政屏障,允许其他市场主体进入这些产业。像中国电信那样,仅在其内部按营业范围进行纵向切块,划分出专营移动通讯、市话长话、卫星通讯和寻呼等不同业务的几家公司,竞争仍然是形不成的。解决其行政性垄断问题,必须使电讯领域形成多个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真正展开竞争,才可能提高我国市场的有效度。

在反对行政性垄断的同时,还要注意遏制经济垄断。目前我国已出现一些经济组织试图形成垄断的苗头,譬如我国彩电行业的霸主长虹公司1998年就悄悄控制了65%的彩色显像管,欲以此举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企业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种种方式试图成为能够左右市场的力量,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同样会阻遏竞争,从而损害市场效率。由此,遏制经济垄断行为,显然是提高我国市场有效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4. 进一步培育市场体系,促进滞后市场的发育,实现市场体系的完善化

市场有效既然是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发挥作

用,那么,市场体系的发育状况如何,其完善化程度怎样,对于市场有效度也就必然产生重大影响。就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和实现机制看,如果市场体系残缺,必然会导致资源优化配置难于实现。为此,要提高市场有效度,就必须高度重视市场体系的培育,使各种市场协调发展。

我国的市场体系虽已初步成型,但体系内各市场的发育极不平衡,程度参差不齐。相对说来,商品市场发育较好而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城市市场发育较好而农村市场发育滞后;东部市场发育较好,中部次之而西部市场发育水平较低。面对这一现实,进一步培育我国的市场体系,就必须大力促进滞后市场的发育。

促进滞后市场的发育是一个艰苦而细致的工作。现实中市场的滞后有多种情况,需根据不同种类市场的发育程度作出比较,找出各类市场发育水平的差异;也可就不同地区市场发育水平作横向比较,找出同类市场在不同地区发育水平上的差异。更进一步的分析是通过调查研究,找到各类或各个市场发育滞后的具体原因,有的放矢,以有力的措施促进滞后市场的发育,形成市场体系完备,各种市场协调发展,从而提升我国市场的有效度。

5. 政府彻底转变职能,宏观间接调控切实遵循“与市场一致”原则

政府彻底转变职能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必要条件。无庸赘言,如果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大加干预,用看得见之手取代“看不见的手”,是没有市场机制可言的;而如果政府不能彻底转变职能,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市场效率客观上也就难以得到提升。

政府彻底转变职能,不再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但仍然肩负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行间接调控的任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市场发育水平低,还存在着市场缺损的问题。既然市场有做不到、做不好的地方,由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来弥补“看不见的手”的不足,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政府的

作用应当严格限制在市场无能为力的领域,切不可对市场越俎代庖。

就宏观间接调控论,虽然是政府在宏观经济运行偏离常态(俗称过热和过冷)时,主要运用经济手段间接调控经济运行,使之恢复正常状态,但政府的宏观间接调控只能而且必须遵循“与市场一致”这一原则。政府间接调控与市场一致,首先是要与市场所要求的方向一致,而不能与市场的调节方向背道而驰,否则会适得其反;其次是调控力度也要与市场要求相一致,应当避免出现调控过头或者调控乏力两种偏差。

政府彻底转变职能,学会宏观间接调控,遵循“与市场一致”原则,不断提高调控艺术,使政府这双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握手,协同一致,形成合力共同调节宏观经济运行。这不仅对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协调发展极为重要,而且因为解决了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相左的问题,当然也有利于市场效率的提高。

6. 建立公众经济信息网,公开发布分类经济信息,指导微观经济活动的开展

在我国,作为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市场价格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市场主体因此可以十分节约地获得与市场供求有关的有效信息。但是,对于那些生产周期长的产业来说,生产者仅仅依据价格的涨跌来了解供求态势,并据此作出生产经营决策,却往往处于非常被动甚至十分不利的境地。

此外,价格变化虽然反映了一时一地的供求关系变动,但造成供求关系变动的原因不是价格所能反映的。比如,某地某商品价格上涨,可能是由于货物调运不及时造成暂时的供不应求,也可能是该商品总量上供不应求。即使是总量不足,但供求缺口的大小怎样,也不是价格变动所能完全反映的。因此,有关的信息同样要靠掌握宏观情况的部门及时提供,以避免微观经济组织的决策失误,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我们认为,政府应当肩负起信息收集、处理和

及时传输的使命,并加强信息管理。虽然迄今我国已建有若干经济信息系统,进行经济信息的收集和处理,但却没有一个面向公众定期发布各类经济信息的公众经济信息网。于是出现这些系统产出的经济信息利用率极低,但公众却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信息指导的矛盾现象。有鉴于此,我们建议由中央政府建立起一个面向公众免费发布经济信息的公众经济信息网络,将各经济信息系统收集、整理和加工过的真实而有效的经济信息,定期分类进行公开发布,就像中央气象台定时发布气象信息一样,以利于指导微观经济组织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考虑到我国幅员广阔,有的省区之间情况差别较大,各省级政府也可建立一个公众经济信息网,配合中央政府公众经济信息网的工作,结合本省区具体情况,面向本省区公众进一步发布有关经济信息,以便给予本省区的经济活动者以更加具体的信息指导。通过中央和省两级公众经济信息网的建立和有效开展工作,信息过于分散、信息流动性差,以及信息质量不高甚至失真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从而保证市场主体更有效率地活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因此得以提高。

7.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探索产权制度创新,努力构建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产权制度

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是保证市场有效率的一个重要条件。笔者曾对产权制度是否有效直接影响到市场的效率作出过分析。②产权制度是否有效,决定着产权是否明晰,是否具有排他性,因而决定着产权主体从而市场主体能否确立,决定着市场活动者的利益边界是否清晰,预期是否稳定,决定着他们能否进行自我激励和约束,从而努力使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优化。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著名经济史学家诺思强调指出:“有效率的市场,指完善的规定和实施的所有权”,“对更有效率的市场的发展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对产品和劳务的所有权的完善规定和实施。”③既然产权

(下转第83页)

探讨管理科学发展中的新课题

——来自“面向 21 世纪的企业与市场”研讨会的信息

□ 韦 前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8-0066-05

面向 21 世纪的企业管理应高度关注两大趋势：一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 21 世纪回归；一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一体化下的新经济成长，我国管理学思想将从前一个时期的西化逐步转上中西融合化，我国的管理理论也将在兼容百家中跃上新水平。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苏东水先生在 6 月 16—18 日“面向 21 世纪的企业与市场”学术研讨会上强调指出的一点。研讨会由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主办、中山大学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承办、《管理世界》杂志社、《学术研究》杂志社、羊城晚报《财富周刊》协办。会上，来自全国 30 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近百名专家学者汇聚中山大学，围绕会议主题，从企业与市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机制与条件、现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新经济时代向管理提出的挑战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会议期间专设的“企业论坛”，让企业家与专家学者直接对话，切磋问题，交流思想，效果明显。对研讨的结果我们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概括。

一、新世纪的管理思想回归与创新

今天的中国正举步迈向 21 世纪，21 世纪的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确令人神往，而 21 世纪的企业管理问题更是紧紧地牵动与会专家学者的心。苏东水教授一席《管理的挑战》的发言始终吸引着与会代表的注意力。他的话题从为什么要讨论管理的挑战开始。他说，“入世”在即，我国面临诸多重大挑战，而我

国的管理如何转上国际先进水平，管理理论如何从前一个时期的西化转变为中西融合化，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也是应对“入世”和新经济高速成长的挑战而必须作出的思考。苏东水教授根据其多年的研究与观察，感觉到在新世纪有三方面的管理思想将遵循着从中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中方的转变与回归：一是关于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人本管理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中国古代形成，然后流传到西方，再在西方得以发展形成学派，又传回中国的过程。比如上海在其“21 世纪战略发展计划”中将“以人为本”列入经济发展的动力体系中。二是人德管理思想的回归。中国上古时代就已提出“德为贵”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西方也认识到这一思想的重要，许多大学的 MBA 课程中都加设《管理伦理》课程，中国更有必要完善这方面的思想，以促进市场经济的更深入发展。第三是人为管理思想的回归。对这种思想的回归，他认为得先从管理的本质谈起。有关管理的本质的涵义，古今中外不尽相同。孔子认为管理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修己安人”；道家的“无为”思想中强调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荀子在《性恶篇》中谈到“人性恶，使之善者伪也”的思想，一个人要有由恶变善的行为；《红楼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学说之父”泰罗等人的管理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或可称为西方管理思想的“祖母”。融合是当今企业管理发展的一个主流，在全球经济技术一体化条件下，必须把建立和确立具有东方管理文化

特色, 兼容中西管理思想, 且得到世界公认的中国式管理体系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标准与规范的全面引入, 将极大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上新水平, 也同时使我国在管理上的差距凸现出来, 为此我国的企业必需着力于管理创新, 以缩小这一差距。与会专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 新经济条件下的我国管理创新是处于管理转型期的创新, 管理创新的重点选择应与管理转型期这样一种时代特点相联系, 必须连同战略创新这样一种时代规定性一起来思考。管理创新不是将传统的管理思想、战略思想并列起来赋予新的词汇, 不是一成不变地照搬西方的管理理论来建立我国的管理体系, 也不是徘徊于中西之间的“中体西用”, 而是走出以往的套路, 站在东西方不同管理文化基础上对管理及战略思想进行重组与创新。管理转型是包括管理组织、管理主体与客体、管理目的、管理任务以及对管理态度、思维方式在内的整体管理转型, 它伴随社会转型而来。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进程加快、变革速度加快的时代, 适应快速变化着的社会转型与管理转型要求, 战略管理研究不能只属于某种文化体系, 而是需要基于整个东西方管理文化相融合的战略管理创新。西方国家有丰富的管理理论与战略管理理论, 中国则有丰富的古代管理思想和战略思想。新的战略管理理论将在传统的管理思想和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交汇中形成。

在新经济条件下, 知识密集型企业将在社会财富的创造、社会财富的积累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类企业基于对知识与知识专家的重新认识与重新设置而区别于一般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企业, 它不是传统层级化或部门化的等级组织, 而是一种强调相互学习、相互交换知识的开放式网络组织, 这一变化势必对传统的企业管理方式方法提出新的挑战。一些代表指出, 这种企业的管理集中体现在与客户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体现在发现和利用协同效应的过程中, 强调对知识与知识创新的管理, 这是一种

多样化的柔性的管理, 管理者相当于环境和企业之间的战略经纪人。

二、硅谷的企业再生循环系统及其启示

迈向 21 世纪的企业面临着一个最具挑战性的发展中问题是, 以知识为关键资源的新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高新科技的产业化过程趋短, 高新科技对企业的快速进入使现有企业的组织方式、生产方式、交易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影响, 使速度成为企业发展中一个关键性变量; 一是全球经济科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与高新技术企业的迅速兴起, 对企业结构, 对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的冲击与影响。考虑到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对企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关系变革的重大作用与影响, 与会者主张进一步加快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与壮大。要真正做到这一点, 且富有实效, 近期首先是更新管理观念。从根本上弄清高新技术企业成长的规律、条件与机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山大学毛蕴诗教授以硅谷为对象, 深入剖析了当代高新科技企业发展的市场机制与运行系统特征, 并据此而提出有效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壮大建议。毛教授认为, 目前人们仅仅把硅谷看成为一个科学园区, 这是不够的, 一批高新科技企业集中在一起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硅谷”。硅谷集中体现出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与市场关系, 是新经济条件下一种定价机制, 也是对市场不完全的克服; 它创造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推动了公司经济与企业型经济的迅速融合, 在淘汰与创新的交替运动中创造出一个有利于企业进步的再生循环系统。为此, 要从我国的要素市场和市场机制特点出发, 积极培育高科技风险企业的融资市场, 为高科技企业创立和进一步发展提供风险资本; 建立创业板市场, 为风险投资的进入与退出提供条件, 建立促进技术成果转化的市场制度, 进一步开发人力资源及其市场, 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其次, 重视未来的社会文化、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和不确定的技术与市场

风险,使拥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精神同高科技企业的创立发展紧密相连。第三,营造促使高新技术企业做大的环境,改变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小而散的局面。

风险投资对加速企业技术开发,尤其是对高新技术的开发有重大作用,为此与会者强调企业高新技术开发必须考虑和具体地分析其对风险投资的需求。(1) 风险投资的阶段性需求与选择。因为风险资本作为高新技术的创业资本,对 R&D 和产业化过程,即从基础研究开发到形成新产品和产品最后退出市场的不同阶段,有种子期、导入期、成长期和成熟衰退期等不同阶段的不同的风险资本需求特点。(2) 要形成风险企业家的培养机制,因为风险企业家毕竟是新技术新产品从愿望转变为现实的关键。(3) 着力于以法律形式保证技术持有人和企业的利益,严厉打击侵权行为并建立对相关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跟踪制度和审查制度。对风险创业家的选择机制及激励约束制度安排,一种观点是主张根据风险投资中人力资本的特性来确定。

企业开发和应用高新技术成果及由此而导致的的企业组织变革是高新技术对企业发展构成影响的核心内容,而其背后推动企业开发、应用高新技术的真正力量是人,保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关键靠人力资本及其潜能的充分发挥。有的代表从管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分析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包括员工个体特征、组织特征、环境和战略导向,并结合对有关高新技术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提出了适合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健康成长的有关激励机制的一般性问题与设计思路。

三、信息网络系统与企业发展的新课题

20 世纪 90 年代网络革命与因特网的出现代表着信息系统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越来越多的企业“触网”,在决策、组织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引入信息网络技术和决策支持系统,从而影响着公司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企业更有探讨信

息系统与企业发展关系的必要。据最近国家经贸委对 300 家国家重点企业问卷调查,我国虽有 70% 的企业表示信息化带来了明显的效益,但这些企业平均用于信息系统的累计投资仅占总资产的 0.3%,与发达国家同类企业的 8—10% 和服务型企业的 50% 以上水平相比,相去甚远。研讨会对信息系统与企业发展这一选题形成的观点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信息系统对企业组织变革有重大的作用与影响,而因特网的企业应用又大大地促进了企业组织中信息系统角色的进化。表现在 (1) 信息系统已经成为组织,尤其是工商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2) 信息系统与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信息系统越来越触及组织的核心活动,其所覆盖的组织范围也越来越宽;这也同时使得工作可以不再与地点密切相关,从而创造出集中各种核心竞争力的网络虚拟组织和国际团队。(3) 信息系统为组织设计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比如组织结构扁平化,从而倡导和培育一种更富有人本意义、授权和自我控制相协调的管理哲学;帮助中小型组织获得大型组织的优势,而又使大型组织具有小型组织的灵活性;促使企业组织之间形成信息伙伴关系,重整组织边界,重建工作流程和实施电子商务。(4) 更有意义的是,现代信息系统正在重铸管理过程,促进培养和造就新一代极具创造力和竞争力的管理人才。

二是针对当前一些人在组织制度安排上坚持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组织制度安排正呈现出市场、企业和网络组织的三分法特征,主张大力发展网络化企业集团。并且基于网络组织理论的分析,提出借鉴现代网络组织理论从战略上调整当前我国企业的组织制度的建议。

三是电子商务的规模经济性。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由于其强大的联结力而大举进入传统的商务活动中,形成电子商务活动往来。电子商务的出现与兴起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现实是,至目前为止的世界电子商务企业大多不

盈利。其原因何在呢?会上一种看法是由于尚不具备电子商务的规模经济性。也就是说,目前电子商务降低成本与提高绩效的经济性目标主要是受到规模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同于以往的规模经济性,电子商务的规模经济性由网络信息流规模与物流规模的协调程度决定。为此,要实现电子商务的规模经济性必须区别电子商务的类型及其规模经济特点;促进商务信息流与物流配送体系的协调发展、电子商务企业与物流企业的竞争与合作。

四是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物流业分化与重组。这是一个新的选题,代表们具体地讨论了电子商务环境下中国物流业的分化与重组,包括物流中央化,建立整体化的物流管理系统;通过外购强化整体价值链;与竞争对手在物流和供应链上合作等。

五是人力资源问题的解决。未来的21世纪需要高新技术,需要管理创新,但更需要开发利用好人力资源。对此,会议着重研讨了如下几个问题:(1)在风险治理机制中人力资本的相关激励制度;(2)经营者及其素质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即通过企业内部发生作用;(3)人力资源发展趋势与人力资源政策的关系;(4)探讨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价模型,提出了开发和利用企业家人力资源的组织与制度创新建议;(5)从竞争战略的角度分析了人力资源开发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提出了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特点和发展思路;(6)从建立完善激励机制,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人力资源进行激励,以挖掘更大的潜能;(7)企业性质与雇佣主体的利益目标异同点。也有的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通过对几种不同方案的分析与比较,得出结论:不同的激励方案的激励效果取决于不确定性的相关系数。有的还提出了在管理实践中要结合方案的可操作性来确立相应的激励机制的建议。

四、有关企业改革与市场的讨论

(1) 企业改革。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正进入三年脱困的攻坚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成为与会者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

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邓荣霖教授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由单一投资主体的国有制企业转向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制企业。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改组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形式。按公司制度改造国有企业要求从公司产权制度、公司组织制度、公司管理制度这三个部分入手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的代表从现代企业组织理论出发,提出国有集团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必须进一步解决四个结构性矛盾,即组织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的矛盾,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统筹、协调解决的组织重构建议,包括统筹考虑组织重构,产品重构,人力资源重构与产业结构;编制新的组织图和职位说明书,完善机构调整工作;建立以下级服从上级为基本原则的职权系统,确保组织协调系统和监控系统发挥作用等。也有的代表从组织、流程和岗位三个层次探讨了绩效管理目标、设计和管理这三大要素与如何解决绩效指标之间价值冲突的问题,指明了建立与组织战略价值兼容的关键绩效指标评价体系的方法。还有就是从结构复杂性的角度分析比较了三种提高大型企业组织效率的方案:即以先进有效的信息管理技术和更多的信息获得与利用等驾驭结构复杂性,以不同形式的分权管理简化企业内外部的业务关系从而减少高层管理人员必须处理的结构复杂性问题,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简化企业组织结构和过程。并提出了通过组织创新建立简练、敏捷的组织管理模式的建议。

现实中许多企业碰到的问题首先是债务问题,而问题又很大程度上与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不完备相关。如何跳出旧的债务解决思维定势,找到一条适合新形势发展要求的脱困思路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与会者通过考察债转股、财政注资、银行核销、发行股票、降低利率等几种债务重组方案,提出把企业对商业银行的债务转换成财政对央行的债务,解决企业——银行债务,实现企业脱困转制的方案。还有的从经营效益、资本结构理论、财务

杠杆原理等财务管理的角度分析了债转股对企业的影响。

(2) 对资本与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项研究成果从比较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入手, 分析了有限合伙、公司型和信托基金三种风险投资基金组织形式的优缺点, 指出有限合伙公司在降低和消除投资者和风险管理人的信息不对称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也有的以广州、深圳为重点, 考察了广州区域金融市场的新发展, 提出了以金融电子化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建议。还有就是分别从中国加入 WTO 后银行业的风险与防范、内部人控制与中国金融企业风险形成的角度分析了当今中国金融业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3) 市场与营销。面对新世纪, 一个新的、信息网络技术发挥更大作用的市场环境正强烈地影响着企业的营销。基于此, 一种观点主张根据对麦卡锡营销组合理论的发展过程与适应性分析, 重新定义 4P 的理论内涵。对如何做好企业营销和开发市场需求, 有一思路主张通过对企业运用价格调整及相关形式的价格促销策略, 如折券促销、降价促销来开发市场需求的效果进行比较, 显现成本结构与价格调整间的逻辑关系。也有的从广告的层面分析企业广告与市场营销的关系; 或从重大环境变迁的角度提出转变营销观念, 实现营销创新的要求。

五、战略联盟与我国企业的跨国界发展

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的加快, 如何发展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与会者以企业国际化经营为背景, 分析了当代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发展和国际贸易形态的变化, 指出在我国国情下, 企业参与国际化经营的竞争要优先考虑技术、人才、投资战略。也有代表基于国际

市场的复杂多变和企业经营特征变化的实际, 提出经营者应该遵循基本规律进行国际化经营决策研究, 并掌握必要的决策技能。还有的以全球一体化为背景, 分析在以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经济一体化为基本特征的当代经济环境下发展中国家企业实施跨国经营的战略模式选择和特征比较, 并从政府和企业不同角度提出了促进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对策建议。

战略联盟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跨国公司频繁使用的一种扩张与竞争战略, 这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建立与发展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代表们根据当前国际工商企业的发展趋势, 从战略价值、竞争优势、核心能力和国际化的视角, 讨论了战略联盟的商业价值和发展趋势; 运用 DELTA 模型, 从企业竞争的角度分析了企业联盟关系的回报、战略联盟的驱动力量、实现联盟的途径和行动准则、联盟的风险问题, 最后通过对战略联盟关系的论述, 提出了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也有的通过对战略联盟的性质、特点、分布、原因与动机以及中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状况等方面的分析, 阐述战略联盟这种中外企业合作的新形式对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意义与不同作用, 并指出战略联盟对中外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双赢”战略, 具体到中国国内企业, 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则是学习与赶超的现实选择。还有就是以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为背景, 分析欧盟跨国公司为抢占全球市场, 实施“科技以人为本”的技术战略及其跨国经营战略、筹资战略、投资战略的意义与思想。企业界代表则更多地提供了有关的实证分析。

责任编辑: 谭湛明

时间与空间: 本地区域文化研究的新观念

——“岭南文化与澳门”和“珠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千禧年的初夏, 岭南—珠江文化成了本地研究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 先是粤澳学者 5 月 20—21 日在中山联合召开了澳门回归以后第一次“岭南文化与澳门学术研讨会”。两地官员、学者和工作人员共 70 余人与会, 研讨论文 25 篇, 另有 8 篇论文的作者未到会发言。本次会议是由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澳门中华拉丁基金会和中山市社科联联合举办的。时隔月余 (6 月 28 日), 省政府参事室在广东大厦又组织举行了经过近两年时间酝酿的“珠江文化研究会暨珠江文化特征研讨会”, 在宣布成立学会 (黄伟宗任会长) 的同时, 研讨了珠江文化的基本界定和特征。这两次研讨会, 都在时间和空间的观念上, 表现出对以往的岭南区域文化研究的拓展。

正如炎黄文化研究会欧初会长指出的, 研究澳门与岭南文化的关系, 这不仅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区域文化课题, 而且是明清以来中外交流史的研究课题, 还是 16—20 世纪人类文明进程的个案研究课题。这一点反映在与会的论题上, 区域性、历史性与文化交流的互动性的特点特别突出。围绕“岭南文化与澳门”这个总题, 研讨集中在以下方面展开。

一、岭南文化的整体研究、保护和拓展

珠江文化研究会在筹备期间, 主要成员曾进行两次多学科的实地考察, 一是确认广信作为岭南文化古都, 并就此开辟西江文化长廊; 二是赴湛江、雷州、徐闻考察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海上丝路”。特别是通过横向比较, 与会代表对岭南文化的历史内涵和影响传播有了新认识和拓展, 认为“珠江 (带韩江和南渡江) 文化是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相比较而言的, 其内涵较之岭南区域文化有了更大的延伸, 也同样涵盖了广东的三大民系: 广府、客家与潮汕的文化。同时, 珠江文化有更明显的海洋文

化特色, 海上丝路便是其最亮丽的风景线。”等等。然而, 由于珠江源头可追溯到云南、贵州和越南等地, 珠江文化的溯源研究已超出了以往“两广” (含海南和港澳) 为限的岭南文化的范围。

对岭南区域文化的定位和定性的研究, 根本目的在于使其地方特色得以保留和进一步发展, 这是两会的共同宗旨。其中, 郑德华《试论岭南历史文化的开拓和保护》对这一点的表述尤其明确。他把岭南文化分为五大区域: 珠江三角洲地区、韩江流域、东江流域、西江流域、和广州、澳门、香港; 并且指出: “在整体概念下开拓的岭南文化, 应形成一个文化展示的网络。”他按时、空结合的思路认为, “除了要从地域文化的概念出发, 首先考虑如何发掘以方言为划分基础的亚类型文化外, 还要认真研究岭南历史文化发展的线索和轨迹。即既从横的角度 (地域), 亦从纵的角度 (历史线索) 考虑岭南历史文化的开拓。”而研究的目的, 正在于更准确的把握、更好地开拓岭南各区域特色的文化。

在整体把握岭南文化的内涵特征方面, 其历史的阶段性也受到了重视。如黄明同的《岭南文化的三次大兼容与三个发展高峰》, 以明代陈献章创立的江门学派兼融儒道释、近代康有为和孙中山等人融古今中外文化为一体而创立新的思想学说、以及当代的通俗文化方面的兼收并蓄, 代表性地反映了岭南文化兼融性的特征及其历史阶段性的表现。毛庆耆的《炎黄文化与岭南文化论略》, 更从方法论的角度强调, 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地域文化对比”、“共性 (炎黄文化) 与个性”、“一国两制”等因素, 纳入到对岭南文化特殊性的认识方式中来。

二、文化传播的互动关系

正如蔡鸿生先生在会上指出的, 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互动关系, 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先后和影响大小

的不平衡性,这在岭南本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传播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粤澳本土文化的联系是这一区域文化同源共根的共性所在,但对于粤澳本土文化的(底层)特质,论者有不同意见。如欧初的开幕词讲到:岭南文化“以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铸造澳门文化的基本构架,从而形成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福佬文化等杂糅并存的澳门文化主体,使之根植中华。”而刘伟铿在珠江文化研讨会上则指出,岭南文化长期处于边缘状态,远离主流文化,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是以本地土著(氏族)文化为主体的,它的发展实际上是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影响和兼融的过程。

而从文化传播的互动关系来看,与会论者普遍注意到,本土粤澳文化的历史传播关系,以内地向澳门辐射为主。如霍志钊的《岭南画派与澳门》、徐新的《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与澳门》、谭世宝的《明清岭南宗教文化在澳门的遗传述略》、叶春生的《从舞醉龙说到粤澳民俗的交融》等文,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内地本土文化在澳门的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传播和生根发展的情况。

外来西方文化在岭南的历史传播,则往往以澳门为中介,向内地辐射。与会论者普遍注意到,澳门是广东开埠较早的地方,华洋杂处与澳门土生构成了中西文化转换的中介,在岭南的外来西方文化的传播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与会代表黄启臣的《从澳门的华洋通婚看中西文化的交融》、范岱克的《利用珠江三角洲的文化遗产发展澳门和广州的贸易往来》、董少新的《十九世纪前期西医在穗澳两地的传播》、叶农《从〈中国丛报〉看19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士在粤港地区从事的医疗活动》等文,便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澳门在外来西方文化向岭南内地(以至中国大陆)传播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有的论者则指出,文化交流的互动性还表现为传播的非单向性。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内地的辐射传播,就不是单向、被动地进行的。在西方教育的影响下,澳门与广东教育的合作与交流就是很好的

说明。如陈汉才、黄明同《澳门与广东教育合作交流的回顾与展望》指出的:澳门最早传入了西方的教育思想,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具有典型意义的教会学校在澳开办,对广东产生辐射,为广东培养过文化精英,直接推动广东变革传统教育的改革,促使广东进入全国教育的先进行列,并较早地与世界教育接轨。另一方面,广东领导近代潮流的精英,也到澳门传播教育思想,创办平民教育,促进澳门教育的发展;抗战期间,广东名校、名师避难迁澳,促进了澳门教育整体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更为澳门培训了大量师生,使澳门在回归前迎来了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这都是反向影响的结果。此外,中国的许多物产和文化,也通过澳门,在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互动影响中,先后传播到西方。

三、澳门史与文化人物的研究

澳门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历史背景的地区,在岭南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不仅有典型性,而且有着自身丰富的内涵与特点。这在澳门文化事项的专论中,有较多较深入的揭示。如林子雄的《澳门印刷出版史述略》、陈泽泓的《中西交融与澳门建筑景观》,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中某个文化方面在澳门先行发展的历史及其与周边地区(特别是广州和香港)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王建军、田映霞《试论清末民初澳门华人教育的兴起》、卜穗文《澳门的抗战文化》则反映了内地文化在澳门对澳葡统治的顽强抗争、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等等。

研究澳门文化人物的与会论文,除王杰、李振武的《近世先贤与澳门》仍继续探讨近代中国历史较有影响而与澳门又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林则徐、容闳、郑观应、康、梁、孙中山等之外,谭世宝、曹国庆的《对汪柏与中葡第一项协议的再探讨》引起了对汪柏其人的争议和关注。刘伟铿则在珠江文化研讨会发言指出,赵佗带来的是赵氏家族文化而非中原文化,此说也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关注。对更多文化人物的挖掘和研究,将有助于岭南文化以至珠江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王可)

论对网络的法律规制

□ 张文彪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053)

[摘 要] 在网络化时代, 如何对网络进行法律规制是国际社会及各国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尽管一些发达国家在网络立法方面走在前列, 但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对网络的法律规制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 不断完善网络立法和加强国际网络监管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网络立法 概貌 完善 国际监管合作

[中图分类号] D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0) 08- 0073- 04

当今的世界已经进入了网络化时代。“所谓网络化指的是纵横交叉的互动式信息网络来实现信息的交流和共享, 把电脑的互联网络普遍化”。^①当网络化随着资讯科技的日新月异逐渐扩张其规模时, 如何对其加以规范, 不但是各国政府, 而且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

在对网络的法律规制上, 发达国家走在世界前列。1996年2月8日美国通过了《传播通信法》, 该法的宗旨是提高全球电信服务质量和促进电信行业竞争。其中的《通讯正当行为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通过 Internet 传播黄色、色情读物和画面。德国政府采取“不能容忍原则”来制止在 Internet 上展现“淫秽”和“纳粹宣传”资料。^②法国检察机关在 1997 年起诉了一家网址注册商, 因为该注册商在其网址

上上载了一本披露前法国总统秘闻。新加坡于 1996 年 3 月颁布了有关 Internet 的立法, 以保护本国的文化价值, 该法禁止 Internet 使用者和网上服务器传播黄色、色情读物和在网上散发反政府的政治言论。我国 1991 年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1994 年颁布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 1996 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 1998 年 2 月 13 日又颁布实施办法。上述法律、法规对网络的法律规制, 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但在对网络的规制上, 政府面临着两难, 即在允许、鼓励信息自由交换、流通的前提下, 如何阻止不健康及不能被接受的信息通过 Internet 进入本国。一是每个国家对“不可容忍”信息的甄别标准不同, 很难统一。关于什么是“不可容忍”的信息,

美国认为: 1. 有关资料只能适用于成年人观看, 如“淫秽”; 2. 有关资料是不能被接受的、没有任何益处即“下流、有伤风化、猥亵、不道德”。③目前, 在“不可容忍”的含义上, 美国与欧洲联盟有相似之处。美国和欧洲联盟都认为, 未成年人不应接触“淫秽”, “下流”的信息, 这方面的信息有害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应被制止和取缔。此外, 有些国家认为有毒害作用或有副作用的信息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如马来西亚认为, 通过 Internet 传播的西方哲学与马来西亚的社会风俗和文化观念大相径庭, 不能被接受, 应予以制止。二是每个国家都有权按照本国的价值判断和对网络的认识来对网络加以规制, 一国无权对他国的网络规范评头品足抑或加以指责, 在网络世界里还未出现国际网络法律。三是某些法律专家认为网络世界本身应该构成一个“网络主权”, 亦即来自现实世界里的政府, 没有任何介入网络世界运作的正当性可言。④网络世界本身所发展出来的社会规范与资讯科技, 也在网络社会发挥相当程度的规范功能。现实世界的政府在面对网络世界深不可测的对象时, 在一片慌乱中未经深思制定强制性的法律, 决定网络世界的未来, 很可能造成灾难性的错误。⑤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通讯正当行为条例》的第二天, 一项涉及到该法是否合宪的诉讼开始了。美国最高法院认为, 《通讯正当行为条例》违反宪法。法院强调指出, 该条例规定并列举了通讯不正当行为的标准, 该标准造成了“低劣的效果”, 因为它违反了言论自由, 违反了成年人相互沟通的权利。它是政府在网络上对公民所要看的和所要说的实施控制的一种手段。而且, 该法对制止外国人通过网络传播淫秽、下流及不健康信息没有任何约束。鉴于最高法院的意见, 克林顿总统决定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规制 Internet。⑥四是法律在面对网络产业这一规制对象时, 最为困扰的问题是在于其变化速度过快, 而在这个过程中, 社会作为整体, 变得越来越依赖大型的、微妙结合起来的技术系统。今天不单是全球化金融系统在利用网络在世界范围

内转移资金, 大多数公司把财务记录储存在计算机内, 甚至国家的整个军用和民用基础设施都越来越依赖于网络。但与此同时, 尽管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 但它永远处于一种趋于完善而不是完美的境地。技术的新功能总是伴随新的漏洞和弱点, 人们对网络的巨大依赖性和网络本身的技术缺陷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法律在这一对矛盾面前, 显得无所适从, 立法的所谓“超前性”在网络技术日新月异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使得方才出现的法律争议, 很快地便无甚争论价值。或者在特定法律争议背后所涉及的根本问题无法在现有的法律架构下获得恰当的答案之前, 便随即必须改弦易辙。

二

伴随着网络概念向人类社会纵深领域的延伸, 网络对现实社会的覆盖范围, 个体与现实社会的交互性作用会有更高层次的发展, 网络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主要生存方式。面对网络时代, 加快网络立法的步伐和加强国际网络监管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 完善网络立法

由于网络具有技术性和程序性很强的特点, 普通的如收发电子邮件、网址访问, 更为深层次的如编写基于网络适用的程序、入侵他人电脑等等, 因此网络法的渊源已远远突破传统的法源种类。有些学者认为在今天这个科技改变一切的时代中, “我们必须尝试采取和过去在现实世界里所因袭的法律观点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网络世界的规范问题”, ⑦可见所谓网络法是指“用以规范网络运作和信息流通的制定法与非制定法规则的总和”。⑧

第一, 成文法。在今年3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 代表们对网络立法的呼声很强烈。一是网上版权问题, 网上版权的适用究竟应该固守现行的法律规定, 还是倾向于加以限制; 如何获得法定许可, 如何支付作品的网上版权使用费以及如何确定网上版权侵权行为等等, 要求修订现行法律或制定网上版权适用规则的呼声日见高扬。二是电子商务立法。利用电子网络进行的商务活动, 即电子商务将逐渐取代

传统的商品流通和企业营销方式,这是当今全球的发展潮流。国外一些学者认为,电子商务的技术问题可以在短期内解决,而制约电子商务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与之配套的系列法规、交易规则等的建立。事实上,电子商务的出现,给传统的包括合同法在内的法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比如电子商务当事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电子文件的法律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电子商务、电子付款、电子支付与风险分担以及在 Internet 对个人资料的保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规范需要用立法(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三是制定计算机法,我国目前规范计算机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及有关国际公约的条文中,这些法律法规不能涵盖计算机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经济关系,比如计算机犯罪,对计算机实施病毒行为,非法进入,计算机欺诈、侵权行为,证据规则,搜查和扣押等等。

第二,网络社会自我规范机制。“网络世界不是一个没有规则或规范的世界,在各种不同的网络社群里,早已发展出为其成员所遵循甚至为多数网络使用者所认同的网络习惯法”^⑨即网络社会自我规范机制。虽然网络目前的架构方式是分散式、分权式的,但网络本身的运作仰赖许多必要的软件硬件设备以及通讯协定。例如 ICP/IP 通讯协议,PPP 通讯协议。这类通讯协议,即是在不同网络之间,甚至网络管理者与使用者之间自动自发的协力合作方式,达到通讯规范的目的。目前在网络上具有主导地位 Microsoft 和 Netscape,其产品往往具有为网络设定某类标准的作用;在许多信息产品的研发过程中,各种技术标准通过某些技术组织共同订定。从网络的发展历史来看,许多成文或不成文的网络规范事实上发挥了相当程度的网络规范效果。

第三,应用信息技术规范网络。目前较常用的作法是以电脑软件控制网络活动,用电脑软件阻止那些不被用户接受的网址,留下可进入的那部分;在网络上的某些区域,必须通过输入密码认证身份

后方可进入,比如 CHAP 网络认证协议就有此项功能。其原理为:连接时,先由网络主机送一个密码字(Key)给用户电脑,接着用户电脑会用这个密码字来加密要传送的用户名称及用户密码,然后传回网络主机。该主机将接收的数据解密,再核对用户名称及密码,核对无误后,确认为合法用户。例如,你想在网络上阅读成人色情杂志,通常会被要求以某种方式设定个人密码或身份证明,从而方能获得阅读的权利。目前网络上几个比较著名的密码或身份证明制度,包括 Adult Check, Verisign 以及 First Pin 等,皆以验证使用者的年龄为主要目的。有人建议采用过滤技术,审查 Internet 内容,但不现实。因为每天都有大量的信息通过 Internet,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成为全球范围的媒体制造商”。^⑩如果都过滤需要时间,同时与 Internet 信息流通快捷、自由的原理相悖。新加坡政府所采取的作法是,设立一个独立的服务器,用于检查用户网络,每年花费 70000 美元,收到较好的成效。^⑪实践证明,应用信息科技规范网络,能发挥相当有效率的规范作用,目前已成为网络规范的重要力量。

(二) 加强国际网络监管合作

在网络规范的各国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法理念,即政府审查制和用户或网络提供商自我管理制度。亚洲国家如中国、新加坡倾向于政府审查制,美国和欧盟倾向于自我管理模式,欧盟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研究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该文件叫做“在信息服务领域对人类尊严保护的绿皮书”,提出了用户或网络提供商自我管理模式,得到了欧盟和美国的支持,它们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又不因此减少人们自由表达意思的水平和阻滞信息的流通。

那么如何在信息时代加强国际网络监管合作呢?我们知道,Internet 推动信息跨国流动,这种信息跨国流动,包含了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和人文特征。在不平衡的信息流动中,信息输出大国更容易将本国的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通过 TDF 传递给其他国

家,进行文化扩张。这也正是一些国家实施“政府审查制”的初衷。所以,国际法规的制定对推动 Internet 至关重要。我们认为,签订国际双边或多边条约(协议)是目前较为切实可行的网络国际监管合作方式。这种双边或多边国际条约(协议)的基本原则包括:(1)重视在规范 Internet 中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法制环境、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作的努力;(2)检视对 Internet 的规范方法以及它们各自的不足点;(3)提供一个弹性的规范架构,即允许各国自由地实施其认为较理想的规范标准;(4)重点规范网络提供商和政府对它们的控制。当政府指令网络提供商清除“不可接受的信息”,网络提供商不给予合作或不执行,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通常,要求网络提供商与政府合作所增加的费用,比起对成千上万连着 Internet 的计算机软件实施审查的费用要少得多。最后,建议所有国家组成国际网络协调委员会,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对 Internet 实施弹性的规范制度。

参考文献:

1. 乌家培《论信息经济管理》,载《管理科学》

1998年第3期。

2. 1995年,德国巴伐利亚法院对 Compuserve 公司的高级职员进行审判,因为他们在网上展现“淫秽”读物和图片违反了德国反淫秽条例。

3. 11. 参见 sean selin: Governing Cyberspace, the need for an International solution, 32, GON2, L. Rew 365- 382.

4. 参见 John Perry Barlow, Cyberspace Independence Declaration, available on line at < <http://www.eff.org/~barlow> > .

5. 参见 Ching - Yi Liu, the Regulation of Cyberspac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March 1997) .

6. 参见 <http://www.epic.org> (free - speech) .

7. 8. Rosemary J. coombe, left out on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75 OR, Rev 237 (1998) .

9. 参见 James Crleick the Information Future, NY. Times, May 1, 1994.

10. 阿·托夫勒《为信息时代的冲突作好准备》,载美国《未来学家》1988年第6—7号。

责任编辑:周 华

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法律思考

□ 唐政秋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 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推行, 国家公务员失业的情况难以避免, 建立和完善我国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在分析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现状的基础上, 阐述了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提出了从制定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法规、完善有关配套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入手, 从而尽快建立起我国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思路。

[关键词] 国家公务员 社会保障 失业保险制度 失业保险基金

[中图分类号] D6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8-0077-04

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 是指国家依据法律和法规, 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对国家公务员因遭受本人所不能控制的失业风险而中断收入时, 在一定时期内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以维持其基本生活并促进其再就业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是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基本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前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过程中, 建立并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家公务员制度要求和国家公务员职业特点的失业保险制度, 对于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现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 国家公务员是指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1993年底以前又称国家干部或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 前身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 创建于建国初期, 在“文革”期间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施, 作为其重要配套工程, 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了政府的充分重视, 进行了

一系列改革, 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 为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初创于1986年, 以当年7月12日国务院颁布的《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为标志; 1993年4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 进一步完善了失业保险制度; 1999年1月22日国务院发布并实施《失业保险条例》, 将失业保险范围由原来的国有企业职工扩大到城镇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然而,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至今没有将国家公务员的失业纳入其范围, 目前只有深圳市等极个别开放城市规定了国家公务员的失业保险,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行失业保险制度的不足。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建国以来, 我国传统社会保障制度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偿提供了充分、完善的国家保险和就业保障。随着经济体制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加快,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向前推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国家公务员失业的现象开始出现, 迫切需要改革传统的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新时期的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

二、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 保证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顺利实施的需要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 政府机构设

置和人员配置应根据上层建筑适应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总体要求不断加以调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正是国家转变政府机构职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重大举措。现在,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改革正在有序推进。政府机构在精简、转换职能的同时,一部分国家公务员面临着分流,甚至下岗、失业,如果没有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与其衔接,政府机构改革工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二) 推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需要

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国家机关中真正形成能进能出、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激励机制,实现人员的合理流动,充分调动国家公务员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但由于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功能不全,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尚未建立,已成为制约人事制度改革纵深发展的“瓶颈”。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迫切要求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

(三) 充分保障国家公务员基本权利的需要

国家公务员既是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同时又是国家的公民。一旦失去工作,依法享有从国家或社会获得救助的权利,国家或社会也有义务为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因此,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一方面有利于解除国家公务员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定。

(四) 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需要

建立健全统一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条件。失业保险制度,是我国统一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国家法律强制实行的社会保险,起着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和“安全阀”作用,为其他社会保险制度无法替代。尽快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无疑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应遵循的原则

(一) 必须符合国家公务员职业特点

从担负的职责看,国家公务员担负行政管理工作,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实现法律目的,在各项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始终处于重要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地位。从职业性质看,国家公务员是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依法执行职务的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所在单位或部门没有独立的利益关系。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时,必须充分考虑,使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能体现出国家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

(二) 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原则

我国长期实行国家统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保险制度,人们的依赖性强,风险意识比较淡薄。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必须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享受失业保险,是国家公务员应有的权利,《劳动法》第七十条规定:“国家发展保障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养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国家和社会必须保证维护国家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同时,国家公务员也要树立自我保障意识,积极参与失业保险,尽缴纳失业保险个人支付部分的义务。要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法律规章制度,以保证国家公务员都参加失业保险,履行应尽义务,享受应有的权利。

(三) 国家和个人共同合理负担的原则

我国过去的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其资金全部由国家负担,没有形成基金积累,造成了许多遗留问题。随着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障制度也应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失业保险基金应由国家和个人共同合理负担,以国家负担为主,这样既可以增加资金来源,减少国家部分财政支出,又可以增强国家公务员的失业保险意识,并进而促进国家公务员珍惜工作机会,激化其工作热情。

(四) 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真实情况和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失业保险,可以说是社会救助的一种形式。失业保险待遇项目及水平的确定,同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实情况和经济发展的水平有直接关系。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建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待遇水平应按照低于国家公务员最低工资,略高于社会救济金发放标准的原则确定。考虑到国家公务员与其它行业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应使国家公务员的失业保险待遇水平略高于其它行业人员,以利于吸引社会上真正优秀人才,稳定和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

(五) 与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相协调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必须紧紧地同正在健全完善的国家公务员社会保障制度和全社会的保障制度相协调,应做到凡能由全社会保障制度相包容的部分,尽量适用全社会统一的保障制度的规定,以有利于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向社会化发展。

四、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法律构想

(一) 加强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的法规建设,实现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法制化

只有建立起系统的、科学的并具有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的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法律、法规体系,才能为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及其工作提供起码的活动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才会使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工作得到落实和执行。目前,我国仅有《劳动法》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对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进行了原则性规定,而缺乏对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进行具体规定的法律、法规。因此,必须尽快加强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的立法工作,首先要在宪法中增补失业保险的条款,以增强失业保险法制建设的权威性;其次,要加快制定《国家公务员法》和社会保障综合法即《社会保障法》;第三,要通过制定专门法规,如《失业保险法》或完善现有的《失业保险条例》,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对国家

公务员失业保险作出具体明确规定,维护失业保险法律、法规的真正效力;第四,要明确和制定有关法律责任和处罚条款,以发挥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法律的威慑力。

(二) 设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基金

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基金是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的重要内容。设立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基金,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应借鉴、参考国外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基金的有关规定及我国在失业保险基金设立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基金的构成、筹集及负担比例、支出项目、管理监督等内容;第二,要考虑到国家公务员在职业性质、工作内容、对象范围、权利义务、经费来源、管理方式等多方面都同企业职工存在区别,尤其是国家公务员承担着组织和协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责任,因此,国家公务员的失业保险经费应主要由国家负担;第三,要加强对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建立健全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基金使用和管理的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要吸取现行失业保险基金中较普遍存在的浪费严重、资金被挪用的教训,建立由财政、审计、银行、工会等部门参加的失业基金管理委员会,切实加强对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基金筹集、使用的管理和监督,严格审批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基金年度预算和年度决算,将失业保险基金营运纳入国家财政部门 and 审计部门的监督之下,做到专款专用。

(三) 建立统一的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管理机构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形成了多头分散管理的格局,政出多门,缺乏完整的立法和统一的管理办法,民政、劳动、人事、卫生、组织、工会等部门都充当了社会保险管理者的角色。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规定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管全国社会保障工作。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工作作为社会保

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应当纳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职责范围,并应成立具体统管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工作的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制定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的法规、制度和政策,监控和协调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工作的运行等。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也要设立具体管理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的机构,统一经办各地国家公务员的失业保险工作。这样,就可以在全国建立起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网络体系。

(四) 促进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与其他具体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协调

为了给建立并推行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创造更好的条件,促进其与具体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协调,国家还必须抓紧做好以下几方面的配套改革:

(1) 改革完善国家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国家现行的国家公务员退休条件规定及待遇给付办法,难以有效地解决国家公务员失业后面临的问题。因此,应尽快建立和推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基金统筹模式,并采取养老保险金待遇分段给付的办法,以保障失业人员的法定权益,为其再就业创造条件,并促使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

(2) 改革、完善国家公务员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公务员失业期间,其医疗费用如何负担,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为保证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顺利推行,需要国家公务员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积极配合。国家要加快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应积极按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国家公务员失业后,也应该实行大病医疗费用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保证他们生病能得到及时医治。

(3) 建立完善国家公务员伤残保险制度。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丧失劳动能力或残疾后,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为充分保障公务员这方面权利,应建立健全国家公务员伤残保险制度,国家应制定出相应的、合理的法规或政策,对国家公务员在职期间的伤残保险作出规定,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家公务员伤残后失业或失业后伤残的生活问题。

(4) 深化国家公务员住房制度的改革。目前,我国职工的住房制度已取消实物性福利分房,实行住房货币化的分配政策,逐步推行职工住房个人所有化,这样可为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制度推行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5) 改革用工制度,规范、完善“再就业工程”。国家要推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灵活开放的用工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为供求双方提供中介服务的各类劳务市场和人才交流市场,要总结近年来实施“再就业工程”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规范、完善我国的“再就业工程”。国家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并抓好落实,为失业公务员提供全方位的再就业服务。国家公务员失业保险管理机构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也应积极开辟力所能及的生产自救活动和就业渠道,为促进失业公务员再就业提供机会和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多吉才让著《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
2. 郑功成著《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3. 张琪、刘雄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经济管理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4. 《社会保障制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8 年第 1—12 期。
5. 《社会保障制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99 年第 1—5 期。

责任编辑:周 华

谈史学的社会功能

——访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教授

□ 杨桂宏

(北京工业大学社科部, 北京 100022)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8-0081-03

建国初期, 太平天国史研究曾很受重视, 其研究成果几乎比近代史其他领域研究成果的总和还要多。“文革”后到80年代中期, 太平天国史研究虽没有50、60年代那么热, 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增强。近几年, 太史研究显得冷寂。就这一现状, 我走访了年过七旬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王庆成教授。

问: 王老, 太史研究这几年似乎平静了许多, 但也让人感到深刻宽泛了许多, 可以这样说吗?

王庆成(以下简称“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数渐渐少了。过去强调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新式农民战争, 这影响到人们对太平天国重要性的看法和史学研究者对历史兴趣的选择。现在情况不同了, 人们面临的现实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史学关注的领域转移并拓宽了许多。太平天国史也不像以前那样倍受史学家瞩目。另外,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若干年的研究, 太平天国史的许多问题, 都有了一批积极的研究成果, 要进一步深入, 客观上也不需要“大兵团”作战了。比较冷寂平静, 并不是什么坏事, 如果要几百人、上千人都同时一哄而上, 那其中没有炒冷饭、没有低水平炒作成份是不可能的。历史研究的话题在某一阶段曾经非常热, 后来在某一个时期冷却下来, 这是常理。现在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不多, 说明这些人对太史研究有见识、有自信, 不是随大流的。这样他们就能做出点

事情来, 也许研究得更深入些, 相信研究的收获还是会不错的。

问: 那么, 就太平天国史而言, 哪些问题更值得深入研究呢?

王: 就具体问题而言, 哪些问题重要或次重要, 可能有见仁见智之别。但我想大家都会同意, 对太平天国的性质和意义作出阐释, 是太平天国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一大问题现在还缺乏深入解决的基础。我想原因在于用力不够或回避困难。另外还由于我们对农民研究甚少。中国是一个农民最多、农民战争最多的国家。农民战争讲得很多, 但对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作为社会的群体却研究甚少。农民的经济行为, 他们对前途的态度、对政府官员的心理、对子女的期望等这些问题都很有研究价值。农民、工人都应该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有学者最近出了两本中国近代史上工人阶级状况的资料, 很有价值。对农民的研究则更为薄弱。70年代末, 英国太平天国史专家柯文南向我们介绍过英国出版的《农民研究》杂志, 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实际上, 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根本问题需要农民研究的支持。太平天国战争的主体是农民, 理解这场运动需要对农民有所理解。西方有学者认为, 16世纪欧洲的农民运动是想改变他们当农民的境遇并不想改变他们自己的农民身份; 而太平天国造反的农民只想改变他们的身份, 而不大关心当农民的境遇。这种说法似乎部分符合实际, 但要真正判断这

种说法正确与否,就要研究中国的农民和对中西农民进行比较,而对此我还没有认真研究过。

问: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不景气,似乎从一个侧面透视出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您认为史学怎样才能走出低迷?

王:太平天国研究比较沉寂,有其特殊性。平静的现状也许能激励有志者做出好成绩。有价值的著作眼前可能只印了几百本、一千本,但只要能被收藏、流传,学术的生命不会中止。至于整个史学,虽有一些“亮点”,但总的说来,的确偏枯了。对学科的支持、对人才的培养,需要社会和有眼光的主事者的支持。现在文娱圈中多演出历史题材的节目,情节虚构是不足为怪的,而时代典制的错乱,如太平天国将领剃头拖辫、清宫太监穿黄马褂之类,却令观者深深感叹。这不是繁荣历史,而是嘲弄历史。

史学要克服偏枯,除了需要外部的支持外,也需要研究者对自身工作的调整。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际史学会会长——一位英国的经济史教授来中国,有人问他,史学不受重视,怎么办?他说:“我有一个劝告,你们要去研究 business history——经济史、商业史、实业史。经济界、商业界的人士对这些非常欢迎。我写的英国公共交通、地下铁道这些方面的历史书,他们都买着看。”的确,史学家要注意研究当前社会上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之过去状况,这是普遍的,不仅仅适用于现在。在革命年代,重视革命史研究。现在,国家实行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与它们相关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状况就比较受到社会的欢迎和重视。

史学要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要同丰富鲜活的社会生活发生密切联系。当然,史学还是史学,并不是要史学变成现代问题研究,只是史学关注的中心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社会科学界一位领导人曾说,史学研究的问题是关注的中心没有转移好。经过这些年史学界的努力,我们在这一转移过程中已经前进了许多。我们要继续深入,更多地得到社会的重视,而这也有赖于研究者本身素养的提

高。

问:这里您提到研究者的素养,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王:中国传统史学实现其自身价值主要是致用、鉴戒和垂训功能,这种影响及于近现代的历史研究,即研究中偏重于人物、事件的评价。比如对历史人物,总是要定性,好的坏的、忠的奸的、英雄叛徒等。我国史学的这一传统是应该有分析地加以继承的,但必须力求与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相结合。史学家应该警觉自己对现实的观感影响自己对历史的观察而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这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素质”或“职业训练”。如果不去警觉它,反而有意无意地比附、改铸历史以求“致用”,那就大谬而不然了。史学的致用功能不应该理解为对古人古事的教训生吞活剥。如黑格尔说过的,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但他们学到的极少,也罕能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历史学作为一种基础的人文科学,学用之间不应企求等值回报,它对人文精神的贡献和作用均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人吃了一个馒头,不会长出同样大小的一块肌肉,必须经过咀嚼、消化,变成养料,才能使生命得到增强。

西方史学,尤其近代西方史学,扩大了研究领域,不专注于政治人物、事件,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这就是由于“年鉴学派”的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广泛兴起。西方史学不关心资鉴作用。它重视社会变迁、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其功能主要在于认识过去,以有助于认识现在。我国史学应该而且正在受到它的影响而走向更为完善。为适应这种需要,史学研究者需要有较多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以提高认识过去社会的能力,这也是你所说的素养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近几年社会史的研究很热,有人把它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也有人把它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您是怎样认为的呢?

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没有传统。新中国成立

后, 政治斗争、革命斗争的历史倍受重视, 社会史基本上是空白。20 世纪 70 年代末, 我们逐渐接触到国外史学研究的动态, 逐渐意识到研究社会、经济历史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国近代史, 过去只注重几次“革命高潮”、几大事件, 对过去历史的认识远不全面。80 年代中期, 我负责七五社会科学规划近代史学科小组的工作, 曾试着暂时撇开传统研究课题, 提出研究城市、农村、边疆以及移民等新课题, 以倡导社会史研究。建议得到小组赞同, 所以那一年的中国近代史课题指南有让人耳目一新之感。不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认识国情问题的提出, 为开展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方针上的依据。十几年来, 社会史研究从起步到初步开展, 已有不少优秀成果。它也影响了传统的研究课题, 一些政治史方面的问题注意了当时的社会动态, 使它们有了新内容, 甚至有了新生命。

一些年来, 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方法等问题有争论, 这是有益的。但似乎也不必乐此不疲。从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历史和许多优秀成果的内容来看, 不难找到无疑义的社会史课题和方法。以社会科学的知识去观察历史上的问题, 丰富的社会史课题就

在眼前。

问: 您认为史学研究应如何处理社会史与传统政治史的关系呢?

王: 社会史不能包括政治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尤其是在二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里, 人民无权, 帝王将相是统治者。我们永远需要叙述得精彩生动的政治史著作, 包括人物传记、研究战争和政治运动的著作。政治史好比是长江大河在大风大浪中奔腾前进, 而社会史则是大江大浪的礁岩河床。我们要研究波浪, 也要研究影响决定这些波浪形式的礁床。

问: 作为一个史学家, 您认为应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与其非利益主体——史学的关系呢?

王: 我曾经在《北京观察》上看到一篇文章, 文章认为以前社会受政治的影响, 现在社会受金钱的影响。我认为史学要适应社会的需要, 但应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 史学家应保持独立的学者风格, 以学术为自己的目标。

责任编辑: 郭秀文

(上接第 65 页)

制度同市场效率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 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探索产权制度创新的途径, 努力构建起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有效产权制度, 客观上也就是提高我国市场有效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途径。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 产权结构虽发生了一定变化, 但产权关系却并未完全明晰, 这既同国有资产缺乏人格化所有者代表有关, 又同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有关。因此, 亟需在认真总结产权制度改革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找准现存的问题和矛盾的症结所在, 进一步深化改革, 探寻产权制度创新之路。

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进行产权制度创新, 建立起一个产权明晰、具有排他性、可以自主转让, 并且得到有力保护的有效产权制度, 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奠定坚实的基石, 为市场效率的保证提供一个基本的条件。

①参见赵忆宁:《电信垄断造成高资费》, 成都晚报, 1999 年 3 月 17 日, 第 13 版。

②程民选:《产权与市场》,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③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 第 105、164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责任编辑: 谭湛明

重现历史

——再谈影视史学

□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上海 200433)

[摘要] 本文是作者于 1996 年发表的《影视史学: 历史学的新领域》一文的姊妹篇。作者是想通过影视史学来展示当今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新景观。文章以历史影片《鸦片战争》为主要个案, 从史学理论的视角再谈影视史学。

[关键词] 影视史学 史学理论 《鸦片战争》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0) 08- 0084- 07

现当代西方史学正在不断发展, 它既表现在历史研究领域向纵深的开拓, 也表现在历史学理论不断的重构。正在欧美崛起的影视史学, 为此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影视史学”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历史思想家海登·怀特首先提出来的, 他于 1988 年杜撰了一个新名词 Historiophoty, ①台湾学者周梁楷把它首译为“影视史学”, 已获得学界认可。②笔者 1996 年发表《影视史学: 历史学的新领域》③一文, 意在向内地学界引进这个“新玩艺”。此文发表后, 在内地学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回响。本文是上文的姊妹篇, 以历史影片《鸦片战争》为主要个案, 从史学理论的视角, 通过讨论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的问题, 再谈影视史学。不当之处, 诚望方家不吝赐正。

—

首先有必要对影视史学的定义作些说明。在首创者海登·怀特看来, 影视史学的意思是通过视觉影像和影片话语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④但我们切不可望文生义, 台湾学者周梁楷认为, 影视史学不仅仅是史学与电影、电视等新媒体相交汇的产物, 而且它所勾画出的视觉影像 (简称影视) 还包括各种视觉影像, 凡是静态平面的照相和图画,

立体造型的雕塑、建筑、图像等, 凡是所有影像视觉的媒体和图像, 只要能呈现某种历史论述, 都是影视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⑤周氏之论甚是。不过, 在怀特的定义中所强调的视觉影像, 明显地突出了电影的重要性。故本文选择历史影片《鸦片战争》为讨论中心, 从人们常说的历史影视中的“重现历史” (或“再现历史”) 谈起, 探讨影视史学的理论建构, 藉以窥见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新景观。

“重现” (Reconstruction), 又称再现、重演、重建等, 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常用的词语, 同时它也频频地出现在学术研究中, 尤其是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历史能否重现, 引起了现代学者的关注, 并引发了不同的意见。

历史会不会重现 (重演)?

一种意见认为,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 历史学家可以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 从而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向, 但是任何历史都不能重演。⑥

另有持相类似看法的人也说, 如果说一般而言的“可重复性”是指“能够再现”的话, 那么, 在“历史规律”中则完全不存在这种严格意义上的“重复”, 因为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⑦

当代分析历史哲学的名家卡尔·波普尔也指出:

在历史学里我们掌握的事实往往非常有限,而且不能照我们的意志去重演或补充。⑧

另一种意见认为:

第一,事物的重演问题,既是本体论上的问题,又是认识论上的问题。说它是本体论上的问题,那是因为没有重演,总是有关事物本身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外加上去的東西;说它是认识论上的问题,那是因为将事物本身所特有的某种东西称之为重演,总离不开我们的描述和概括。

第二,重演(重现)一词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和用法。

1. 重演一词可以用来指称事实或事物的具体内容上的相似。这里的重演相当于类似或相似。

2. 重演一词也可以被用来指称事实或事物的某种本质关系或属性上的同类。这里的重演,其含义则是指同类。

这是对“重现”作出具体分析后而得出的,这种观点颇具见地,值得重视。⑨

让我们举一个历史事例来验证上述论点吧。

a. 古罗马统帅凯撒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被刺。

b.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于1865年4月14日被刺。

c. 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于1995年11月4日被刺。

上述三个具体的事例,是否显示出某种重演性呢?这取决于这三个具体事例本身的性质(事物的客观性)也取决于我们的认识方法(认识事物的主观性)。

众所周知,人的认识总是由特殊进入普遍,从个别走向一般。在认识的前一个阶段里,我们要认清的是每一个个别事物的特殊性,研究它们各自特定的时空定位(被刺发生在何时何地、弄清楚它们各自的内容细节,被刺者是死于刀刃、枪弹还是炸药等),此时,我们不会把a、b、c这三个具体的事例视为重演,正如哲学家金岳霖所说:“事实既是特

殊的,它当然是不能重复的。”⑩

在认识的后一阶段,我们要认清的是非个别事物的特殊性,而是要从这些个别的、特殊的事例中寻求它们的同一性,亦即它们之间的某种本质的联系。这时,a、b、c这三个具体的事例的外在差异性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它们由同类而表现为重演,于是人们发现a、b、c三个事例都呈现出一种重演性。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历史不又是可以重演的吗?倘若以具体细节重演的不可能性(凯撒在出席元老院会议时被政敌多人用利刃刺死,林肯在剧院被刺、翌日伤重而亡,拉宾随着三声枪响倒在血泊中)并以此为圭臬,得出历史的不重演性,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总之,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历史会不会重演(重现)是没有意义的。

以上所述,对我们以具体的材料,进一步分析历史影视片的重现历史的问题是有启发意义的。

二

我们既然要以历史影片作为主要的举证对象,那么人们要问:什么是历史影片呢?

让我们拓宽视角,稍稍回溯一下中国内地学术界在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历史剧讨论中发表的那篇有广泛影响的文章,那就是历史学家吴晗的《谈历史剧》,也许对我们引出什么是历史影片的问题有某些借鉴作用。

在那篇文章中,吴晗认为历史剧应该是这样的:

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人物、事实都要有根据。……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人物确有其人,但事实没有或不可能发生的也不能算历史剧。在这一点上,历史剧必须受历史的约束,两者是有联系的。⑪

在谈到历史剧与历史的区别时,吴晗这样说道:

历史剧作家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具体一点说,也就是要求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没有浪

漫主义也是不能算历史剧的。^⑫

据此,吴晗认为,他写的《海瑞罢官》是历史剧,而把杨家将这类“人物没有根据,事实没有根据”的戏,如《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杨排风》等列为“故事剧”,把《西游记》、《封神榜》等列为“神话剧”,认为它们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

吴晗上述关于历史剧的见解,虽然过于狭隘与逼仄,但对于我们界定什么是历史影片还是有启发性的。据我们看来,历史影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狭义的历史影片,即有历史记载与历史事实的根据,在这一基础上,也可以虚构,进行艺术加工,使情节更曲折,故事更生动。显然《鸦片战争》属于这类影片。外国影片《斯巴达三百壮士》、《辛德勒名单》等也是。这里所说,大致与吴晗上述关于历史剧的定义相当。

另一类是广义的历史影片。其实,所谓历史影片是相对于现代影片而言的。因此,凡反映古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表现某一历史时期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有可能出现的人物,即根据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原则与逻辑原则去综合、概括和反映社会生活,即茅盾所说的“按其人其时的条件有百分之百的可能作此事,出此言”。凡是这类影片都可以归之于历史影片的范畴。

本文所论,主要指的是前一类历史影片,即如《鸦片战争》这类狭义的历史影片,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广义的历史影片就不具有史学价值,从而否认它们也能展现某种历史意念与反映某种历史精神。实际上,这类历史影片“虚中有史”,“假中有真”,一如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它在虚构的故事情节的演绎中,也反映了某种历史真实,亦即显示了某一时代某种历史真实与历史本质的东西。

谢晋说,历史电影的魅力在于真实(他在这里所说的历史电影显然指的是狭义的历史影片),此论可取。学术界评论《鸦片战争》,一致的意见是,它真实地再现了150多年前鸦片战争的历史。

是的,电影《鸦片战争》对那段历史往事的

“还原”,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及具体内容细节上的求真,可称得上是匠心独具而不惜工本。谢晋请来了对鸦片战争有多年研究并有专著《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的青年作家麦天枢、军旅作家朱苏进、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以及剧作家宗福先。他们通盘合作,发挥各自所长,翻阅了数百万字的史料,十几次修改电影剧本,吸收与听取了不少历史学家的意见。正是由于他们的严肃认真,《鸦片战争》在史实上是经得起推敲的,这就大大地疏离了那些“戏说”之类的历史影视片,而具有“正剧”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说,电影《鸦片战争》是源于历史和忠于历史的。那种以历史并不因为几件道具的真而改变它的不可重复性为由,放弃对“历史真实”的追求,是不足为训的。

《鸦片战争》的制作者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是真诚与锲而不舍的,它充分显示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实景拍摄,以重现历史。中英鸦片战争的决战是在海上进行的,《鸦片战争》的宏阔场景也有许多表现在海上。上一世纪50年代郑君里拍《林则徐》时用的是道具船,谢晋拍《鸦片战争》决定动用真船,到海上去拍实景。经过美工师到英国的实地考察,60年代初建造的退役军舰经改建成了大大小小的47条船,其中旗舰“威里士尼”号载炮74门,是按19世纪英国战船精心复原的,原准备在拍完电影后开往香港维多利亚海湾或上海黄浦江陈列、展览,但却在桃花岛附近触礁沉没,令谢晋和众人痛心不已。

影片中的实景拍摄增添了历史真实感与历史凝重感,电影《鸦片战争》用得很多,那个雨打紫禁城的全景图,更为显例,它不仅蕴含深刻的寓意,而且为影片的悲剧风格涂上了浓厚的色彩。

2. 仿真复建,以再演历史。影片多数场景,是根据确切的图书文献资料,重新搭建与精心复制的。“虎门销烟”是体现《鸦片战争》恢宏气势的经典场面,那座销烟池据原遗址另行搭制后,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的专家们看后说:“太像了!”与原物太像

的,在影片中比比皆是,如影片中迎送林则徐的天字码头,那是踏遍广州城,最后看中了江边的那几棵大榕树,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大牌坊,极好地营造了历史的氛围。

《鸦片战争》的许多场景是在浙江东阳重新搭建的“19世纪南粤广州街”外景基地拍摄的。影片中看到的“1840年的广州街市”、“粤海关”、“十三夷馆”、“烟馆”、“妓院”、“酒肆茶楼”、“亭台楼阁”、“小桥流水”、“豪宅”、“棚户”等等场景,是美工师根据当年英国人绘制的铜板画复原设计与建造的,几可乱真。

3. 摹写旧貌,以复原历史。这里说的是异域风情的复原。拍摄《鸦片战争》的时代与50年代拍摄《林则徐》的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要拍摄英国的场景,看来只能在摄影棚内搭布景,而不可能像现在去英国采景实拍。如今看到的英国19世纪的场景,无一不是在那里拍成的:英国首相办公室是由大不列颠博物馆的一间藏书室改制而成的;著名的英国议会辩论那场戏,是在牛津大学一间宽敞典雅的阅览室里拍摄的,数百名“议员”按历史旧貌精心打扮,个个入戏;维多利亚女皇为一条新铁路通车剪彩的场景,是在伦敦郊外的一个老式火车站拍摄的,女皇的装束、军乐队的服饰、火车头上的徽标等,使人们仿佛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19世纪的异域风情,尽在这多姿多彩的镜语中了。这种对历史旧貌的刻意“摹写”,是为了复原那时的历史环境,增加影片所表现历史的真实度。

综上所述,这里所说的电影《鸦片战争》对真实历史的重视,从根本上来说还只能是对那段历史的“摹写”与“复制”,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能复原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与历史影片的制作者所要反映的往事之间是有距离的,这就是海登·怀特所说的“甚至于连历史上任何小事件也无法全盘重现”,即使是现代克隆技术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这两者之间永远是一条渐近线。

这里再补充一则很生动的材料来为此作证,它

说的是,为了纪念滑铁卢175周年,英、法、美等国“再战”滑铁卢,以重温拿破仑旧梦,据记载如下:

他们穿着极为考究的华丽服装,就像过去士兵们出征前接受检阅时一样。他们随着横笛和鼓声行进,羽饰飘摇,短裙摆动,刺刀直竖,铜钮扣和金镶边在骄阳照耀下闪闪发光。然后他们挥舞着旗帜,成群结队地冲进战场,相互攻击。加农炮发出阵阵轰鸣,淹没了滑膛枪射击声,当骑兵杀进来时,马蹄声如同暴雷一般震撼大地,与此同时,士兵们呼喊着涌入两军之间的“死亡区”。^⑬

这次模拟战争,是由那些拿破仑的崇拜者精心设计的。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原貌、战斗过程及具体细节都是由军事史学家完全按照史书的记载进行的。但是,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175年后的今天,再来重现当年的这场战斗,只能是对历史原貌的一种“摹写”与“复制”,而且不管如何精细,1990年的“滑铁卢战役”与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之间,永远只能是一条渐近线。不是吗?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死伤数达47000人,而1990年的“滑铁卢战役”只有一只野兔丧生,这也许是被奔跑的战马踢死的。

但是,观众却在历史影片对历史的“复制”与“摹写”中,看到了历史电影的魅力,并在这种“松软的历史”中接受了比书本与课堂上要生动形象得多的历史知识的教育。

三

历史影片对历史原貌的“摹写”与“复制”,对特定时代历史真实的追求,就其所要达到的“重现历史”来说,还只能是外在的、直观的与浅层次的。为了达到在内在的、思辨的与深层次上“重现历史”,历史影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就我们看来,历史影片要“重现历史”,更要注意历史本质的揭示,历史意念的传承,历史精神的弘扬。因而,历史电影艺术家并不以历史真实的“摹写”为满足,他们有更高的意图,用德国戏剧家

莱辛在《汉堡剧评》中的话来说,就是:

戏剧家并不是为了纯粹历史的真实,而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更高的意图;历史的真实不是他的目的,只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

莱辛在这里所说的“更高的意图”,与我们所说的历史影片更重在对历史本质和历史精神的揭示是相一致的。换言之,即是要透过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进而寻求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性。

历史与历史影片的关系,是要求前者与后者一模一样,还是历史精神的一致?如果是前者,实在是不可能做到的。完全与历史相符合的历史影片是拍不出来的,拍出来了也没人看。因此,我们以为,历史影片与历史只能是历史精神的一致,不可能也不必要与客观存在的历史完全相符。

《鸦片战争》不是历史教科书,它是电影艺术作品,虽然它的创作要受到客观存在的历史约束,但它还应遵循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在此,用得上吴晗在《谈历史剧》中的另一段话:“一句话,历史剧要求反映历史实际的真实,也要求对历史事实进行艺术加工,使之更加强烈,具有高度的感染力量。在历史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剧作家完全有权创造某些故事,当然也有权略去某些历史事实;集中突出某一部分,删去略去某一部分,是完全可以容许的。”^⑭

的确,历史电影要拍得好看,就要创造某些故事,就要对素材进行提炼和概括,通过艺术的想象和虚构来完成。

《鸦片战争》的故事很好,实际上它是经过想象与虚构的,如对情节的虚构,影片中有怡和洋行买办何敬容私造行贿官员密账,继而林则徐烧毁密账以调动地方官员共同抗英的故事。这种虚构不仅对塑造林则徐的大智,而且对推进整个影片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剧作家从历史的考证中发现大清官员“爱大清也爱银子”的史实,于是,就出现了这一令人难忘的神来之笔。

《鸦片战争》中出现的主要人物,都有坚实的史

实依据,但女主角蓉儿却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蓉儿,19岁,畅春院姑娘,是一个“身为烟花女子,但有肝胆气节”(电影中何善子语)的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中国人。但这个虚构的人物在影片中却不是可有可无的,她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据知,蓉儿的情节是剧作家宗福先、朱苏进与女作家王安忆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设想出来的。从何府园林与何善之幽会、颠地畅春院惊梦、英军营地劳军直至蓉姑娘沉江等故事情节,一个烟花女子,但有肝胆、知信义、有正义感的艺术形象,活生生地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比照历史影片《秦颂》,那里所杜撰的栎阳公主与高渐离的情爱关系,由于叙述欠缺合理性,缺少人物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目的合理性与可信性,因此,当高渐离在宗庙与公主作爱,栎阳瘫痪的两腿突然站立时,此情此景令人“匪夷所思”。影片中的这些败笔偏离了创作者原想通过秦王嬴政这一形象的塑造来引发对历史、社会与人生的思考,使原本可以忝列历史影片的《秦颂》走了调。

于是,我们又想到了王元化在《鸦片战争》研讨会上的发言,他这样说:

艺术创作中的想象要与历史结合起来,撒谎不能与想象、虚构相联系。^⑮

我们无意说《秦颂》关于栎阳公主与高渐离情爱关系的设计是“撒谎”,但《鸦片战争》关于蓉儿的设计却是艺术的想象与虚构,因为在那里,人物有其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目的合理性、可信性。为什么有些影片(包括历史影片)被责之为“胡编乱造”,在很大程度上,影片中的主要人物之行为动机、其行为的目的,缺少合理性和可信性,因而也就难以取得观众的信任与认可了。

蓉儿故事的设计不仅有其艺术合理性,而且还有其历史合理性,这种想象是有其历史根据的。这里先引梁启超的一段话:

中古及近代之小说,在作者本明告人以所纪之非事实;然善为史者,偏能于非事实

中觅出事实。例如《水浒传》中“鲁智深醉打山门”，固非事实也。然元明间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即可以借佛门作遁逃藪，此却为一事实。《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骋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①⑥}

将梁氏所论，移之于历史影片，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中虚构的蓉儿故事种种，固非事实也，然在近代中国，像蓉儿这类社会下层者，既受封建统治的迫害，又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在精神上与肉体上都变得麻木、愚昧起来，此却为事实也。因为它符合那个时代，而为那个时代有可能发生与出现的。因此，蓉儿这个角色从总体上也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由此可见，评论一个历史人物的真伪，要看其在特定的时空中所展示的是否符合这一特定的社会情境，亦即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并有其内在的逻辑演变，倘如是，又被正确地表现出来，并为观众所辨识和认可，这样，人物的行为与目的也就不再是“匪夷所思”，而是有其合理性和可信性了。这就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感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感。

还必须指出，影片制作者把蓉儿形象定位为一个备受欺凌的弱者，以蓉儿的悲剧命运来强化对我们民族精神中屈辱、蒙昧、麻木等负面的抨击，这是可取的。倘把她设计成一个反抗型的人物（如义军领袖的女儿或“江湖女侠”什么的），就有可能冲淡这种历史的抨击力量，而与全片的悲壮风格似不协调。当然，这部影片不乏壮烈场面，也着实地反映了我们民族中不屈不挠、勇于牺牲与顽强反抗的精神，但这不应由蓉儿这样一个弱女子来完成。

我们回到前面所引的莱辛的言论，从《鸦片战

争》中虚构的蓉儿一例，可以进一步领会这位德国戏剧家所说的“更高的意图”之含义。寻求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这正是《鸦片战争》制作者们的追求，也是他们寻求的“更高的意图”。

符合历史真实，是一部历史电影的基础，但历史影片制作者却有“更高的意图”，这就是要把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艺术再创造。影片中所要表现的人与事已不是历史上的人与事的简单再现，它应当是也可以是被典型化了的，一如《辛德勒名单》中的辛德勒，与其遗孀在回忆录中说他丈夫其实并非英雄是有反差的，那么《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也不是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历史原型的复制，遑论琦善和道光皇帝了。对历史真实的至诚的追求，又赋予它以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翅膀，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可以说“诗比历史更真实”。

在此稍作补白的是，史学与想象力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余英时曾著文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中国现代史家中以甲骨、金文治古史而卓然有成者颇不乏诗人出身，如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等都兼有诗人与史家的双重身份，“这个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诗的想象和史的形象之间似乎存在着一道互通往来的桥梁。”^{①⑦}无独有偶，1980年牛津大学史学教授 H. R. Trevor-Roper 在其退休演讲中，便以“史学与想象力”（History and Imagination）为题，明确指出没有想象力的人是不配治史的。总之，史学与想象（或虚构）之间的关系，值得史学理论研究家们关注。

典型化，文学艺术的创作原则，也是电影艺术应当遵循的创作原则。没有提炼和浓缩，缺少集中和概括，这样的电影必然是事件的堆积、人物的排比，这样的电影必然是一盘散沙，它还能感奋与震撼观众吗？

在典型化的背后，蕴含历史影片所要追求的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性。电影《鸦片战争》通过对那段令人难忘与屈辱历史的追问，意在揭示“落后就

要挨打”这一至理名言，这是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性。历史影片所要重现的历史，不只是一味要求与外在的、直观的与浅层次意义上与历史事实的一致，而更重在与内在的、思辨的与深层次意义上的历史本质的吻合。重视历史，重在与历史精神的相符，《鸦片战争》所揭橥的历史精神既是像谢晋那样的当代中国电影艺术家现实主义艺术光辉的一次写照，也是对鸦片战争历史的一次深刻的反思，一次民族正义感、民族道义感的“艺术发言”。细细品味这部影片，我们不难察觉，经过了40年，当代中国的电影艺术家实际上已经摆脱了那种忧国忧民的主战派加上群众性的抗英斗争来表现鸦片战争的模式，而是以现代的历史理念重新诠释150多年前的这场民族悲剧，这就更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本质，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精神。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鸦片战争》成功地重现了历史。

这正是影视史学的理论建构，也是它的理想追求。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历史与非历史、真实的历史与诗、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可以融汇涵化而变得亲和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与虚构、想象之间已毫无区别。不过，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的完美结合，却始终是影视史学家们的不懈的努力目标，在那里，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①见 Hayden whit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 5 (December 1988), P. 1193-1199.

②周梁楷译文首见台湾《当代》月刊1993年第88期。

③载《学习与探索》1996年第6期。又，笔者在近几年的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有意让稚嫩的影视史学“登堂入室”，“登”史学理论研究的殿堂，“入”高等学府的教室。最近刚出版的《西方史学史》（张广智主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特意为它留有篇幅，其用意亦在于此也。

④见①。

⑤周梁楷：《影视史学与历史思维》，台湾《当代》月刊，1996年第118期。

⑥见李桂海：《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

⑦见王和、周舵：《试论历史规律》，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⑧载《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2页。

⑨见张耕华：《试论历史的“重演”与历史学的“预言”》，载《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1期。又，本文此处所述论及其对前一种意见的诸家之说，多得益于张耕华之论见，特此说明，以致谢忱。

⑩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46页。

⑪吴晗：《谈历史剧》，载《文汇报》1960年12月25日。

⑫同上引。

⑬材料载《上海译报》1990年7月30日。

⑭同注①引。

⑮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沉浮与觉醒——从鸦片战争到〈鸦片战争〉》（上卷），第12页。

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

⑰见余英时：《论士衡史》，傅杰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29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阮元与清代经学

□ 章权才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广东 广州 510610)

[摘 要] 文章不赞成对阮元的经学持否定态度。主张把阮元的经学放在明清之际学术流变中去考察; 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客观现实中去认识; 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去理解。认为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 承袭了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 实事求是地把清代经学推向新境界, 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

[关键词] 经学 乾嘉学派 考据 经世 致用 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7326 (2000) 08- 0091- 04

在中国思想史、经学史上, 阮元是有争议的人物。有些学者肯定他, 但许多学者和学术著作则持否定态度。有些学者认为他的经学有丰富的哲学思想; 有些学者则说他的经学是一种没有哲学思想的纯学术。梁启超对阮元的评价有着自己的角度, 他把阮元视为乾嘉学术的“护法神”, 这可见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侯外庐的看法是这样的: “阮元对于古代思想的分析, ……仍然袭用了汉学家的传统。因为他由考据方法得出的结论, 虽然有力地反击了宋儒, 然而却不能成为思想史的科学研究。他是封建社会的大臣, 不可能有像颜元、汪中的锋芒, 更不可能有戴震、章学诚的激昂。他的论断也就在很多地方显出他的客观主义的态度。同时, 他在汉学已经衰微的时候, 开设了学舍、学堂, 提倡为汉学而研究汉学, 还想做汉学家的回光反照运动, 这又是封建贵族阶级的保守性的表现。”(《中国思想通

史》)

侯外庐的见解在许多方面是深刻的, 他对阮元学术思想保守性的披露也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不同意对阮元的学术取全盘否定或基本否定的态度。我认为, 阮元的学术理论和实践, 许多方面值得肯定。我们主张把阮元的学术, 放在明清之际和清代前期学术流变中去考察; 放在嘉道时期社会矛盾、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去认识; 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去理解。

阮元是位封疆大吏。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 阮元会试中式, 成为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由翰林直南书房, 做到山东、浙江学政。嘉、道年间, 历官兵部、礼部、工部、户部侍郎和会试总裁, 后来又做过浙江、江西、河南等省巡抚, 湖广、两广和云贵总督。在清代学者中, 像他那样少年早达、历居政要的人物, 并不多见。惟其如此, 他在政治

上的锋芒往往掩盖住了他在学术上的光芒。

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阮元确实是一位著作等身的经学家。他的主要著述有:《论语论仁论》一卷;《孟子论仁论》一卷;《诗书古训》六卷;《曾子注释》四卷;《考工记车制图解》二卷;《仪礼石经校勘记》四卷;《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四十三卷;《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十卷;《华山碑考》四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畴人传》四十六卷;《广陵诗事》十卷;《石渠随笔》八卷;《小沧浪笔谈》四卷;《经室集》五十八卷。他辑录的著作有《经籍纂诂》一百六卷;《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西浙金石志》十八卷;《淮海英灵集》二十四卷。他编刻的著作有:《十三经注疏》四百一十六卷;《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诂经精舍文集》十四卷;《学海堂初集》十六卷。

阮元有个弟弟叫阮亨,阮亨有个著述叫《瀛舟笔谈》,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予兄早岁能文章,尤研经义。尝手校《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岁,撰《车制图解》,辨正车耳反出轨前十尺等事,为江永、戴震等所未及发。此外如《封禅》、《明堂》、《一贯》、《南江》、《乐奏》《皇父》、《释且》诸篇,皆独契往古,发前人所未发。至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畴人传》、《金石志》等书,篇帙浩繁,皆自起凡例,择友人弟子分任之,而亲加朱墨,改订甚多。自言入翰林后,即直内迁。编定书画,校训勘石经。旋督学管部,领封疆,无暇潜研。故入官以后,编纂之书较多,而沈精覃思,独发古谊之作甚少,不能似经生时之专力矣。然所作《曾子十篇注释》,则时时自随,凡三易稿。此中发明孔曾博学、难易、忠恕等事,与《孝经》、《中庸》相表里。而训‘一贯’之贯为行为,尤为古人所未发。……又言近人考证经史小学之疏则愈精,发明圣贤言行之书甚少。否则专以攻驳程朱为事。于颜曾纯笃之学,未之深究。兹注释五卷,不敢存昔人门户之见,而实以济近时流派之偏也。”这段话,简单明要地介绍了阮元一生的撰述过程、学术

成就,也把阮元治学的总方向和价值取向和盘托出。

阮元属乾嘉学派。侯外庐说:“从学术内容和写作年代上说,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的。”(《中国思想通史》)钱穆也说:“芸台(即阮元)犹及乾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他是汉学思潮的“总结”也罢,说他是清代经学最后一“重镇”也罢,总之,认定阮元属乾嘉学派,这似乎是众多学者近乎一致的看法。

对乾嘉学派产生的原因、基本特征以及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学术界存有歧说。许多论著对乾嘉学派的治学持否定态度,认为它脱离政治,没有思想内容,为考据而考据。但也有些学者不同意这种评价,他们认为,乾嘉学派也有好的方面,好的业绩,不能全盘否定。

我们主张对乾嘉学派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有几个观点值得固守:第一,乾嘉学派的产生有个历史大背景,它牵涉到明朝中后期心学的流行和明末清初学术界经世致用思潮的泛起。第二,乾嘉学派在其发端的时候,它的治学宗旨是紧密联系政治、积极从事反空疏之学斗争的。溯其源,顾炎武是乾嘉学派的老祖宗。顾炎武反对心学,展开了两条战线:一条是政治上的经世致用战线;一条是学术上的考据战线。他治古音,是为了明经义,而明经义是为“治国平天下”。第三,顾炎武后,下迄乾嘉,这个学派反空疏之学的斗争,同样是在上述两条战线展开,而两条战线都存在着“源”和“流”的问题。第四,乾嘉考据学派的主流,以吴派的惠栋、皖派的戴震为代表,他们的经学各具特色,都不同程度地内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反映了对清初反空疏之学的继承和深化。第五,乾嘉学派内部也有支流,为考据而考据就是支流,但支流毕竟是支流而不能代替主流。我强调以上几点,无非是要说明:在明末清初、在乾嘉时期,注重文学音韵,通过文字音韵以达义理,也是当时反空疏之学

和倡经世致用之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问题在于阮元在乾嘉学派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简单的回答是：阮元继承了由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的传统，承袭了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派的主流学说，并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发展到新的境界。

在明清之际和清代前期批判空疏之学的斗争中，阮元的旗帜是鲜明的，他对王阳明心学的批判是有力的。他时常指责王阳明的良知说，认为这种良知说以庄子为祖，跟佛家的禅学没有两样，这可见他的文章《复性辨》。（《经室集续集》卷三）在另一篇文章《释达》中，他强调实践，主张事功，在解释“达”字时，他作了这样的发挥：“达也者，士大夫智类通明，所行事功及于家国之谓也。”（《经室集》卷一）他是一位高官，又是一位大学者，两相法合，似乎就是他所谓“达”的最好注释。

阮元把自己的训诂学说成是“实事求是”之学。《经室集自序》说：“余幼学以经为近。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这里讲“幼学”，从阶段上讲是指他涉入学术生涯的初期。阮元早年钻研考据，少年时期已精通历法。24岁写出了《考工记车制图解》一书。又考定《诗经·十月之交》以下四篇，毛《传》属之幽王为是；郑《笺》属之厉王为非。《明堂论》、《辟雍论》、《封泰山论》等等，都是在“推明古训、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写成的。我们不必把阮元所说的“实事求是”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实事求是”看成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我们可以肯定，阮元所说的“实事求是”是在做学问中一种较为进步的认识路线，这个路线尊重存在，尊重历史，尊重比较。在这个认识路线指引下，他的考据学毕竟取得较之前人更为辉煌的成绩。皮锡瑞《经学通论》中的《三礼通论》有个条目叫“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以阮元之言为定论”，内云：“古礼有聚讼千年，至今日而始明者，明堂、辟雍、封禅是也。……刘歆讥汉儒若立辟雍、封禅、巡守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今得阮氏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读之思之，可见皮锡瑞言之不

妄。

值得注意的是，阮元的考据是多方面的，他既重视史料考订，又重视实物的收集和研究。他对古代钟鼎彝器的形制和文字十分重视，认为钟鼎铭词，当与众多经书并重。他同样重视石刻，在搜集、传录、整理、考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写过一篇文章叫《金石十事记》，文章自认在金石考古方面为学术界做了十件大事：“余收山左金石数千种，勒为《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收两浙金石千余种，勒为《两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集吉金拓本五百余种，勒为《集古斋钟鼎款识》，事之三也。扬州周散氏南宫大盘，东南重宝也。岁丁卯，嵯使者献于朝。余模铸二盘，极肖之，一藏府学，一藏文选楼，事之四也。天一阁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为二，一置杭州府学明伦堂，一置扬州府学明伦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扬州甘泉山，得西汉中殿第二十八石于厉王冢，天下西汉石，止此与曲阜五凤石，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书佐至诸城琅邪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汉府门之倅，大石人二，仆于野，为樵牧所残，余连车运至曲阜夔相圃中，并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金拓延熹华山庙碑，摹刻之，置于北湖祠垫，事之九也。余又摹刻泰山残篆、吴天发神讖二碑，同置北湖祠垫，事之十也。”（《经室集》）这样大规模仿铸、摹刻文物，一要靠认识，二要靠学识，三要靠财力和政治影响力。在阮元那里，各种条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做成了对后世学术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这无疑值得称颂和肯定。

清代经学发展到嘉道之际，面临着重大转折。清朝初年，特别是康熙主政时期，朝廷一再强调扶持“正学”，所谓“正学”，主心骨就是宋代发皇的程朱理学。但是乾嘉以后，“汉学”出尽风头，时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宋学中的许多方面受到讨伐。平心而论，“汉学”的确有其可是之处，他们的治学方法和对古籍的整理，许多方面值得肯定。但存在问题也很明显。汉学的支流问题更多。他们把

学术研究导向厚古薄今、脱离实际的狭窄局促之途，使许多热血者大失所望。道咸承接乾嘉，昔日的“太平盛世”已成明日黄花。社会危机全面爆发，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统治阶级穷奢极欲，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整个社会在寻找出路，各种学派和学术思想毫无例外地都要经受检验。昔日的乾嘉汉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于是便有一批人站出来声讨“汉学”。声讨“汉学”，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批判汉学家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一是批判汉学家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提倡经世致用。上面引用阮元关于“不敢存昔人门户之见，而实以济近时流派之偏”的说法，旨在说明阮元是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的。刘师培写过一篇文章，叫《扬州前哲画像记》，内云：“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殫其业。或缘词生训，歧惑学者。惟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左盦外集》）“焦”指焦循；“阮”指阮元。焦循和阮元，几乎同时出道，均属乾嘉学派中的扬州学派。刘师培稍后，但从派系源流上说，也属扬州学派。扬州学派治学特色在于“通”，有别于吴派在于“专”，皖派在于“精”。不主门户之见就是“通”。举个例子，阮元有个撰述，叫《性命古训》，他从西周“性”字始义讲起，继述周秦诸子的人性论，最后揭发晋唐宋明的人性论，这就是“通”，这就是超越派别之见的“通”。这个“通”，启发和带出了一批学者，广东的学者陈澧是阮元在广东学海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是受其影响最深的一位。陈澧有个撰述叫《汉儒通义》，便是遵循阮元《性命古训》的遗例而编述的。事实表明，

在学术上的不同门户中实施沟通，求同存异，对发展清代学术，无疑是重要的一着。

阮元既是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又是一位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十分关注的学者。阮元精于算学，钱塘诸可宝在《畴人传三编》卷三中是这样说的：“自勿庵兴，而算学之术显；东原起，而算学之道尊；仪征太傅出，而算学之源流传习，始得专书。昔河间纪文达公淹通经籍，人疑其不自著书，则但曰：‘毕生诣力，备见于《四库书目提要》已。’吾谓仪征公于算学亦然。非必他有纂述而后成一家言也。言不朽之盛业，孰有大于《畴人传》者乎？又岂屑屑焉与曲艺自矜者校尺寸之宪率，絜短长于迹象乎？然仪征之有功艺苑，与河间将毋同！”这里所说“仪征公”，即指阮元。阮元重视算学，早年与李锐商榷义例，纂《畴人传》，甄录自来算家从远古以至清初，旁及西洋，凡二百八十人，书长达四十六卷。自阮元《畴人传》出，我国始有系统记载天文算法方法方面的科技人物和创造发明的专著。道光四年，即公元1824年，阮元在两广总督任上，创建学海堂于越秀山。学海堂教学宗旨，一方面大力倡导训诂、音韵、文字；另一方面又设立天文、数学、地理、历法等各种学科。这又是阮元重视自然科学的表现。阮元重视自然科学，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儒学有着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传统；在于明清之际西学的大规模东渐；在于当时学术界存在反对空疏之学的思潮。这种学术理论与实践，是顺时代潮流而动，因而是进步的、值得肯定的。

责任编辑：郭秀文

冯煊光和江南制造局

□ 贾熟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北京 100006)

[摘要] 本文记述了被人称在军事工业方面“类能苦心探索, 引伸触类, 拓取法之门径, 守核实之常经”, 主持江南制造总局达 10 年之久的军工名家冯煊光的一生经历尤其是他的军工生涯。

[关键词] 冯煊光 曾国藩 李鸿章 军事工业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8-0095-06

冯煊光(1830—1878年),字竹如,亦写作竹儒,或卓如、竹渔。广东省南海县捕属人。其父冯玉衡,字尹平,道光二十一年英军进攻广州时,被将军奕山招入营,以督守功,赏蓝翎。又捐建虎门炮台,以知州用。咸丰元年,在广西镇压太平军起义有功,赏花翎。冯玉衡之族弟冯伯衡募勇至梧州,不得过,勇丁间或劫掠市肆。冯玉衡正在北京,其仆有挟怨者,告冯伯衡反逆而冯玉衡知情,下刑部狱。①冯煊光咸丰三年中举,会试留京师,及遭父难,乃发愤为经世学,详究中外地理、算学、制造之法,性情一变为沈毅豪壮。②咸丰八年二月③定案,冯伯衡流放湖南,仆发黑龙江,冯玉衡戍伊犁。④冯煊光随父至乌鲁木齐,其父责备他年壮未婚,再三遣还,冯煊光乃返回,拟至京参加会试,榜发后即行完娶。后冯煊光写信给曾望颜(陕西巡抚、广东香山人,与其祖辈有同门之谊),称不乐复事举业,生平仰如山斗者,没有超过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欲于成婚后就近往曾国藩幕府学习军务,并言此行止求学习,凡图保举、谋富贵诸事,自誓不敢沾染,即带勇、劝捐、催饷、押解等差,亦未敢卤莽从事。但愿托居弟子,俾于水陆形胜、战守机宜随时讲究,以裕将来之用。请曾望颜写信介绍。曾望颜于九年六月初九日写信给胡林翼,请胡林翼替他写信给曾

国藩作介绍。⑤

十一月三十日,冯煊光已在宿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广东举人冯竹渔煊光来此畅谈,本请其来,写书启之幕友也。”⑥十二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在复李元度的信中又写道:“顷请程尚斋司马代办公牒,又有冯孝兼司书记,均尚妥叶。”⑦

十年二月十九日,冯煊光告假返回广东南海。四月十七日,又回到曾国藩大营。他对洋炮的威力颇有了解,九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夜,冯竹儒来,畅谈夷务,言夷人炸炮最有准,断不可以守营云云。”⑧十一月,他被曾国藩派往广东购买洋炮。

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在复江西吉南赣宁道员、主持江西牙厘局之李瀚章的信中写道:“冯竹渔精细耐劳,可敬可佩!敝处两次未回信,渠若有所请求,乞阁下一一应付,无令吃亏。”⑨九月初五日,又写信给李瀚章之弟李鸿章,称:“冯竹渔精细耐劳,如此苦心经营,天下有何不可办之事!敝处未复竹渔书。昨致小泉(案:即李瀚章)信,托其照料,凡竹渔有求,一力护持之。祈阁下再致意令兄为祷。”⑩十一月初二日,曾国藩复信给冯煊光,称“知各项炮位办有头绪,海滨跋涉,劳勤良

多。惟冀眠食俱安，随时保练，至以为系。三帮运解，处置甚妥。应行各事，弟亦不能遥制于千里之外，斟酌尽善，乃可无弊。近接李小泉信，头帮现在过山，尚未到赣，二、三帮想亦次第起程矣。”^⑪十二月二十一日，冯燠光所购望远镜已经到了曾国藩手里，他在日记中写道：“冯竹渔自广东购寄千里镜二具，在楼上试验，果为精绝，看半里许之人物如在户庭咫尺之间。其铜、铁、树木等，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曜夺目。”^⑫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又在复李瀚章的信中写道：“十七日委员来营，解到竹渔头帮炮位。……二、三帮尚未起程，颇费周折。渠因隔省，州、县呼应不灵，稟请筹备解费，由尊处就近拨付。已囑将用数酌定，具函奉达，望即照数解粤，以便起运。此次吃亏之后，将来当由上海买炮，不再赴粤也。”^⑬与洋炮、望远镜一起由冯燠光派人解送给曾国藩的，还有洋枪、书籍及各珍物。^⑭书籍包括由潘仕成辑刻的《海山仙馆丛书》，共56种，由吴崇曜辑刻的《粤雅堂丛书》，共121种。^⑮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初一日，曾国藩复信给冯燠光，说运解洋枪、洋炮，不谓波折之多一至于此，隔省办事，呼应不灵，以两广总督劳崇光之札，尚难行诸各属，曾国藩之劝谕更难见效。此次吃亏之后，将来当由上海买炮，不再赴粤。望阁下赶紧督催，迅速来皖。^⑯初四日，又写信说运炮自备经费，出于万不得已。若在4000两以内，自可勉力筹解，若太多，则似可不必。闻上海炮价颇贱，由轮船运至安庆，不过3日可到。望速归，商办一切。^⑰

闰八月，冯燠光返回曾国藩大营。^⑱该月之二十九日，曾国藩将冯燠光所购之炸弹、炸炮送往南京，帮助曾国荃攻城，亲至安庆城外试放，炸炮放出炸弹，果然能落地炸裂，火光大燃。^⑲

九月，冯燠光接到家信，知道其父冯玉衡已于同年春在伊犁戍所病故。^⑳九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至冯燠光寓所吊丧。冯燠光无资可挟以奔丧，万里迎接眷属，哀痛迥异寻常。^㉑冯燠光决定赴新疆奔丧迎眷之后，曾国藩于十月十二日写信给陕甘总督

熙麟，^㉒十月十四日，又写信给已率淮军开至上海并出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希望他们对冯燠光“照拂一切”^㉓“代谋万全”。^㉔冯燠光“南出虎门，泛海北至天津，西出归化城，绕草地，历外蒙古至古城子，值回部之乱，不得前，痛哭而返。”^㉕

冯燠光航海南旋，到了苏州，再回到上海。僧格林沁在山东被捻军击毙，清政府命曾国藩北上督师，镇压捻军，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李鸿章派冯燠光会办铁厂（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事宜。冯燠光写信给曾国藩，祝贺他“克复江宁，督师山左”，报告丁日昌购外国铁厂一座，机器极为美备。同治四年闰五月初三日，曾国藩在复冯燠光的信中写道：铁厂“此举若得蒧工，轮船之利，固可水栗蛟螭，枪炮之精，尤可陆誓犀象。振刷国耻，恢廓远漠，将在于斯。阁下精思造微，果力洞的，当无不成之事也。”曾国藩“此行如久驻徐州，阁下俟铁厂章程议定后，或能拨冗北来，把晤彭城，畅叙素韦华北征之苦，兼论时局剥复之机，悲愉交集，当非旬日所能罄也。”^㉖八月初一日，李鸿章上《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奏称购得上海虹口外国机器铁厂一座，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等，并将丁日昌、韩殿甲旧有两炸弹局归并，改称江南制造总局，一切事宜，责成上海海关道丁日昌督察筹画，会同总兵韩殿甲及素习算造之分发补用同知冯燠光，候选知县王德均，熟谙洋军火之候选直隶州知州沈保靖一同到局总理。^㉗八月初十日，江南制造总局奉准成立。^㉘冯燠光正式开始了他的军工生涯。

同治六年，江南制造总局（今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已经准备制造军舰。十一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写信给丁日昌，称其所言12条，俱为自强要策，“就中创建轮船三阆水师，将来必责成敝处办理。仆于轮船一事，屡次函催牒促，究不知何时始有成舟口拨？轮船造法，望阁下即商之应（宝时）、沈（保靖）、冯（燠光）诸君，迅速赶办，既有厂匠，又有经费，何惮而不动手为之？吾辈即以此事为最初之功课，可乎？”^㉙曾国藩对冯燠光的工作相当满意，

七年三月十五日,他在复丁日昌的信中写道:“上海铁厂,沈、冯二员承办甚有条理,既经阁下训饬,中外匠目亦皆欢欣鼓舞,自应乘机利导,渐图扩充。今年奏留二成洋税项下除已拨解津五万外,不再拨作他用,全供铁厂之需,较之闽厂经费,当已及十之四五矣。”^⑩九月初二日,曾国藩上《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对江南制造总局几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奏称开局之初,军事孔急,李鸿章饬令先造枪、炮两项,以应急需。制造枪、炮,必先有制枪、制炮之机器,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外国机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 30 余座,即用这些机器铸炮炉,高 3 丈,围逾 1 丈,以风轮煽炽火力,去渣存液,一气铸成。先铸实心,再用机器车、刮、旋、挖,使炮之外光如镜,内滑如脂。制造开花炮、田鸡炮等,配备炮车、炸弹、药引、木心等物,皆与外国所造者足相匹敌。制造洋枪,需用机器更多,如辗卷枪筒,车刮外光,钻挖内膛,旋造斜棱等,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枪成之后,亦与外国造者无异。机器日增,厂地狭窄,六年夏间,又在上海城南兴建新厂,购地 70 余亩,修造气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铸铜铁厂、火箭厂、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中外工匠居室。又因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外国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先后订请英国人伟烈亚力,美国人傅兰雅、玛高温等人,专择有益制造之书,详细翻出。已译成《气机发轫》、《气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4 种。制造轮船,以气炉、机器、船壳 3 项为大宗,此次创办之始,考究图说,自出机杼,七月初旬,第 1 号工竣,曾国藩命名为“恬吉”轮船,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其气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修整参用。船身長 18 丈 5 尺,阔 2 丈 7 尺 2 寸。先在吴淞口外试行,由铜沙直出大洋,至浙江舟山而旋。复于八月十三日驶至南京。曾国藩上船试行至采石矶,第 1 时上水行 70 余里,

下水行 120 余里,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曾国藩称原议拟造 4 号,今第 1 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 20 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囱,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各委员苦心经营,其劳勋亦不可没。该局员等殚精竭虑,创此宏观,实属卓有成效,请将尤为出力各员给予奖叙。^⑪据记载,“恬吉号”军舰为木壳船,392 马力,载重 600 吨,配炮 9 门。^⑫冯焄光因造成“恬吉号”军舰之功,由知府升为道员。^⑬

后来,冯焄光与丁日昌、沈保靖等人的矛盾激化,沈保靖一再向湖广总督李鸿章要求离开上海机器总局。同治八年四月初一日,李鸿章在复两江总督马新贻的信中写道:“上海机器局用款日多,冯竹如才气开展,以品莲(案:即沈保靖)综核精密剂之,较可放心。品莲自前年叠函求退,盖有难言之隐,曾经谆切慰留。兹又赴鄂,再四固辞,并力推在局帮办收支册报委员郑守藻如廉干精明,足胜会办之任,郑与冯同乡,多年至好,或能救弊补偏,相与有成,鄙意亦以留品莲为是,但其意若不可一朝居者,仍求执事衡夺饬遵。”^⑭四月初十日,他又在复曾国藩的信中写道:“上海机器局轮船又成一只,只载炮十余尊,虽似小兵船式,然断不及外洋兵船之坚利。局员沈(保靖)精核而冯(焄光)恢廓,志趣不合。顷沈品莲来鄂乞退,已属谷帅(案:马新贻字谷山)强留之而未可久也。鸿章相距渐远,未便越俎,终虑无所成就,仰负诤谏。”^⑮四月二十九日与五月二十一日,他又分别在复马新贻的信中提及此事。^⑯九年四月,李鸿章将率淮军开往陕西镇压回民起义,冯焄光到湖北送行,李鸿章与他商量上海机器局事务,冯焄光表示:在两江总督马新贻和江苏巡抚丁日昌之间,未便专请一人主政,转添痕迹。^⑰五月二十日,李鸿章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写道:“品莲数言竹儒私用较费,公事难尽核实,两贤相扼,几有不能并立之势,兄与谷帅非不强留,品莲偏执则不可一日居。过保定谒陈侯相(案:即

直隶总督曾国藩), 谓宜商请吾弟与谷翁推择一人主持局事, 侯相不自言之, 乃属鄙人谋之。两公定夺嫌疑之际, 遑敢越俎, 只作罢论, 高明当能默喻此意也。”“新造二号商船, 渠欲借以装漕、运货, 获利息以省费用, 不知能善其终否? ……即竹儒晤称, 亦欲赶办, 久久未得要领, 尚无进益。前见新闻纸载闽厂规模宏远, 将来成就必有可观, 迥非沪厂所及, 能无愧悚!”^{③⑧}五月二十四日, 在复曾国藩的信中又写道: “雨生(案: 即丁日昌) 函告: 卓儒局事颇欠综核, 已缄商谷山, 请推雨生就近主持, 鸿章西事蹙蹙万分, 不能远顾沪厂, 恐其成就终不逮闽省耳。”^{③⑨}沈保靖力辞江南制造局差使, 要求随李鸿章军营差遣, 李鸿章与马新贻、丁日昌函商, 暂令道员冯焄光, 知府郑藻如照旧接办江南制造局务。^{④⑩}

十年七月二十一日, 继任直隶总督之李鸿章写信给重任两江总督之曾国藩, 称: “郑藻如才长心细, 在沪局难期展布, 沈品莲屡以为言, 兹来信恳迫, 附呈台簪, 乞勿向冯生(案: 指冯焄光) 道及, 其局事经手既多且久, 似未便调开。”^{④⑪}八月十四日, 曾国藩在上海登岸, 视察江南制造局工料等事, 不久, 归船, 看冯焄光所造铁壳洋划子, 长不过4丈, 中舱机器露于外, 尾后暗轮藏于下, 试开行里余。^{④⑫}八月二十二日, 曾国藩在复李鸿章的信中写道: “郑玉轩太守、藻如在沪而诸多牵制, 此间亦有所闻, 皆称其抑郁已久, 抱病甚深。来示‘惟其局事经手既多且久, 未便遽行调开’, 此三语者, 不知指冯言之乎? 指郑言之乎? 仆早岁见冯志坚论笃, 自称愿终老机器局, 不精透则不干休, 嘉其有愚公移山之趣, 爱而敬之, 倚为柱石。厥后屡闻丁雨帅(案: 即丁日昌) 议其不办报销, 不造兵船, 不多用汉人, 而仆不甚介意。沪局洋人至宁告状, 言其贪蚀, 仆亦不甚介意。即品莲具言其短, 苏垣有友来书, 极言机器局为一大蠹, 亦尤不甚介意。至今年六、七月, 有人言沪局造船、造枪、炮, 皆迟缓而不中用, 轮舟行走太慢, 枪、炮成者太少。

目下每月支银四万余两而料少匠减, 势难造销, 将来数年之后, 欲靠沪局船、炮以御洋氛, 断不可恃云云。仆闻此言颇悚动。沪局于丙子即满十年, 若一无成就, 何以对天下? 今读来示抄品莲之件, 尤为诧异。以阁下之爱才念旧, 若非实不放心, 岂肯轻发微词? 请调玉轩至津, 细询该厂船炮将来能速、能多、能精否? 局中共事之人能不冰炭否? 此皆最要关键, 侵蚀犹属后事。便中密示, 以凭商办。”^{④⑬}九月二十一日, 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信中写道: “郑玉轩经手局事甚多, 前函故云未便调开。沪局料少匠减之言, 似未甚确。数年之后, 欲靠船炮以洁洋氛, 不独此局力所未逮, 即中国、日本各厂局, 皆未易言。洋人创制已百余年, 上下全力经营, 人才倍出, 乃获致此雄富, 中土初学, 又少精心独运之人, 以为开拓始基则庶几耳。冯生言过其实, 行不逮言, 又内怀疑忌, 难惬众望, 惟机器洋学, 似已入门。他人空谈, 尚所未及。求随时策厉而提撕之。郑守似不必调津, 钧驾至沪, 察其病情果剧, 或准假归省数月, 以慰其志。”^{④⑭}十月初八日, 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 他在日记中写道: “阅机器局, 周历一遍, 约步行二里许。第五号轮船将次造成, 长二十八丈, 高四丈许, 伟观也。”

山东巡抚丁宝桢欲制造轮船, 派恩县县令梅纘高赴上海询访制造轮船之法, 先到南京, 求曾国藩写信介绍。十月二十三日, 曾国藩写信给冯焄光说: “查造船一事, 鄙意本在设局倡率, 俾各处仿而行之, 渐推渐广, 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要之, 风气渐开, 即中国振兴之象也。梅君到时, 务望阁下详告之, 造船之法, 其货船之制若何, 兵船之制若何, 或具一说帖, 开示大小尺寸。每造一船, 价值若干, 需时若干, 并将机器、汽炉、船壳三事造法, 详细告之。”同时, 又有“密商者”, 称: “在沪曾囑勉亭赴厂先住一月, 俟相安然后会办, 渠已应允。回省数日, 与之再谈, 渠又徘徊不决, 似有诿谢之意。细叩其故, 渠言‘所以派人赴厂者, 似有查察之意, 无非欲息外间之浮议, 雪卓如之疑谤。而浮

议所由起,总由沪厂岁支数十万,腥膻之地,易启艳羨猜疑之论。今若不将历年帐目彻底算清,上而报明两院具奏,下而使司道及局员晓然周知,则不特目前之谤难弭,并将为卓如终身之累。或阅数年,十余年尚有弹劾之章,亦未可知。今赴厂闲住一月,或在彼会办半载,曾不足分卓如之忧,于公事亦毫无裨补’云云。仆因告之曰:‘君言及此层,正所以扶助卓如,即所以大益公事也。报销早奏,亦并为敝处预除后患也。君到局后,力催卓如清理帐目,分列条款,如曰造船、曰造枪炮、曰办机器、曰购木料、铁、炭、曰买地造屋、曰养委员、工匠、学生等事,每册分数款,每年立一册,赶紧造成详奏,则卓如可息前谤,可绝后患,而鄙人亦无公事颀颀之讥矣。如有亏空,仆愿代办担承,总以早清为是。’仆与勉亭所议如此,特以奉告。如勉亭果能赴厂,请阁下迅办销册,即以勉亭为监算交代之员可也。至嘱!至嘱!”^{④5}十一月十七日,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信中写道:“勉林果赴沪局,催令卓如赶办报销,稍释群疑。”^{④6}十二月十一日,因管理天津机器局之沈保靖病重,李鸿章写信给曾国藩,请调郑藻如至天津暂代,认为李兴锐到了上海机器制造局,或可分任一二。^{④7}冯燠光写信给李鸿章,极为恳切地请留郑藻如。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信中写道:“沪局不可无玉轩,鸿章言之屡矣,前因品莲病剧,不得已,徇陈、沈、孙诸君之请,商令暂代。正初,子敬来省,询知品莲近状渐瘥,冀可缓至。鸿章抵津后,再商替人,郑守愿否,姑听其便。卓如于此事探讨已久,惟务外而不甚精于内,局务主持七年,尚一日离郑不得,其情可知。徐寿外才虽欠,深入精通,高出流辈,卓如肯表而出之否?盖局员无不畏其疑逼也。”当时,宋晋正奏请停止制造轮船,于是,李鸿章又写道:“兴造轮船、兵船,实自强之一策,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是以鸿章于同治四五年创议铁厂时,左公已先议造船,鄙意未敢附和,但主仿造枪、炮、军火,谓可自我发

而收之也,即不备于水,而尚有备于陆也。……雪翁此奏,亦采中外众论而出之也。……师门本创议造船之人,自须力持定见。……租赁轮船一节,自是经久推广至计。”^{④8}该年二月初三日,李兴锐至上海机器制造局,担任会办。六月十五日,他却在日记中写道:“至三十,住局无事。看书。局中事不常过问,远嫌而全交也。”^{④9}

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上《沪津机局调员片》,对冯燠光等大加赞扬,奏称:“沪、津机器各局,仿制轮船、枪、炮、军火,事体繁重,理大物博,非有精心果力,志趣深远者,实难相与有成。沪局现有江苏补用道冯燠光,选用知府郑藻如,津局现有候补道沈保靖,筹办一切,苦心经营,数载于兹,驾驭中外员匠,操纵咸宜,综核工料巨款,丝毫不苟,监制船械,日起有功。”^{⑤0}不久,李鸿章筹办轮船招商局,冯燠光开始很支持,后来又与上海道沈秉成联名递禀,认为开办轮船招商局有窒碍多端,使李鸿章颇不满意。

十二年,国际形势紧张,日本军队跃跃欲试。关于江南制造局的经营情况,李鸿章于六月初一日复新任两江总督李宗羲的信中写道:“沪上机器局,诚如尊论,事太多则难精,卓儒尤有贪多嚼不烂之病,铁甲船需费最巨,不知何时能成?即成,能否比照西洋之小者、粗者?大炮则熟铁,来福炮尚未多造,遑论钢炮?前以轮船用自造铜炮,太坏,飭令多购布国克虏卜后门钢炮以应急需,非得已也。然炮虽购而其合用之子药尚不能仿制,昨已切属玉轩等赶图之。水雷系江河防险秘器,其必需之磺强水、电线,亦不能造,即此三事,度局之力,一时断不易成、不易精也。该局现可用者,兵枪、林明敦后门枪、小铜炮三事,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兼致力于铁甲船、熟铁炮、水雷,穷年积岁,取精用宏,庶有多乎?”^{⑤1}

十三年,日本借口台湾杀死琉球船民事,出兵台湾。冯燠光与沈秉成拟“销兵刍言”,主张利与人共,权须我操,李鸿章、沈葆楨等颇韪是策。冯燠

光从上海到天津,又给李鸿章带了美国驻上海领事的条陈,德国驻上海领事的禀帖,告诉李鸿章,说英、美实暗助日本,希望他日得地分肥,惟德国甚嫉之,而不与其党。李鸿章函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他们引德以阴持各国。^{⑤2}冯燠光等还仿造水炮台船一只,估计明年春天可成。^{⑤3}该年冬,冯燠光任上海道道员。^{⑤4}不久之后,又加二品顶戴。

他在担任上海道道员期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将遣使外国,命各关道议其事,他议复8条,认为使臣必有品望,乃不为外国所轻,当审知外国虚实,消患于未萌,若中国轮船能往外洋,则彼不能夺我利,必有军舰保护,使臣可以行止自由。此外,还议台湾采煤、开矿,驳外国租中国地界,皆谋虑精审。在上海设书院,分经学、史学、算学、舆地之学、掌故之学、词章之学。刊译外国书数十种。光绪二年,清军克玛纳斯,他请假迎父柩,遇于安西,至江苏龙江关,疾甚,趋上海,甫至而死,时为光绪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终年49岁。^{⑤5}

冯燠光主持江南制造总局达10年之久,先后生产军舰“惠吉号”、“操江号”、“测海号”、“威靖号”、“海安号”5只。英、法、美兵枪、马枪数种。田鸡炮多尊。火药、弹子等等,也设分厂制造。被人称在军事工业方面,“类能苦心探索,引伸触类,拓取法之门径,守核实之常经。”^{⑤6}综观冯燠光的一生经历,确实堪称中国近代军工名家。

①④郑棻:《南海县志》(宣统),卷十六,第2、2页。

②⑤③⑥⑤《南海县志》(宣统),卷十七,第5、5、5、5页。

③⑧⑩⑪⑬⑭《曾国藩全集·书信》.5,第3228、3228、3228、3228、3233页。

⑤杜春和等:《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第381

页。

⑥⑧⑫《曾国藩全集·日记》.1。

⑦《曾国藩全集·书信》.2,第1186页。

⑨⑩⑪⑬《曾国藩全集·书信》.3,第2223、2230、2281、2403页。

⑭⑯⑰《曾国藩全集·书信》.4,第2472、2472、2474页。

⑮《曾国藩全集·日记》.2,第738页。

⑱⑲《曾国藩全集·日记》.2。

⑳《清史稿》,第25册,第7400页。

㉑《曾国藩全集·书信》.7,第5074页。

㉒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九,第31页。

㉓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166页。

㉔㉕《曾国藩全集·书信》.9,第6490、6567页。

㉖《曾国藩全集·奏稿》.10,第6091页。

㉗夏东元:《洋务运动史》,第82页。

㉘㉙㉚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九,第8、9、13-14页。

㉛㉜《朋僚函稿》,卷十,第2、6页。

㉝《丰顺文史》,第2辑,第59页。

㉞《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七,第17页。

㉟㊱㊲㊳《朋僚函稿》,卷十一,第12、23、30、31页。

㊴《曾国藩全集·日记》.3。

㊵㊶《曾国藩全集·书信》.10,第7530、7563页。

㊷《朋僚函稿》,卷十二,第3页。

㊸廖一中等整理:《李兴锐日记》。

㊹《李文忠公奏稿》,卷十九,第51页。

㊺《朋僚函稿》,卷十三,第11页。

㊻李鸿章:《译署函稿》,卷二,第45页。

㊼《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四,第27页。

㊽《朋僚函稿》,卷十四,第38页。

㊾《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六,第13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严复晚年思想的变化及其归宿

□ 甄建均

(东莞理工学院社科部, 广东 东莞 511700)

[摘要] 本文从严复思想变化的内在理路入手, 论述其晚年思想的归宿, 试图从其思想内在矛盾的悲剧性冲突中, 去把握近现代以来, 两极相通的两大思想派别——新文化运动和新儒家思想——所寻求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严复 晚年思想 西学 中学

[中图分类号] B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8-0101-04

早期的严复(戊戌变法前)曾以西学为鉴照对造成近代中国愚贫弱的大原——中国数千年“政教之不中”^①进行了激烈地批判,其批判的立意可归结为要救国救亡、求富求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这学习不是像洋务派所主张的那样仅仿效西方练兵、筹饷、购船等徒袭皮毛之举,而是主张传统文化由“用”到“体”的向近现代的转轨。将严复这个时期“非讲西学不可”^②、“非西洋莫与师”^③的决绝态度归结为“全盘西化”是不为过的,只是这“全盘西化”的决绝主张并不像后人囿于浅识而担心的要“化”掉中国或贬损民族文化。恰恰相反,在严复“非讲西学不可”、“非西洋莫与师”的决论中,体现的是“岁月悠悠,四邻眈眈”、“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④的深切忧患,发出的是,将当下的救国救亡、求富求强寄望于民品、民智更新的启蒙呐喊,烘托的是为数千年儒学教化陶钧锤成的一颗中国心。

中期的严复(戊戌变法后到辛亥革命前)摒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在翻译西书时,严复为中西政制、学术、教化的殊异相去一再激动,为中国人千古所处的可悲、不自由从而在今天备受欺凌的状况忧心如焚、扼腕叹息。但他深信中国亦有中国的长处,其根源甚厚甚大,天然爱统一,孔教不设鬼神,不谈格致,专明人事,平实易行,以及为儒教垂训陶养出的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使人道无至于

遂绝的担道义的精神(就正面价值而言)。这个时期,严复的思想走向深沉,这是其戊戌前思想的继续。这表现在他对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科学的翻译、介绍以“开民智”和悉心探求,以及对“中体西用”论的彻底批判,对中西学关系“阔视远想”,^⑤不囿于“中西新旧之名”,“但有邪正真妄之分耳”^⑥的“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的把握上。

晚年的严复(辛亥前后到临终)其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由对中学的激烈批判转向对中学的执着持守,由“力主西学”、“非西洋莫与师”转归先王教化之泽。这其间曾有过多少希望和失望、多少忧患和焦虑、多少愤悱和太息、又有过多少惶恐和抑郁!晚年严复思想的变化过程,对今人谋求民族文化的现代化,有着远不得以“反动”名的深刻启迪。

严复晚年思想的明显变化表现在辛亥前后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但其思想重心的开始转移,却是可追溯到1905年他再度访欧归来时。

1905年,严复再度赴欧洲,这时他敏锐地看到西方文明发展中异化现象的种种表现。这是他当年留学英国时还不曾看到,而为西方许多近现代思想家早就在关注的问题。这异化现象为他曾一力引进的西学、为他“非西洋莫与师”以求富求强的希冀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作为西方诚富诚强的最直接原因的科学技术,其迅猛发展与道德风俗的几无进步形成强烈反差。严复这样描述科学与道德二者发展的巨大差距,“故西国今日,凡所以为器者,其进于古昔,几于绝景而驰,虽古之圣人,殆未梦见。独至于道,至于德育,凡所以为教化风俗者,其进于古者几何,虽彼中夸诞之夫,不敢以是自许也。”^⑦

西方科技的发展及其成果,宛如一柄双刃的利剑,它能造福于人类。其异化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存。“惟器之精,不独利为善者也,而为恶者尤利用之。浅而譬之,如古之造谣行诈,其果效所及,不过一隅,乃自今有报章,自有邮政,自有电报诸器,不崇朝而以遍全球可也,其力量为何如乎?由此推之,如火器之用以杀人,催眠之用以作奸,何一不为凶人之利器?”^⑧

作为对这种异化现象的抗议,作为对富强之效凭藉的工具可能为恶发展的担忧,严复的思想重心开始转向制约并改变这种异化现象的人心的关切,转向对去恶求善的道德的寄望。“今夫社会之所以为社会,正恃有天理耳,正恃有人伦耳!天理亡,人伦堕,则社会将散,散则他族得以压力御之,虽有健者,不能自脱也。此非其极可虑者乎?且吾国之处今之日,有尤可危者。”^⑨

基于在这种“极可虑”的前景下,本已处于劫掠势头下的中国“尤可危者”的忧患,严复开始由求富求强、力主西学转向对存天理、定人伦、以道德形而上为特征的儒教的寄望,这是浸濡他心灵、溶于他血脉、为他激烈批判过,然而又终其生诚信、笃行、持守的儒家成德之教。戊戌前,严复为寻求民族的强富而激烈批判传统旧学的陈痼时,曾不无偏至地将传统文化中具有审美价值的诗词、字画、碑刻等统统归诸“无用”,也将具有伦理价值的儒家心性之学统统归诸“无实”,从而对儒教的德性价值有所轻忽。眼下的严复,在西方文化危机险象环生的背景下,则更多地认同儒教的本真,这使他的思致又趋向另一种偏至。在他看来,这圣人之教“往

自尧舜禹汤文武立之民极,至孔子而集其大成,而天理人伦,以其以垂训者为无以易,汉之诸儒,守阙抱残,辛苦仅立,绵绵延延,至于有宋,而道学兴。虽其中不敢谓于宇宙真理,不无离合,然其所传,大抵皆本数千年之阅历而立之分例。为国家者,与之同道,则治而昌,与之背驰,则乱而亡……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从早先声言“中国政教从来就是少是多非”到“孔孟所言无一可背”,^⑩严复思想重心的转移是明显的,亦是惊人的。但是,如果联系严复早期对旧学批判时,对周孔之教爱恨交织的持守,联系他对道德修持的一贯态度,或进一步考虑到,导人于道德之“觉”、开拓人的德性境界的孔孟之道自有它在“时穷”时更可显现的至可珍视的价值,这种变化亦可看作为合乎他本来思想的理致的。

此时的严复,并未放弃西学,未放弃“非西洋莫与师”的努力,他对民主制依然神往,但一向认为那是待民之力智德发展到极高时才可享有的理想之郅治。眼下的中国应以君主立宪制为过渡的桥梁。在1906年的《宪法大义》中,对于立宪,他是这样解释的:“其所谓立宪者,乃自其深者、精者、特别者而言之,乃将采欧美文明诸邦所现行立国之法制,以为吾政界之改良。故今日立宪云者,无异云以英、法、德、意之政体,变中国之政体。”^⑪他强调“然而此数国之政体,其所以成于今日之形式精神,非一朝一夕之事。”严复是一位真诚的君主立宪制者,他早年曾为君主立宪制呼号,时下已见朝廷准备立宪,他一再提醒“法制必不可循名而不求其实”,^⑫他希望名实相符的君主立宪制。他一再强调“顾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立宪之君者,知其身为天下之公仆,眼光心计,动及千年,而不计一姓一人之私利。立宪之民者,各有国家思想,知爱国为天职之最隆,又济之以普通之知识”。^⑬显然,在严复看来,相对于立宪的形式,更重要的在于具有立宪精神的人。无论是具有立宪精神的立宪之君还是具有立宪精神的立宪

之民，“皆非不学未受文明教育者之所能辨明矣”，因此眼下教育的大任在于“陶铸国民，使之利行新制……”^⑭基于这种见解，对来自其他方面更激进的民主共和的主张，严复明确表示不赞成并反对。

出乎意料，辛亥首义，民国成立。这个事实为一贯主张一国之制当以一国之民之力智德状况为之基，社会进化只能循途而进，绝不可躐等的严复所难以接受。接下来，民国的混乱，上层的争权夺利，更使他厌恶这种徒具形式的所谓民主共和制。文明程度甚高的西方，例如英国，就有“聚一哄之民辩议一国之法政”的情形；往昔的法国国会，也曾有“是中舍三百无赖，四百愚夫，更无余物”的至污记载。在远远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由专制之法，越宪政法君而直成于民主”的数百千人之议员——在严复看来大多为争权逐利之徒，其德操能事远不逮“一专制时代恭俭之中主”和“分清浊”、“其有志救世，莫不信言谨行、克己慎仪、一身隐然为苍生所托命”的“自待者至重”^⑮的“士大夫”。

辛亥前后，严复都申说过这样的见解，“自由有不必为福之时，而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⑯“自由自由几多罪恶假汝而行！”^⑰“往往一众之专横，更危险，其压制更甚于独夫。”^⑱严复无疑是深刻的。处处于历史中求解的严复，对自由、民主、专制在东西方历史中衍演的识见，比同时代人的认识深邃得多。但遗憾的是，由于思想重心的转移和“求实”方法的局度，他没有能够从辛亥之后民主“恶”的形式中超越出来。早年，他以“自由为体”，将民主与专制相比，认为专制治世少、乱世多，“腐败虐民”、“百无一可”。而晚年，离开了以“自由为体”来较论民主与专制，这使他无力再对专制进行批判，也无力从当下肤浅的民主形式中超越出来而趋向真正的理想的民主。严复更多地是返归圣人之教——教化出叔季那样的贤人——由修身、齐家达致治国、平天下来谴责、比照眼下民国逐利滔滔的乱局的，这表明来自西方的民主光耀的减弱，尽管他对现实一再发出道义谴责的愤怒火焰。这种

思想进程，集中表现在他对卢梭《民约论》的批判上。

诚然，严复从未完全赞同过卢梭，他对卢梭钦慕的同时，也持批判态度。但早年的批判仅限于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对其逻辑预设前提、对直接民主缺乏诸环节而难以在较大范围实现的批判。这批判并不妨碍他赞叹十七、十八世纪以来整个自然法学派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及祈向贯穿于这种社会政治理论中的近代价值理想，并不妨碍他早年被卢梭的学说——人生而自由、人民主权、每个人通过缔约走向公民社会是其主要内容——所吸引、所陶醉。

1913年，针对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的混乱，针对辛亥革命志士为建立真正民国的奋战（在严复看来，不论新人旧人，五花八门诸政客“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⑲其所作所为“在于猎官”、“在于植党”、“人人争权利耳！”），严复发表了《民约平议》，对卢梭思想的代表作《民约论》进行了孟子非杨墨般决绝的批判。他是以认知的方法对《民约论》悬设的逻辑前提——自然状态下人生而自由、对由此价值前提祈向的价值理想——保护每个人自由的公民社会、对由自然状态达到公民社会应取的途径——每个人参与缔结社会契约，进行批判的。在拘守认知方法的批判者看来，人生而自由“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⑳人人自由的公民社会，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恐为后来之所无”；群之权利，必以公约为之基“于实为为难见，于理想，亦有可疑。”面对在自由民主的名义下争权夺利，“视国为儿戏”的混乱状况，严复将一肚子愤怒倾泄到对《民约论》的批判中，“其书名为救世……实则惨刻少恩，恣睢暴戾”，是引起“喋血捐生”、社会动荡、“毒天下的乌托邦之政论”。^㉑

其实，卢梭的《民约论》首先是一套价值系统，他的每个人生而自由既是社会契约赖以缔结的价值前提，又是对公民社会中每个人自由的期盼，这期盼寓托着他对社会政治公正和正义的价值理想，其启蒙意义与整个自然法学派的学说一起，已溶进西

方近现代历史。严复对《民约论》的批判,从方法上说,表明了用科学的方法从知解的进路评判价值思想的不堪;从其内在理路上说,表明了曾深入探讨过小己自由与国群自由,人权与主权诸关系,触摸到近代文明的秘密,但又终未能准确把握其价值支点,在“可痛哭也”现实的追逼下,严复在理论上亟亟主张“今之所急,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②而在实践上则走向被他猛烈批判过的以王权、强权求安定的结局。总之,对《民约论》的批判表明,曾“烛引”他的“自他之耀”在其心目中的熄灭,表明这位曾以“仆死不朽”发愿译西书的启蒙大师与前此“力主西学”、“非西洋莫与师”精神的了断。

由于近代价值之光的熄灭,曾经“阔视远想”措置中西学关系的严复,现在因其视已不“阔”,其想也不“远”,早年的“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的胸怀抱负亦退演为“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③的嗟叹,从而更深地寻向内心先王教化之一线命根。但是,严复决不是一个仅独善其身的消极的道德主义者,他起劲地提倡尊孔读经,他要用先王的教化救住乱世中的人心,用孔孟一线命根逆挽中国这“将散之筏”。

1914年7月,为严复曾极可虑的事情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投入最先进科技的尸山血海的大搏杀,使严复对诚富诚强的西方文明的寄望彻底破产。他说“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④不知还将经几许磨难的中国,其前景何在?1917年的严复断言“即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⑤1921年,严复去世,临终前,留下遗嘱:“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绝不可叛!”^⑥表明了他持守中学的执着,亦表明了他思想的最后归宿。

严复从“非讲西学不可”、“非西洋莫与师”到

与前此力主西学思想的了断,从激烈批判中学、对中西学的比勘到对中学的执着持守,其思想发展深深影响着、打动着不懈谋求民族及其文化新生的运思者。严复对中学所短的深刻批判,代表着民族精神与近现代文化相较时所做的反省和反思;他对西学的翻译介绍、对中西学的比勘,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现代的转轨;他探求的许多问题,是谋求现代化的人们不可回避亦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他对传统中学的中枢——儒家教化的持守,特别是其晚年在“乱世”中对孔孟真精神的一再抉发、阐扬,以其巨大的悲情振撼着后来决意以生命续接民族文化的人。

严复的思想孕育了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潮发展中的两大派别,即新文化运动和新儒家思想。两者之所以“新”,正因为都是以严复思想为起点,而两者的对立、分张,亦正是以这位启蒙大师思想的内在矛盾为胚芽、为环节。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严复文选》第117、33、28、4、537、144、146、301、241、566、559、573页。

⑧⑨⑩同上第147页。

⑪⑫同上第225页。

⑬⑭同上第260页。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同上第311页。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严复集》第605、692、360页。

参考文献:

1. 卢云昆《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2. 黄克剑《两难中的抉择》,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 毛丹《严复思想轨迹的再认识》,载《学术研究》1987年第11期。
4. 方之光,胡臣庆《严复从传统离异到回归的历史反思》,载《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6期。
5. 马勇《严复晚年思想变化之重估》,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4期。

责任编辑:叶金宝

论方言特征词的频率选取法

□ 苏新春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方言特征词, 是最能代表和检验某方言的词汇, 其选取方法有两种: 一是凭经验、语感来选取, 一是用统计的方法来选取。本文着重探讨统计选取法中的地域分布统计、构词能力的统计、义项统计、使用频率的统计这四种方法; 并进而分析对所选材料的要求, 比较这几种统计方法的长短之处。

[关键词] 方言 特征 统计 选取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7326 (2000) 08- 0105- 06

李如龙先生在《论汉语方言特征词》^①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方言特征词的涵义、存在的客观性、词汇特点、来源演化、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这是关于方言特征词研究的一篇理论文献, 在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方言特征词的研究可以分为“特征词的选取”与“特征词的考释”两个阶段。“选取”工作的重点首先是要解决在一种方言词汇中(按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所收, 每个方言点平均收词 8000 条左右)为何选此汰彼的问题。李文在研究方法上提出了“由点到面, 由内到外地比较, 制定分级的特征词表”、“重点考证, 排除假象”、“群策群力, 反复修改”。细究之下, 这三点为研究方言特征词的总原则或步骤, 对方言特征词的选取来说, 还得有更为具体的操作方法。本文就对这一问题谈谈一己之见。

—

方言特征词的选取方法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凭经验、凭语感的选取。有深厚积累和锐利语感的学者, 运用这一方法可谓得心应手、舒展自如。他们说到一个词, 就能联想到其它多个方言点同异的说法。这种积累和语感弥足珍贵, 非其它的资料书甚至电脑数据库所能简单替代。它往往能一语中

的, 体悟到不同方言的词语之间那细微的语义差异, 能在南北东西复杂多变的地域变体中找到同语线或异语线。然而, 要使这一方法能普遍推广也有困难: 1、对方言知识和语感积累过分依赖, 而这正是要靠长期深厚的学养才能保有的, 一般的学人如只此一着, 则难免挂一漏万。2、面对丰富繁复的词汇, 即使是有很深厚的方言知识积累也难免言其所详, 忽其所疏。3、对建立全面描写方言词汇特征与差异的理论来说, 仅凭此还不足以保证从整体上全面地描述一种方言词汇所有的特征。而研究方言特征词的目的, 正是寻找一种方言的本质特点和分布规律; 寻找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对应规律。因此, 合理的选取方法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 在一种方言词汇的成万条方言词语中, 保证选来作为特征词分析的材料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第二种是用统计的方法来选取。统计的方法就是通过对一定量的词语进行地域分布、使用频率、构词能力、义项数量等方面的计算来发现词语在分布的大小、频率的高低、义域的广狭, 表达能力的强弱等方面的差异, 由此来认定方言特征词的存在或存在范围。李文描绘了方言特征词的诸多语言特点: “本区方言共有的而在外区方言少见的”, “总是口语中经常使用的方言词”, “往往是多义词”, “往

往有较强的派生能力”。概而言之, 这些特点, 就是地域分布上的个性、使用上的高频性、词义含量上的多义性和较强的构成能力。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在所确定的语料范围内进行频率方面的穷尽性统计来做到的。下面主要以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 21 个方言点的长辈类亲属词为例试作说明。②

1, 地域分布的统计。21 个方言点中长辈类亲属称谓词共有 1137 词 (次), 平均每个点 54.14 个。删去重复者为 616 个词。每个词次段的统计结果如下表:

词语数 (个)	184										432	616
	1	3	6	6	3	10	26	24	38	70		
复现次数 (次)	14	10	9	8	7	6	5	4	3	2	1	
复现总次数 (次)	14	30	54	48	21	60	130	96	114	140	432	1137
705												

以上数字表明: 复现次数最高的为 14 次, 只有 1 个词。复现 2 次以上的有 184 个词语, 复现词次共为 705 次, 复现 1 次的有 432 个词语。理论上可以认定, 这复现 1 次的 432 个词语就是只存在一个方言点所独有的“特征词”。③这样在所设定的所有 1137 条调查语料中, 一下子就将分析的眼光集中在缩小了约三分之二的材料上, 剩下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在这些材料中再作去假存真、淘虚留实、除浅掘深的工作了。后续的分析证明, 有区别价值的方言特征词都集中在这部分词语当中。以指“父亲”的词语为例, 复现率为一的词有“黎山老”“孟子见”“点头磕”“八叉”“父老二”(武汉); “老窦”(广州); “爷儿”(梅县); “阿官”(海口); “老爸”“娘爸”(厦门); “令尊”“本生爷”“依爹”“依爸”“依爷”“郎爸”“父”(福州); “达”(西安); “爷老”(宁都); “老人家”(娄底)。把其中因修辞手法造词而低频度使用的“黎山老”“孟子见”“点头磕”“八叉”, 因彼此收词不平衡而只在某些方言出现的较常见词语“令尊”“父”, 因借词而出现的“达”等, 一一剔除, 剩下的广州话的“老窦”、海口话的“阿

官”、厦门话的“娘爸”、福州话的“依爹”“依爸”“郎爸”、娄底话的“老人家”等有特征的词便水落石出, 显出它们那与众不同的方言个性。这时再来对每一个词语进行面称/背称、尊称/卑称、自称/他称、单指/复指等表义功能的鉴别及使用频率的调查, 就能准确把握这些词语的内涵了。

地域分布上的频率统计, 是方言特征词研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项研究。通过它可以大体摸清哪些词存在于哪些地区。从理论来说, 只存在于一个方言地区的“独见”词, 就是该方言的特征词。而那些出现在几个方言点的共有词语也很有价值, 因为词汇在地域上的分布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 相互之间的交叉、浸润相当普遍, 见于几个点的共同词语就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些方言的关系。如果共有词语是后起的, 并属于一般性词语, 它能揭示这几个方言点的异源同流关系, 重现语言接触的经历与程度; 如果共有词语是早已有之, 并处于词汇的核心和底层, 那么它们就能显示这几个方言点在历史上的同源与共流。分布范围大小不一的共有方言词语, 很可能就是位于高一层次的、关照到更大地域的方言区特征词。

2, 构词能力的统计。构词能力强是方言特征词很重要的一种表征, 它对判断一个词是否处于词汇体系的核心与底层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可以通过频率统计而进行细致观察的。如“姪”及“姪”字词族在所统计的 21 个点中, 共同在北方话的“西安”“太原”“洛阳”、吴方言的“温州”、赣方言的“黎川”、闽方言“厦门”“福州”“海口”、粤方言的“广州”“南宁”10 个点出现了, 出现的次数有 23 次。“姪”字共构词 18 个, 平均每个词在方言点出现的频次只有 1.28, 初看上去它的分布地点散、词语复现率低, 但从构词能力强弱的角度来观察, 却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安、太原、洛阳三个点中只有两个词“姪子”和“姪姪”。而这三个点恰恰都是属于北方方言, 表现出使用词语的一致性。而在广州话, 却有“姪”“姪母”“姪婆”“大姪婆”“姪有”“大姪

有”6个词,在厦门话有“姪婆”“阿姪”“母姪”,在福州话有“表姪”“姪妈”“依姪”“娘姪”“姪”5个词,在海口话有“姪姪”。因此,虽然“姪”在分布南北的10个方言点中都存在,但从它在各个方言点表现出来的不同构词能力来看,“姪”仍属粤闽方言一个富有特征的词语。

3,义项统计:一个词的义项数量,体现了该词的义域范围的大小。一般说来,义项愈多,它的义域范围愈广,也往往显示出它在语言实际生活中使用的高频率特点。这也是可以通过计量统计来表现的。统计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义项的数量,一是在合成词中表现出来的词素义,这时字词典一类的语料是相当好的调查对象。要进行更细微的辨析,则还应把一个词放到具体的语言环境来逐一辨析,了解它的运用环境、组合对象和搭配意义。如前者,以分析过的“姪”族词为例,在北方方言中它只有“舅母”一个意义,而在粤闽方言中,它还有“表舅母”义的“表姪”(福州)和“舅婆”义的“姪婆”(广州)“姪妈”(福州)。又如“爷”字,在21个方言点中,它及它所构成的合成词表示的男性长辈类亲属共有24种,这就是24个义项义或词素义:高祖父、曾祖父、祖父、姑外公、姑公、伯父、父亲、叔父、干爸、姑父、姨夫、继父、舅父、舅公、外祖父、姨公、丈夫、岳父、岳父之父亲、亲家公、夫之父、夫之舅、夫之兄、奶爷。构成的合成词多达65个。“爷”称得上是构词能力强、义项数量多、义域范围广的整个汉语的特征词。而从具体的某个词义或词素义来看,则仍会表现出它那独特的方言个性。如表示“父亲”义的“爷”及“爷”族词,在湘、客、赣的所有6个点都能见到;此外,只在邻近的福州话有一例,而其它的14个方言点都没有这样的用法。因此,表示“父亲”义的“爷”是湘、客、赣方言的一个富于特征性的用法。

4,使用频率的统计。使用频率反映的是词语常用与否,而口语中的常用性正是方言特征词的一个重要属性。由于现在的方言一般都缺少文本材料,

要作词频出现率的统计几乎不太可能,但仍可以通过其它的方法来认识一个词语的使用度。如对使用者的语感调查,所用的方法就是把要调查的词语编制成调查问卷,在问卷上标出由高频到低频的连续标尺,再由一定量的调查对象来进行语感判断选择,取其均值作为该词的使用频度。这种使用频率方面的语感式调查,在社会语言学中已经用得相当成熟,借鉴来用于方言特征词研究,也应有成效。

二

频率统计方法对材料的依赖性很强,对材料的选取也有很高的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1,要有足够量的语料。频率统计讲究的是一个概率,统计的材料愈多,调查结论就愈可靠。这也是归纳法的本质要求。要做到这点,首先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成果,特别是以词典形式保存下来的具体方言点的词汇调查成果。方言词典已有数百种,规模小些的词典收词一、二千条,规模大的在万条左右。万条左右的方言词语对一个方言点的词汇系统来说,基本上能反映整体。充分利用这些成果是后来学者的享受,也是必需的视野。要研究一种方言的特征词,不将该方言的所有词汇作一番梳理,不把它与周边地区的方言词汇进行全面对比,要谈它的特征词也就很难落到实处。由于研究范围不同,所要选取的材料量当然区别极大,但着眼于全局来搜集材料,着眼于广泛的横向对比来寻找特征词,个中道理是相通的。如本文所引的长辈类亲属称谓词调查,就调查了北至哈尔滨,南至海口的21个方言点,现在想来,在有计算机的情况下,把另外20个点的材料一起纳进统计范围并不是难事,效果肯定会更好。多点比较应是特征词研究的一个普遍原则。在一个方言区内,还可以分出多个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方言特征词研究追求的目标是“对内一致,对外排它”,对内对外的多点横向比较应是必作之工。最终确定下来能作为一个方言的特征来运用、鉴别的词语不会太多。但要真正找到能反映方言本质特性和差异的特征词,所选取的材料

范围却不能小。

2, 选取的材料要有典型性。在可资利用的方言词汇材料不少的情况下,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材料是精心琢磨的事。现在学术界已有了好几种方言词汇表, 这都是方言词汇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但应该看到, 把它们用来作特征词调查材料还有不少缺陷。如《汉语方言词汇》④收词只有 1230 条。由于收词数量不多, 入选词语受到的限制必然不少。⑤该书也将所有的词语按词性、义系分了类, 但入选的词语面窄, 所分的义类很难做到穷尽。所收的方言点为 20 个, 面略嫌狭小。这样的词表只能说是力图反映方言词汇特点的一个扼要简表, 用来作整个词汇的频率统计材料显然还不够。《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⑥共收了北方方言区内的 93 个方言点, 收词语 3200 多条, 制成语言地图 63 幅, 其中词语图 49 幅。取材范围和收词数量都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但它只限于北方方言。词表固然简要, 但却略掉了许多对频率统计有价值的, 能反映语言生存质与量的真实语料。

3, 选取的材料要有可比性。现在的论著、教材、论文、调查报告中都有不少讨论具体方言词汇的内容, 也揭示出了不少方言词汇的特点。它们都是现在开展方言特征词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奠定了一个较高的学术起点, 有的可以作为定论引进方言特征词研究的成果系列, 有的则可以作为一个线索, 引导人们继续深入、开拓。但从统计的角度来看, 这些论著所包容的材料因研究的目的、问题、条件、视野、方法各各有异, 在材料反映的广狭、厚薄、轻重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就这样拿过来, 势必造成材料上的不平衡。在材料可比性方面,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1999 年全部出齐的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它编制了一个供全书 41 个点统一使用的“词汇义类表”, 这就把各个方言点的词汇纳入了一个共同的框架, 非常利于各点之间的比较。总序说道: “凡是本方言能说的, 都尽可能问清楚。这样各地的语料才能对比异同。这些语料不

过是分地词典的最大的公约数。各地的编者有充分的篇幅, 可以广泛收罗本方言的字音与语汇。”⑦“义类体系”保证了纷繁歧出的方言词语能纳入一个可比性极强的框架之中, “最大公约数”则保证了各种方言词典充分展示各方言的词汇的个性。这种可比性是很有利用价值的, 只要挑取出其中的一个义类, 把各地方言词语进行对比, 就不难看出它们的异同点及词汇发育的繁简程度。加上每一种方言词典的容量都比较大, 基本上可以反映该方言的词汇全貌。这就使得这部 41 卷本的词典在研究方言特征词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近年出版的另一部方言大词典是许宝华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 ⑧它容古今南北的方言词语于一书, 收词达 21 万条, 在每个词语下面都尽量注明所属的方言区。该书对方言词语的纵向了解和横向概观上有着特殊的价值, 但在进行方言点之间的共时、系统的统计性分析时, 则较前者略显不便。

4, 对已有材料进行改造, 重新归纳义类。充分利用现有的词典材料, 还意味着可以对它们进行新的整理和归类, 发掘其中多角度多层面的利用价值。如《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除了具有语言层面上的统计作用外, 还可以利用它的义类。语言形式与概念义类是两个互为关照的方面, 像上文所举的例子, 大都是从语言角度展开的观察, 而像表“父亲”义的在广州话是“老窦”, 在海口话是“阿官”, 就属于义类的观察。对《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义类利用不限于它已有的 30 个大类和 120 个小类, 就是对它的一个小类也还可以进行新的提炼, 以概括出新的更小义类。如“亲属”是 30 个大类中的第 10 类, “长辈”是“亲属”类的第 1 小类, 而对“长辈类亲属”称谓词进行更细致的义类概括, 所得到的类别多达 69 类, 如: (按音序排列, 不包括合称) 表伯、表姑、表舅、表舅母、表叔、表叔母、表姨、表姨夫、表祖父、伯父、伯母、伯奶奶、大伯子、夫之嫂、夫之祖母、父亲、干爸、干妈、高祖父、公公、姑父、姑公、姑姑、姑奶奶、姑姐、姑婆、

姑太、姑外公、姑外婆、继父、继母、舅父、舅公、舅母、舅奶奶、舅婆、母亲、奶爷、奶娘、婆婆、妾、亲家公、亲家母、叔公、叔公、叔母、叔祖母、外高祖父、外曾祖父、外祖父、外祖母、小叔子、养父、养母、姨父、姨公、姨母、姨奶奶、姨婆、姨外祖母、姨祖母、姻伯、岳父、岳母、曾祖父、曾祖母、妯娌、祖父、祖母。对这 69 种亲属关系可以任意选其一来作各方言点的词语投影调查,以显其异同。义类的地域投影法现在运用相当广,如《汉语方言词汇》《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对照表》《中国方言地图集》⑨都应用。

5, 充分利用电脑的统计功能。进行词频研究运用计算机具有特别的便捷之处。词频统计对象的量愈多,电脑的优势愈明显。在牵涉到动辄数百条、数千条,甚至数万条的词语,一个词语有着几个甚至几十个参数的设定,几个方言点甚至几十个方言点之间的横向比较分析中,手工操作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传统的卡片统计方法所作的归类和计数,只适合于数量不是太大、次数不是太多的材料,从不同角度多进行一些统计就会受到严重的局限。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频率统计所要求的穷尽性会在语料分析过程中一再地显示出来。如此繁琐的工作是电脑最基本、最擅长的地方。要实现词频统计,使用一般的数据库软件就基本够用了。数据库软件分析的频次结果相当直观,与语言的频率理论也能做到同步论证。

三

用频率统计法来选取方言特征词有它独特的作用和便利处。词语地域分布调查法、构词能力调查法、词语义域调查法,这三种调查基本上属于对语言结构的静态了解。而使用度的调查则属于动态语言的了解,把静态观察与动态观察结合起来基本上就可以做到对一个词语在词汇体系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得到较全面、清晰的认识。从基本词汇理论来看,这四项频率统计的内容与拟解决的问题和基本词汇的“全民性”“稳定性”“极强的构词能力”及

“广义性”有较密切的关系。但二者有很大的不同。“基本词”主要就其在词汇体系中是否起到重要作用而言,并较多地是从历时角度观察。而“特征词”是从反映一种语言的个性来说的。特征词可以是基本词,也可以是非基本词;可以是本土词,也可以是后起、甚至外来词。

频率统计方法的运用也有其不足之处。有些不足是使用过程中对相关理论和方法处理不当造成的,有的则是统计对象的语料所带来的。譬如词的义域范围的调查,义项数量的多少与义域范围的广狭有着大致的对应关系,义项数量多的词,其词义范围一般也就广,但要在义项多与词义范围广二者之间划等号就错了。因为,词义范围广的词语中还有一种情况是义项虽然单一,但义素涵量少,外延范围却相当广的词,这就是通常说到的“广义词”。以动词为例,古汉语中的“为”、现代汉语的“打”“搞”“弄”、英语的“do”“take”“have”等,都是如此。它们的义域宽广的特性,与其说是通过内涵少外延广来体现,不如说是通过能与众多的语义对象形成广泛的搭配组合来体现。对这种广泛的搭配组合的概括,则与构词能力密切相关。

四种频率统计方法之间并不是完全协调、互为支持的,有时甚至会出现冲突之处。如义域范围宽广与高频性之间就很不一致。“我”是典型的单义词,形成新的组合体搭配义也不多,但“我”是语言中的高频词。还有许多助词、连词和代词都是如此。这就要求对特征词的研究在不同层面对不同语料要运用不同的方法。切忌用一种方法包打天下。

而对语料的使用,特别是对词典语料的使用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这在频率统计研究中须引起高度重视。如:

1、方言词的漏收。黎川话词典收有“奶爷”,武汉话词典收有“两老”,而这两个词在南昌话都有,可是《南昌方言词典》却漏收。

2、普通话词语的赘收。根据初步统计,在长辈类亲属称谓词中属于普通话的词语有 76 条,如出现

地点最多的前 15 个词语是“长辈、伯伯、爷、舅舅、姑婆、婆婆、叔叔、公公、妈妈、外公、妈、外婆、爸爸、姐夫、大伯”，“长辈”在 13 个点出现了，“大伯”在 6 个点出现了。下面是对 76 个词语分布情况的统计：

出现的方言点	13	10	9	8	7	6	5	4	3	2	1	总数
词语数	1	3	3	4	2	5	8	4	12	11	23	76

这一组数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方言词典对普通话词语的收与不收有着多大的弹性。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个别点的漏收与失衡，一般不至于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统计讲究概率。像“爸爸”只在 7 个方言点中出现，占所调查对象的三分之一，可是另一个数据（即这 7 个方言点散见于六大方言区）又有力地证明了它那使用地域广泛的普通话词语性质。这是概率统计方法的优势。

3、词典中的词语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平均数，使得高频词与低频词、本土词与外来词、基本词与非基本词、根词与派生词表现出相当的分量，占据着同样的空间。要弥补这个不足，就得与义域的调查、构词能力的调查结合起来，特别要辅之以使用度的频率调查，才能有效地予以补正。

4、词典是文本材料，它是以文字作载体的，而对语音差异明显的方言词来说，意思相当而语音不同的方言词很可能在书面上表现为另外一个样子。虽然许多方言词典都强调了“考本字”，但“据音写字”是方言文本材料中难以回避的现象。这是以文本为方言调查对象时要倍加小心的地方。在利用方言词典材料时，我们还必须从语音、语源上加以对比、鉴别，以克服对“字”的过分依赖；要透过文字的遮弊，加强对同源词、同义词、同音词的辨认，使特征词的确认落在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

①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特征词》，1999 年 7 月福州，中国语言学会第十届学术年会论文。

②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999 年 3 月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齐。共 41 卷，每个方言点一卷。所选的 21 个方言点为哈尔滨、西安、太原、洛阳、成都、武汉、扬州、苏州、金华、温州、长沙、娄底、南昌、黎川、梅县、于都、福州、厦门、海口、广州、南宁。

③当然，这仍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要考虑排除的因素有：方言词的漏收、文字书写不一，词缀处理不一、普通话词语收录不平衡、因音记字的差异等。

④《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语文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

⑤该书《凡例》“收词原则”谈到：“本书以表格形式收录方言词语，容量有限。……本书主要收实词，也收少量虚词。主要收单词，也收少量词组。选择词目还考虑到某些词语的配对。此外，本书词目按意义分组排列也从另一角度影响到收词。比如动词和形容词的收录基本上以人的社会生活为出发点，因此除‘肥’一条用于与‘胖’比较外，没有收入只适用于动物的词语。”

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语文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版。

⑦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地方言词典总序》，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⑧许宝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⑨《汉语方言词汇》见注④。《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见注⑥。《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编，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 1987 年版。

责任编辑：陶原珂

诗性智慧的现代阐释

——读劳承万的《诗性智慧》

□ 刘士林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江苏 南京 210097)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8-0111-04

诗性智慧一词,本出于意大利学者维柯的《新科学》一书,用它来指称那种在人类天性中最为深层、古老而又充满激情的精神活动方式。维柯特别强调,这是一种与文明人“理性智慧”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构与功能的“玄学智慧”,也就是其后人类学家所谓的原始思维。由于原始思维中逻辑能力不发达,所以诗性智慧本身也就最能够体现出一个民族在感受事物中的情感智慧。正是诗性智慧这一本质特征,才使得它在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日趋尖锐的现代世界中,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也许这就是它引起美学家劳承万先生研究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

但由于历史的起点不同,劳先生的“诗性智慧”概念,与维柯的涵义并不完全一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维柯偏重于民族学,而劳先生则倾向于美学。前者意在探索人类智慧的真正起源(不是来自上帝);而后者则旨在寻求解答“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转化”(列宁的伟大命题)的实证之路(亦即自然如何成为人的,生理如何转化为心理,真如何转化为美等)。从价值观的角度,维柯更偏重于历史学,意在以所谓的异教历史进行反神学的斗争;而劳先生则更倾向于语言学,旨在探索符号(语言学)与情感运动(诗学)的共同本源及其终极交流方式之

中,解开语言、诗、思以及人的审美活动的秘密。正如劳先生所言:“诗性智慧,是人的一种情感智慧,或者说是由词语引发的情感运动智慧。它体现于复杂的诗行结构中,成为一种时空合一体”。(劳承万《诗性智慧》,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2页。以下此书引文只注页码。)

劳先生的学理依据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作为一个民族感受力最深源泉的诗性智慧,从根本上也是一个民族审美能力的武库;而且,作为一个民族感受力与审美力的完美结合,恰恰是以符号化的方式体现在该民族的诗歌艺术之中。从人类学角度研究原始思维或其原始结构、从诗学角度研究诗歌的内在本质或情感运动方式,以及从美学角度研究个体的审美感受力及其审美活动,这三种研究方式,在诗性智慧的层面上,具有了比较、互渗和汇通的可能。质而言之,它们具体地交融在诗行结构或者说韵律节奏中。诗的韵律节奏,一方面沟通着人类学意义上以原始仪式歌舞方式显现的生命(包括感性与理性)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又内在地积淀于活生生的现代人的个体生命活动中,而最重要的是,它又体现了“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一当代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在诗行结构中,一个民族古老的情感运动方式,穿越了历史的尘封,突破了个体心理

(大脑)的黑箱,也使言意之间的晦暗隧道得以澄明。由此看来,作者选择了一个极富弹性,同时沟通了自然、人生与艺术的研究对象。它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探索。

第一,关于节奏韵律的研究,过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是起点不够高,例如古文角度的研究,它把诗的节奏韵律问题,直接就看作是一个艺术形式或技巧问题,从一开始就把它限定在文艺美学范畴之内。这样一种极其狭隘的认识,虽然并不妨碍古人的实践行为,例如只需把一本“声律启蒙”背诵下来,即可掌握最基本的艺术技巧,什么“云对雨,雾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之类。但这种启蒙训练永远也不会使人们了解节奏韵律与生命的丰富关系,知道作为外在于生命本身的诗的声音、韵律,为何能够转化为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的情感运动过程;二是一种直觉主义方式,它虽然也注意到这一“由词语引发的情感运动的智慧。”例如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就曾多次讲到中国诗歌节奏韵律与宇宙内在次序的对应,但却常限于一种直觉式的体悟,而对两者之间至为关键的中介转换机制,却未能加以深入的剖析;三是西方美学界对这一问题虽有不少看法,但是一方面其自身不仅问题重重,而且相对于中国这一诗的大国来说,常常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也就是说,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工作,劳先生同时面临着两项任务:既要清理来自西方的理论思路;又要整理本民族的感性材料,以及在前人的基础上“接着讲”。

在关于节奏问题的思考上,我认为,对劳承万先生影响最大的是这样两句话,一是马克思的“人是情欲的存在物”,它使作者摆脱了理性主义本体论哲学对人的规定,同时也就沟通了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使“思”与“诗”的交流有了一个以生命整体为基础的坚实背景。应该指出的是,因为在起点处取消了二元论,所以它同时也是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批判,也即避免了把马克思定义中的“情欲”做非理性主义的解释。正是由于把情欲从混沌的盲

目冲动的无意识中提升出来,才引发出劳先生“人是节奏的存在物”这一至为重要的理论命题。二是朱光潜先生的“节奏是宇宙中自然现象的基本原则”,它揭示了宇宙万物的基本存在方式,可以说具有“开辟鸿蒙”的创造意义。它既避免了把自然看作是“无定型”的混沌形态;也避免了把它看作是一种理性的对应物。把存在本身看作是一种节奏的存在,这正是诗性智慧的慧眼卓识。正是在诗性智慧中,诗的韵律节奏问题,绝不再仅仅是一个艺术形式问题,在哲学美学的意义上,它一方面表现为认识论上的“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的实证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心理)本体论意义上的“生理能”与“心理能”的相互转化问题。如果说前者是一个理性能力的生成问题,那么后者则是一个有关人的审美生成的哲学本体论的大问题。把诗的节奏提升到本体论哲学层面上来进行研究,这正是劳先生本书“道高一尺”的理论气势所在。

第二,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劳先生具体地剖析了韵律节奏的发生过程,这一过程历时地贯穿着中国人的宇宙之道、世界之道以及人生(艺术)之道,或者说在传统的学科分类中,这三种分别由不同学科来探索的本体论问题,正是通过诗性智慧的出场,其在发生阶段的本源意义上的共通性,以及它们在现代世界中高度独立现状背后所固有的深刻统一性,都得到了理论说明。我个人认为,这是全书最精彩动人的华章。

劳先生指出:无论中西,在其本体论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实体本体论到“抽象——流动”本体论。因为原始思维的抽象能力不发达,所以最初都表现为一种实体本体论。而在走向“抽象——流动”的过程中,西方采取的线路和姿态是二元对立,所以物质与精神这一对矛盾范畴便占据了哲学的主要位置,因此它的流动只是一种在二元之间的机械运动。而对于以二元和谐为目标、饮之太和(诗性智慧)的中国哲学,由于其旨在统一地把握物我,所以,一元性的“气”便成

为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作为一种“一以贯之”的道，它上下往来，沟通古今，贯通自然、社会、人生和艺术，而它在本质上，却不是什么不可言之的神秘东西，而是一种“时空显示生命力的象征”，是大化流布于宇宙万物，盘桓吐纳在心灵世界，又安祥排列于诗行结构中的节奏韵律。

对于这个转折过程的逻辑揭示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在历史的向度上显示着原初和谐的母体结构，在面对现代人的精神分裂与危机的时代意义上，它还为以审美方式解决现代人的精神问题，提供了一个积极有效的治疗方案。劳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宇宙本体论，是由三大环节组成的：起始环节是变易总机制，它是一种非实体的、无规定的“虚实”或一种思维的混沌状态。中间环节是实体本体论演进的三层次结构。第一层次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基本运演代码的实体本体论；第二层次是“天—地—人”三元和谐结构，即所谓“在天曰阴曰阳，在地曰柔曰刚，在人曰仁曰义”；第三层次是气的“抽象—流动”本体论。第三个环节可以说是第二环节中第三层次的定型与物化，实体本体论经过“抽象—流动”的“气化”，也就突破了物质与精神、思与诗的障碍，（庄子所谓“通天下一气耳”，朱子所谓“音律只是气”等）实体的存在便可由艺术节奏来显现。也可以说，在实体主义看来，土只是土，木只是木，它依据于一种人的生存需要以及实用主义分类原则，如同现代人认为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艺术科学研究艺术一样。它割裂了世界的统一性，破坏了生命本身固有的和谐，也造成了现代人生活的节奏失调。探索人与自然、心与物、生理与心理的和谐问题，也就是要为生命筹建一种自由的审美的节奏韵律。它在本质上是一个艺术本体论的建设问题，中国文人经常讲的“养气说”、“气韵生动”，“文以气为主”等，都包含着以艺术节奏纠正、化育、创造生命的诗性智慧内涵。正是由于艺术本体论的成熟与介入，中国本体论哲学才变得完整、空灵、自由起来，这就是“气→物

→人→诗”（也包括“诗→人→物→气”反馈流程）的宇宙的生生之德，这也是艺术与哲学相会通的最深基础。（见该书第81—82页）同时，对于诗行结构中节奏韵律的分析，也就是对于前文所谓认识论上的“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的实证问题，以及（心理）本体论意义上的“生理能”与“心理能”的相互转化问题的最终解答。这是因为只有通过诗性智慧对节奏韵律的阐释，才能消除掉在理性智慧中的二元论，被截然一分为二的物质与精神、生理与心理才具有了统一的前提。从这一意义上，诗性智慧的研究，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第三，本书另一个巨大的贡献在于，它不仅从本体论高度阐释了节奏的发生环节，它还以劳先生特有的方式，对节奏这一概念进行了严密的分析与逻辑规定。对于任何一个所接触的学术问题，劳先生几乎都是不厌其烦地清理其逻辑环节。劳先生把马克思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钥匙论”与黑格尔的逻辑研究方式结合起来，这是一般人不愿意做的苦差事，解剖每一个不成熟的思想有机体，以便找出它们在逻辑环节中的具体位置，并由此获得一个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这就使他的研究一直有可靠的学术背景。也使得他往往能够披沙拣金，在本书中也一样，这尤其表现在他对节奏本质的理解上。

关于节奏的本质，过去也是我们很少刻意研究的。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过于偏狭的学术分工导致的。一方面在文艺学那里，它被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形式问题，未能打通这形式与人本体的内在关系；另一方面，哲学家或心理学家虽然一直留意于“外部刺激”与“内部意识”或“生理能”与“心理能”的关系，但又由于它们本身忽视了艺术（诗性智慧），作为中介环节所具有的审美建设意义，所以在许多著述中有关节奏问题的零碎论述并不少见，其中也不缺乏一些深刻的睿见，但毕竟未能建立关于节奏的本体论哲学。

劳承万先生认为，艺术节奏是沟通生理与心理的有力手段，这种关系可由这样一个三元式来表达。

即: 1、节奏性→2、节奏感定型→3、节奏感物化类型。其中, 节奏性是指人生存活动的现实感受, 它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主要包括重复性、对称性、意向性等方面,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劳先生指出, 节奏性在本质上属于艺术形式。在这一意义上, 艺术节奏不仅是一切其他节奏类型(如自然节奏、哲学节奏、伦理节奏等)的原型, 而且更是人类进行审美创造、达到审美自由的根本原因。所谓节奏感定型是指大脑的积淀与内化。由于人不同于动物的特殊性, 使他在生存活动中产生的节奏性, 不再是一种过眼云烟的东西, 也不仅仅是一种附属于肉体的技术手段, 而是通过定型活动, 在自身生产出特殊的情感机能, 这就是程式化的情绪运动方式。它是作为小宇宙的人体, 成为节奏性的存在物的内在根据。最后是节奏感物化类型, 这是节奏感的成熟形式, 它包括艺术型节奏和非艺术型(如伦理学)节奏两种, 它体现为人以其自身的已定型化了的审美节奏去观照、去实践, 也就是以美的尺度去建造。如果说, 在前一个阶段, 主要表现为向内收敛, 使人的存在通过节奏性运动, 从自然中独立出来, 并在节奏韵律中形成自身的诗性逻辑链条, 具备了生命之舞的美丽。那么, 这里所说的节奏感物化, 就是生命的舞蹈, 是人艺术地存在和人诗意地生存在世界中。它在本质上是通过节奏化活动, 使世界与人生摆脱了它日常状态的机械与灰暗, 得到自由的

展开和审美的澄明。所以说, 节奏感成熟的历史, 也就是人作为艺术存在的成长史。因此, 研究节奏感, 就是研究人本身, 就是对本身成为艺术存在的规律的揭示。(见该书第98-112页)还应该指出, 列宁那个令很多人苦恼过的有关认识论的伟大命题, 在劳先生看来, 只有通过对诗性智慧的深入研究, 才能得到完整的、真实的理解与阐释。认识论的问题, 在本质上离不开本体论基础, 而且, 只有在两者之间建造出合理的审美中介环节, 才能使它得到真正的解答。而诗性智慧也就是在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所以, 在这一意义上, 本书仍可看作是劳先生的“审美中介学”向人类学领域的有力拓展。

作者除了以人们熟悉的“猴体解剖钥匙论”方式, 剖析了一系列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之外(这也是劳先生在学术界最令人称道的一贯作风, 在《审美中介论》等书中我们已多次见到过); 劳先生还以他深厚的理论功底, 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艺理论中一些重大问题做了深刻的理性剖析, 其中多有发前人所未发的精辟论述, 如中国诗歌节奏为什么以四言为发端结构, 汉语中虚字的节奏功能, 不同诗体之间的节奏模式与中国审美精神的变迁, 节奏感与中国民族的时间意识等, 也都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开卷有益。

责任编辑: 陶原珂

论意象的沉默姿势

□ 费 勇

(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本文描述了意象的两大特征: 以生命感作为意象沉默姿势的本质特征, 主观情意的投射和主客交融赋予意象以生命感; 以凝定性作为意象沉默姿势的表现特征, 它凝定为语言, 在时间和空间上使得于瞬间的意象得以留传久远。

[关键词] 意象 沉默 姿势 诗歌

[中图分类号]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00) 08-0115-04

一

意象的沉默姿势体现在它的生命感中。

刘勰《文心雕龙》中首次运用“意象”一词: “然后使玄解之宰, 寻声律而定墨; 独照之匠, 窥意象而运斤。”意象具有“意和象, 隐和秀, 风和骨等多种规定性”。①是一种“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只有容和心或现实表象和现实意蕴的统一, 才能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②在刘勰的表述中, 意象成为“主观”与“客观”交融的产物。

没有主观情意的投射, 意象就不成为意象。正如庞德所言“一个意象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③意象诞生于主客交融的刹那; 只有经过心灵化的瞬间, 意象才具有生命力, 才有迫近生命体验的质感。

这种主客交融性, 究其实, 是作者生命感的自然流淌, 是生命体验贯注于语词, 并为自身找到可以“触摸”的形质。语词在成为意象的过程中, 从单一的意义规定中逸出, 浮游在形态与意义之间。同一个语词, 因为意象的运作, 变幻出不同的姿态, 成为活的生命, 处在生长之中。以“云”为例:

例如“孤云”, 带着贫士幽人的孤高, 陶渊明《咏贫士》: “万族各有托, 孤云独无依。”杜甫《幽人》: “孤云亦群游, 神物有所

归。”“暖云”则带着春天的感受, 罗隐《寄渭北徐从事》: “暖云慵堕柳重条, 骑马徐郎过渭桥”。“停云”却带着对亲友的思念, 陶渊明《停云》: “霏霏停云, 皤皤时雨, 八表同昏, 平路伊阻。”辛弃疾《贺新郎》: “一樽搔首东窗里, 想渊明, 停云诗就, 此时风味。”④

而徐志摩则有“我是天空中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痼弦则有“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 戴望舒则有“在心头飘来飘去的是什么呢! 像白云一样地无定, 像白云一样地沉郁”等等。同为天空中的那片云, 却因情意的不同, 而构成不同的意象。因而, 意象赋予了我们置身的周遭无限的生机, 云不再是每天见到的云, 树也不再是每天见到的树, 还有山、水、城市、河流、物质……都不再是无生命的客体, 而是灵气飞动的、无声地诉说着的生命体, 蕴含着无限的情意可能性。

把生命赋予艺术品, 无疑是真正的艺术家最为主要的任务。词语间洋溢着生命的灵气, 词语便超越了它自身的局限, 指向无限的想象空间。作家本身的生命必须是敞开的, 他(她)的感官必须向自身以及自身以外的一切敞开, 那么, 围绕着他(她)的便无一不具有生命的灵动之气。然后, 词语收割

一切——一切的音响、色彩、线条、味道、粗糙、光滑、坚硬、柔和……词语引导我们进入感觉的世界，不可言说的世界。人为的规范和制度使世界变得简单，但意象或词语使世界变得复杂。

作家越是细腻地揭示场景或细节，从外在的物到内心的感觉，就越是能显示存在的幽深地带，以及人性的千姿百态。鲁迅的语言有着黑色大理石般的冷峻与深邃，而川端康成的语言仿佛有着日本和服的那种柔软、细腻、香艳与缥缈。张爱玲的语言首先震撼读者的，也是它的那种神奇独特的质感。张爱玲也许达到了“琐碎”的极致，像一个饶舌的女人，絮絮地描述着她所感受到的一切细微的东西：从街边的行人，到屋内的摆设，从叫卖的声音到旧家具的颜色，从一个眼神到一个念头，她都非常投入地去感觉，并以微妙的语言传达出来。所以，张爱玲的“琐碎”，并不繁冗、芜蔓，反而有着一一种透明的质地。她用一种统一的意绪来观照繁琐的世界，并且抵达这繁琐世界最深处的层面，因而，琐碎的场面具有凝炼的穿透力。用一些研究者的话说，张爱玲的作品充满着活泼的意象。⑤张爱玲的语言是意象式的。可感的心理世界与日常世界之间奇妙交融，使张爱玲的作品充满奇特的生命跃动与质感。

人的意识投射是使物象转化成意象的重要程序。若是物象或客体不注入人的思维，就只是松散的、索然无味的“指陈”。然而，并不是说只要注入人的思维，就会酿成意象，就会使语词充满生命感。意识的过分凌厉，往往将物象完全淹没，使意象缺乏晶莹的质地，只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而不具备自足的意义生长机制。没有一种程式化的理论能够清楚地说明意象的生命感之形成，但禅宗“悟道”的说法颇有启发性。入道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入道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真正悟道后“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周梦蝶曾用现代诗表现这一过程：

坐断几个春天？/又坐热几个夏天？/当你来时，雪是雪，你是你/一宿之后，雪既非

雪，你亦非你/直到零下十度的今夜/当第一颗流星骤然重明/你乃惊见：/雪还是雪，你还是你/虽然结趺者底跏音已远逝/唯草色凝碧⑥

禅者或释迦牟尼的悟道过程，与作家铸炼意象的过程十分相似，同是生命体验的向内向外的无限扩张，然后落实在某个相融点上，完成一种生命的“定型”，一种全然超越了现世而又回归了现世的“定型”。

生命感的贯注，不是刻意的扭曲、渲染，而是一种无声无息的“迹化”，在不知不觉的情状下暗然涌动。例如“迂回的山道”以“当山道迂回”加以表现时，立即升腾为一个意象，表面是客观的描摹，但副词“当”已不经意地将人的心事浓缩于其中。

意象成型的过程，是作家对现实重新整合的过程，是自身和外界、自我与自身之间相互游离、和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词、心灵、现实都在动态的“追寻”之中，充满生命的律动与音响，而意象的姿势恰恰因为这种生命的动感，获得了沉默的旋律。

二

意象的沉默姿势还体现在它的凝定性。⑦

冯至以诗的语言描述意象的凝定姿态：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慧星的再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⑧

意象将刹那的惊喜从时间的流程中截取，凝结成空间形体。“意象的形成由动转静，由声音趋于静谧。由于瞬间凝聚，它富于张力。虽然这一小段截头去尾，但它默默指出动作的源始，和可能发展的脉络。”⑨意象的凝定里有一种灵视，透过它，从一颗沙里看到世界，从有限触摸到无限。

天空中忽然掠过的流星，临街窗口一个女人对镜理妆的背影，或者街边乞丐伸向行人的手臂……

都可能刹那间点亮作者的心眼, 那片刻挥之不去, 终以文字凝成意象。因而, 意象的片刻姿势, 往往是纷乱人生、芸芸众生的某个焦点, 也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结点。一方面是记忆的积淀, 事件、脸孔的隐藏, 另一方面是未来的猜度, 可能性的隐现。

意象的凝定延长了、或者说固定了时间。写作者在营造意象时, 以及阅读者在阅读意象时, 都会远离尘世的纷乱, 而凝神贯注于那最澄澈的一点。根本上, 意象是人对抗时间的手段。一切美丽的借着意象的姿态, 达臻永恒; 那不可挽留的, 渗透在意象之中, 无尽地绵延。有时是片刻心境的留存, 爱·米·罗厄尔的《秋雾》: “是一只蜻蜓, 还是一片枫叶/ 轻柔地栖息在水面上?” ⑩眼前的景物感动于心, “如实”的描绘中仍飘逸着那一刹的心境。戴望舒的《印象》则将不同时空中的意象并列呈现, 影射同一种意绪:

是飘落深谷去的/ 幽微的铃声吧, / 是航到烟水去的/ 小小的渔船吧, / 如是青色的真珠, / 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 ……⑪

好像是放眼望去的景象, 撩起了诗人内心的寂寞, 又仿佛是诗人的寂寞, 感染了这些视野里的景象。这种类型的意象, 最能体现纯诗的理想, 只是纯然的“美的存在与发现”, ⑫如同一位日本女诗人清晨起来看到嫩绿的青藤爬在井台边, 禁不住一种惊喜, 信手用文字记录下这个意象, 并不是要表达什么深刻的思想或什么曲折的感情, 而只不过要表达一种发现, 一种刹那的感动。从这一类的意象中, 最能感悟到“刹那即永恒”的真谛。徐志摩的“沙扬娜拉”记录了一个日本少女送别时的情状, 只是那么“一低头”的“声”与“色”, 却捕捉到了一种永恒的女性的美, 一种永远无法重复的女性的美。临即的意象有着不朽的魅力。

有时, 意象延搁时间, 浓缩的是沉厚的人生体悟, 如歌德的《浪游者之歌》

群峰一片/ 沉寂/ 树梢微风/ 敛迹/ 林中栖鸟/ 缄默/ 稍待你也/ 安息。⑬

夜晚山顶所见的沉寂的群峰、敛迹的微风、缄默的栖鸟应和着人生的追寻踪迹: 从狂暴热情到沉静、安详。这几个沉默的意象, 充溢着生命喧哗的痕迹, 是挣扎、探索过后的那种宁静, 是生命在一刹那间突然领悟一切之后的那一种肃穆。穆旦晚年作品《春》的最后一段:

被围困在花的梦和鸟的鼓噪中/ 寂静的石墙内今天有了回声/ 回荡着暴乱的过去, 只一刹那/ 使我悒郁地珍惜这生之进攻 ……⑭

透过这几个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竟象: 花的梦、鸟的鼓噪、寂静的石墙、回声, 将宿命般的生命遭遇凸现, 暗示出一种沉痛的人生感慨。再如郑愁予的名句: “多想跨出去, 一步即成乡愁/ 那美丽的乡愁, 伸手可触及”, ⑮聚焦于想要跨出去而又尚未跨出的那一刻, 在这悬空的间隙, 人对于异乡的向往、憧憬, 以及对于故乡的依恋, 同时涌现, 把人置于一个永远无法两全的境地。这想跨出去而又未跨出去的姿势, 和伸手可及的“乡愁”, 显现了一种普遍的生命体验。

在现代汉语诗歌中, 意象对于时间的延搁, 更多地表现在对于时代风雨中民族命运的铭记, 印证了诗或文学是民族心灵史的论断。从一些富有代表性的意象中, 我们可以触摸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沧桑变幻。时代的风雨, 折射于心灵, 藉着文字, 凝定成意象的姿势, 从另一个更为深幽的层面, 向后人展示历史的深处。作为第一个以现代汉语写诗的诗人, 胡适的诗在美学效果上并不理想, 谈不上什么意象的经营, 但即使在他那些显得粗糙、质朴的意象中, 也已隐约透露了现代中国历史与个性生命之间横亘着的悲剧性矛盾冲突, 如他的《蝴蝶》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⑯

这也许不算一首好诗, 但其意象所表达的情怀, 却极具历史价值, 因为这种孤单的意象在日后的诗

歌中经常出现,个体与社会、政治及传统之间的冲突,一直激荡着中国现代诗人的心灵。郭沫若以凤凰涅槃的意象展示了中华民族从传统的压抑中“死而复生”的过程,表达了一种渴望解放与新生的愿望。而穆旦则以婴儿脱离母亲子宫的意象^⑪来隐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与群众隔绝以后的痛楚与茫然。

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⑫则把中国遭受日寇侵略的惨痛历史,凝缩在“雪”这样一种自然的意象中。洛夫的“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石室之死亡》)“发射出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切断’、‘创伤’、‘生命无以延续的威胁、而历史的记忆与伤痕继续不断’的情境,而且也是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切断’、‘创伤’、‘生命(文化)无以延续的威胁’和‘历史记忆和伤痕不断’的回响”。^⑬再如,黄翔“野兽”^⑭的意象深深地烙有文革时代的印记,塑造了那样一个专制时代被扭曲了的人的形象。

意象以瞬间的有形,包含了更广大的无限与无形,如同心象的轨迹,指示着一个更深邃的世界。在意象凝定的姿势里,我们受到感染、启迪的并不只是当下的“经验”,还有超越于时空的永恒,以及超越了个体的整体经验。意象似乎总是将无形化作有形,具有很强的“视觉性”。然而,意象终究受到语言媒体的制约,它永远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可视。在很大程度上,意象并不能以“肉眼”观之,而只能以“心眼”观之。意象在凝定中创造了一个虚实相间的世界,即使在最“逼真”的意象中,仍充满着无数的“空白”,需要读者以想象去填充。以卞之琳那首《断章》为例,一个似乎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意象:一个人站在桥上看风景:但这个人是谁是男是女,他(她)看风景时的表情,以及他(她)为什么要看风景,看怎样的风景等等,都是悬疑,读者的追问将意象的意蕴引向不同的方向。即使在艾青那句非常实在、直白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

在封锁着中国呀”中,由于对“中国”的强调,以及“封锁”这个动词,使得“雪”这个意象似实似虚,引起联想。这些意象如果要转换图画,它们的“形”很容易画下,但“形”中的“意”却难以传达。

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265页。

⑫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148页。

⑬转引自 Wellek,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Chapter 15。

⑭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第63页。

⑮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⑯周梦蝶《菩提树下》。

⑰参见唐湜《论意象的凝定》,载《新意度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

⑱冯至《十四行集》,明日社1942年版。

⑲简政珍《诗的瞬间狂喜》,第106页。

⑳《意象派诗选》,第75页。

㉑《戴望舒诗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㉒川端康成《美的存在与发现》。

㉓钱春绮译《歌德抒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㉔《九叶派诗选》,第411页。

㉕郑愁予《边界酒店》。

㉖胡适《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第1页。

㉗穆旦《我》。

㉘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㉙叶维康《洛夫论》(附于《因为风的缘故》)。

㉚黄翔的《野兽》写于1968年,全诗如下: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我的年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唤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责任编辑:陶原珂

“盘古神话由印度传入”说质疑^①

□ 韩湖初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 本文在综合分析、引证以往的研究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 认为何新先生提出的“盘古神话由印度传入”说的四点理由(大梵神与盘的音训相通、梵神与盘神均自鸡蛋生、梵与盘均半分鸡卵而成天地、梵历 360 劫与盘古经三万六千年造天地之数相关)不成立。

[关键词] 盘古 神话 印度 传入

[中图分类号] I276.5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0)08-0119-03

近年来何新先生极力主张“盘古神话由印度传入”说。何先生在把盘古神话与印度《摩奴法典》的“大梵”创造宇宙的神话故事比较, 认为有如下四点“契合之处。”这无疑是何先生判定盘古由印度传入的主要根据。四点具体如下:

(一) 大梵神音“Brahma”——“也可译作盘古, 简称‘盘’(盘、梵、古、摩在古汉语音近相通)”;

(二) “梵神与盘神均是自鸡蛋中出生”;

(三) “‘梵’的鸡蛋与‘盘’的鸡蛋都剖分两半, 分别变成了天与地”;

(四) “‘梵’的这一创造过程共历 360 劫波, 计 36 万年。而盘古造天地则经历了三万六千年。这两个数字显然有关。”^②

关于(一)“盘古”与印度大梵神音近相通, 闻一多等早已从音、义方面考证出盘古即伏羲。如说:“《史记》分明说褒国是禹后, 而《潜夫论》又说是伏羲之后。褒国的‘褒’本一作‘庖’。……《潜夫论》曰:‘太昊之后有庖国, 姒姓。……所以庖国是姒姓, 也同风姓, 是禹后, 也是伏羲之后了。’”^③常任侠早在 40 年代也指出:“伏羲一名, 古无定书, 或作伏戏、庖羲、虑羲、庖牺, 同声俱可相假。伏羲与盘瓠为双声。伏羲、庖牺、盘古、盘瓠, 声训

可通, 殆属一词。无问汉苗, 俱自承为盘古之后, 两则神话, 盖同出于一源也。”^④《山海经·大荒东经》称古时东方有“少昊之国”。距今约 5000—6000 年的大汶口文化, 其中心地带就在山东泰山的周围地区, 承继其后青铜时代的岳石文化、铁器时代的齐鲁文化一直是华夏文化的主要源头和重要内容。宋耀良先生从远古岩画的传播说明远古时东方的太皓(又作太昊)部落其岩画传播远及黄河中上游。

⑤《御览》七八引《帝王世纪》称“太昊庖羲氏”。闻一多和刘起轩先生都注意到《淮南子·览冥训》把女娲炼石补天等许多功烈联系于伏羲,《精神训》称伏羲、女娲为“二神”,《原道训》、《缪称训》则称为“二皇”,可知“在西汉已流传伏羲女娲为夫妇生出人类的神话”。^⑥而远古时代的伏羲(又作庖羲等)正与盘古音近相通(而且义也通,详下),故伏羲即盘古。按说,闻一多的《伏羲考》等,何新先生是看过的,不知为什么只看到盘古与印度的梵神音近相通,对盘古与伏羲音近义通却视而不见?

关于(二)、(三),先说:“蛋生”即“宇宙卵”(世界各国创世神话普遍以卵喻宇宙与人类的诞生)。早在《山海经·大荒南经》中就记有人由卵生的“卵民国”,民间有以蛋喻孕育生命的习俗。^⑦《史记·殷本纪》就记载传说商的祖先契就是其母简狄吞燕

卵所生;《诗经·商颂》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就是此事。我国古代具有宇宙本体意义的“太极”圆图,其原义就是“宇宙卵”,其中两条阴阳鱼与蛋剖分为两半成为天地的意义是相通的。陈建宪先生研究了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以及当代西方的神话理论,从太极图和宇宙卵、垂死化身和天人合一两大方面分析,论证了盘古创世神话的两个母题“其根在中国”;并认为“中国的盘古神话,既与其他民族的‘宇宙卵’神话有着共同的原始思维规律,又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⑧另有论者指出;我国古代(汉以前)盛行“盖天说”,即所谓“天似穹庐”——以半圆的穹窿为“天盖”。《诗经·大雅·桑柔》:“靡有旅力,以念穹苍。”毛传:“穹苍,苍天。”苍者谓色,穹者状其形。《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郭注:“天形穹窿,其色苍苍,因名也。”邢疏说古之言天形者有六,“五曰穹天,云穹窿在上。”由此引出“天地初生如鸡子”(即“宇宙卵”)的说法。如《晋书·天文志》引《浑天仪注》说:“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又引虞喜族祖河间相《穹天论》(约265年)云:“开形穹窿如鸡子”。^⑨可见,“天地混沌(初开)如鸡子”之说源自华夏传统的“浑天说”,并非自外传来。有论者以为,我国卵生神话“是在佛教文化大举东进之后的三国时代才开始出现”,^⑩显然与事实不符。

再说蛋剖分两半变成天地。中国古代的最高哲学范畴是“道”,即“太极,它最原始的状态是阴阳未分的混沌元气,原始象征物就是葫芦、鸡蛋。其宇宙生成论为:太极——两仪(阴阳)——四极——八卦。这一宇宙生成论是地道的中国货,并非外来的。西汉早期的《淮南子》尚保留系统的论述。如《天文训》云:“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精神训》也有类似论述。西汉时佛教尚未传入,可见是地道的中国传

统。叶舒宪先生也说:“‘一’与‘道’相通。其原型为‘壹’,从壶,实取象于葫芦。所谓‘道生一,一生二’的形而下表象为葫芦剖判型创世神话,葫芦作为原型意象在中国各族神话和文学中普遍存在。”^⑪所谓葫芦剖判型创世神话,与蛋剖而成天地,其义实一。(关于我国葫芦剖判型创世神话,详下。)

关于(四)即三十六之数。其实我国有更古老的传统。现列数证:一是已有刘汉尧指出:我国远古曾有一种十月太阳历,即把每年分为十个月,每月三十六天(每年共360天,尚余5-6天作闰日)。这种历法又把两个月合为一个时间单位即七十二天,故36、72为我国自古以来常见的数字;^⑫二是据学者研究,在卜辞显示出“三十六旬一周期的五种祭典”,这种周而复始的三十六旬祀体现了“天道运行规则的‘仪式历法’”,^⑬与上述十月太阳历正相一致。在《淮南子·精神训》、《文子·九守》和《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有“天有三百六十日,人亦有三百六十节”,《易·系辞上》也有乾、坤之册“凡三百有六十”之说;三是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陶片上发现,有一种三十六个锥刺的洞组成的等边正三角形图案,刺洞共分八行,每边的洞数均为8,其总数之和正是36。^⑭半坡遗址文物约为七千年前左右的,要说是印度传来的,大概只是天晓得。

除了以上四条“契合之处”,何新先生还从盘古神话与印度古创世神话的“比照”中提取了如下类似的“诸基本要素”,列表如下(前为盘古神话,后为印度神话)^⑮

开辟以前:天地混沌
开辟神诞生:在鸡子中
神变化:日长一丈,成天地
变化过程:先生出气
呼吸:成风云
声音:成雷霆
眼睛:左为日,右为月
肢体:为四极五岳等
血液:为江河

混沌
形如鸡子
身分两段,为天为地
先生出气
气生风
口生因陀罗(雷神)
目生月和目为日月
头为天,足为地,骨为山
流泪为河

(本文删除了“精液、汗、虱蚤”三项)

其中“混沌”、“形如鸡子”已如上述。关于呼

吸成为风云、眼睛变为日月和身躯巨大,《山海经·海外北经》所说“钟山之神”烛阴就是如此,它“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还有《大荒北经》的“烛龙”亦相类似。晋时的《玄中记》重述这一神话时则记为:“北方有钟山焉,山上有石首为人首,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开左目为昼,闭右目为夜;开口为春夏,闭口为秋冬。”不少学者把二者视为盘古的原型,这是很自然的。如刘起轩说:“从烛龙或烛阴成为化成日月、生出四时昼夜的造物主式的神来看,已知和后来所传的盘古神话非常相像,可认定这是我国盘古神话的原形。”^{①⑥}

又有论者引印度的开辟神话:最初“世界唯有水,水以外无他物,水产生出了一个金蛋,蛋又成一人,……实为诸神之祖”,^{①⑦}认为它与盘古神话“十分相似”。无独有偶,1998年印行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篇就有“太一”为宇宙发生之源的说法,认为“太一”首先“生出”一片具体而清澈的水;水在天地万物生成过程又起了关键的辅助作用。^{①⑧}《管子·水地篇》亦云:“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可见早于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已有视水为宇宙万物本原的思想,不必一看到与印度神话有类似之处就咬定它来自印度。

其实,正如茅盾指出的:“和我们的盘古氏故事相类似的开辟神话,世界各民族的神话里尽有”,除了印度的,还列有芬兰、希腊、北美伊罗瓜族的,等等。之所以如此,是“原始人民的信念大概相同,各民族神话常多相似”。^{①⑨}也就是说,世界各民族都生活在地球上,有着类似的生活条件和诞生、进化的过程,并形成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因此,在创世神话方面有类似之处并不奇怪。如:人类在进化过程中都经历一个洞穴居住时期,在发明使用火以前洞穴无疑给人朦胧的感觉;远古先民观察生命运动首先看到的是大量的爬行类、鸟类和鱼类的动物(如蛇、鸟、鱼)都是卵生的,从原始的实践思维出

发,于是许多民族不约而同地产生“宇宙卵”创世神话。因此,我们不能根据某一民族的神话记载在先,就下结论说别的民族的类似神话都是由它流传去的。何况现在已有材料证实:早在印度佛教传入之前的远古时代,在中华大地上从旧石器到青铜时代一直有人类活动,有盘古神话形成的条件。

①笔者尝草拙文初步论述《盘古之根在中华》,载广州师院学报1998年第2期。

②①⑤何新《诸神的起源》,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246页。何新先生关于盘古神话由印度传入的观点,又见其著作《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一书的《盘古神话之谜的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300页。

③闻一多《伏羲考》,见《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④《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语文月刊》,1941年第2卷,第10、11期合刊。又见闻一多《伏羲考》,第55页。

⑤见宋耀良《中国史前神格人面岩画》,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六章。

⑥①⑥刘起轩《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1、78页。

⑦⑧陈建宪《神祇与英雄》,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28、40页。

⑨见萧兵《中庸的文化省察》,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页。

⑩叶名《中国神话传说》,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⑪①③④叶舒宪《庄子的文化解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8—206、335—336、339—340页。

⑫刘汉尧著《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5页。

⑬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⑭庞朴《“太一生水”说》,华南师范大学主办《东方文化》1999年第5期。

⑮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72—74页。

责任编辑:陶原珂

悲凉之雾 遍被华林

——明清家庭兴衰题材章回小说的文化意蕴

□ 朱 萍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98 级博士生, 北京 100875)

[摘 要] 明清描写家庭兴衰的长篇章回小说有六部:《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蜃楼志》。这一系列的作品分三个创作阶段:明朝中后期作品,比较均衡地描写家庭上升期的盛况与家庭衰落时的衰败荒凉;明清之际和清前期作品,略述发家过程,详写衰亡过程;清中期作品,详写家庭走向衰亡的过程以及衰亡原因。从作品结构上可以分为昔日繁盛永不再来与绝处逢生两大类。这一题材的流变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体现了小说作家深切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心态,揭示了封建社会后期整个社会处于没落状态的悲凉的时代氛围。

[关键词] 家庭兴衰 原因分析 明清小说 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8-0122-05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中,从关注个人命运和家庭命运的题材角度去审视,可以看到两种明显的现象:一、宋元明短篇白话小说中大量作品以艳羨的口吻叙述个人发迹的故事,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大众的普遍心态。^①二、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叶的长篇章回小说多以悲凉的笔调描绘各阶层家庭的兴衰历史,体现了这一时期文人们对时代情绪的敏锐把握和对封建制度的深刻反思。前者已有学者专门论述,后者虽然不断有学者进行个案分析或阶段性分析,但至今似乎仍无人就这一现象作出过整体考察和思索。

家庭兴衰题材的小说,是指从“人际关系结构、生活时间和空间结构、生活手段和经济环境结构、文化意识和社会关系结构”^②这五大关系结构,全面展现一个典型家庭的各方面生活,通过一个或几个家庭的兴衰际遇,深刻揭示出特定的时代社会风貌的作品。纵观明清小说史,“真正艺术而完整地”从家庭结构、家庭形态、家庭伦理、家庭演变等方面描写家庭环境”的作品,^③只有六部:《金瓶梅》、

《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蜃楼志》。

家庭兴衰题材章回小说的结构形态

这六部小说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划分为三个创作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明朝中后期,作品为《金瓶梅》,特点是前半部详写家庭上升期的盛况,后半部描写家庭的衰败荒凉,前后对比,发人深省。第二个阶段包括明清之际和清前期,作品有《醒世姻缘传》、《林兰香》两部。其共同特点是略述发家过程,详写衰亡过程,弥漫着浓厚的悲凉气氛,作者的一部分创作意图是抒发今不如昔的无限感慨。第三个阶段是清中期作品有《红楼梦》、《歧路灯》、《蜃楼志》三部,特点是详写家庭逐步走向衰亡的过程,在结局处又稍稍复兴,寄寓了作者向往复兴的殷切期望以及改良社会的某种理想。

从作品内容结构上看,可分为“永绝盛音型”与“笙歌重奏型”两大类。前两个阶段的作品都属于永绝盛音型,昔日的热闹繁盛已随风而逝,永不再来。《金瓶梅》自不待言。《醒世姻缘传》中的晁

家自晁源父子相继去世后,孤儿寡母其实一直处于刁蛮族人和市井小人的窥伺与欺凌之中。虽然在族人哄抢家财和恶邻诈认晁梁为子、昏官糊涂判案这两次重大危机使情势近于不可挽回的时候,晁家都幸运地遇上清官徐大尹的庇护,得以绝处逢生。但这种巧合给人极不可信的感觉。作者如此安排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刻意塑造一个封建社会的女善人——晁夫人的形象,抒发作者心中的理想;二是宣传因果报应思想,在本书为数太多的“恶有恶报”事例之间,安插一个“善有善报”的典型。即便如此,晁家在后半部书中给人的印象也是冷寂凄凉的。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几乎足不出户,不再是大家气象。狄家在娶薛素姐前,家资富饶,善名远播,也是地方上数得着的“中等之产”。娶素姐进门,就开始家反宅乱,怪事叠出。及至素姐气死公婆、逼走丈夫、自己管家之后,在邻人欺负、乡官勒索、师婆诈骗的围攻之下,“甚有主持不住之意”,“家中渐渐的不能度日”,一败涂地。等到狄希陈致仕归家,重整家业,也不复往日气象。况且狄希陈回家后的状况只是三言两语,淡淡一提,目的似乎只为作者得以发两句因果报应的议论:

这狄希陈若不是得了他的前世的良朋超度,仗了菩萨的力量,素姐还有三十年的魔障,搅害得你九祖不得升天,兄弟不能相顾,家业飘零,身命不保,怎能有这般的结果,活到八十七岁善终?④

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晁家、狄家都是由盛到衰、永绝盛音。

《林兰香》的情况比较特殊。从表面上看,耿家继续世袭泗国公,不应当出现衰飒至极的景象。然而作品的后半部却充满了衰飒氛围,耿家的仆人竟然对耿家当初的热闹倍感陌生与倾慕。第六十一回,一场大火毁了收藏耿朗妻妾遗物的小楼,诗文琴剑等物荡然无存。第六十二回仆妇屡屡询问老侍女宿秀:“先前的热闹,可还能说么?”“听说当日,五房各有景致,不知是何样景致?”⑤宿秀就极力夸耀当

年的各处景观。说明当年耿家的景致如今也已荡然无存。宿秀一死,耿家旧事无人知晓。当年因事被逐的李婆、红雨将耿家旧事编演成戏文、弹词,才又流传一时。从这个意义来说,《林兰香》也属于由盛到衰、永绝盛音型的作品。

第三个阶段的三部作品在结尾处都被作者赋予浓重的理想色彩,属于笙歌重奏型。《红楼梦》因前八十回文本和后四十回文本在创作意图和艺术水准上的明显不同,奇妙地同时具有永绝盛音型和笙歌重奏型两大类型的特征。依曹雪芹原意,此书的结局贾家定是一败涂地、“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高鹗的后四十回续书又让贾家起死回生,重沐皇恩,兰桂齐芳,描叙一番盛时重现的前景。《歧路灯》的结尾写谭绍闻立志改过之后,重新“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还完外债,又用王中的菜园里搬出的银两赎回家产,家道开始复兴起来。《蜃楼志》的结尾处,与苏家作对的恶人一一败落,苏吉士因功居官,两个妹夫科考顺利,做官有望,苏家又呈现一派兴旺的气象。

作者对家庭兴衰的关注及其原因剖析

这六部作品的作者都对“家庭兴衰现象及其原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似乎具有自觉的前后承继的关系。这一点,有作品的序跋和文本为证。

《金瓶梅词话序》中有一段话:“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佳人才子,嘲风吟月,何绸缪也;……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⑥从庭院建筑、室内陈设、夫妻生活诸方面描绘家庭在兴盛时期的状况,又指出乐极悲生、盛衰相因的不可避免,通过先盛后衰的今昔对比,营造出浓重的悲叹气氛。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整部《金瓶梅》创作思想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无意中确定了家庭兴衰题材作品结构的基本模式。后来几部作品的结构大都不脱其窠臼。《醒世姻缘传》面对社会伦理、古乡淳风由盛德转向敝败的现象,发出了深沉的慨叹,这种慨叹是通过对两个家庭兴衰过程的细致描写而展示的。《桂兰香》在总体构思上

受《金瓶梅》影响更为明显,同样描写一夫六妻先聚后散的过程。聚时热闹繁华,须臾风流云散。《红楼梦》中流露出作者关注家庭兴衰创作意趣的地方更是比比皆是。《歧路灯》通过书中人物之口,也表达出作者对家庭兴衰的深切关注。第三回谭孝移就说:“我在这大街里住,眼见的,耳听的,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所以我心中只是一个怕字。”⑦在第一〇一回,作者直接出面明确表示这部小说是“家政谱”:“这些善政,作者要铺张扬厉起来,不仅篇幅难尽,抑且是名臣传,不是家政谱了。”表现了作者对家庭兴衰题材的自觉意识。罗浮居士在《蜃楼志小说序》中为小说正名时说:“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小。然则,最浅显、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⑧明言这部是家庭题材小说。

这六部作品都揭示、总结了家庭兴衰的原因。首先是家庭外部原因。1、政治原因。家庭衰亡的原因部分地源于政治不清明,具体说来又各有不同。《金瓶梅》揭露了官官相护、买官卖官、以官欺民的黑暗官场。有西门庆以官欺人,就有韩道国、吴典恩在西门庆死后依官势公然欺主,加速了西门家的败亡。《红楼梦》、《蜃楼志》中的悲剧很大一部分源于政治环境的严酷与官场的倾轧。2、社会原因。道德沦落的社会风气、帮闲地痞的引诱与欺诈,也是促使家庭衰落的重要原因。《金瓶梅》中的应伯爵、《歧路灯》中的夏逢若,都如蛀虫一样蚕食西门庆家、谭绍闻家的财产。《醒世姻缘传》中薛素姐独理家政时遭到乡官勒索、师婆诈骗,更是具体而形象地揭示了促使家庭衰落的社会丑恶现象。3、婚姻制度原因。《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实际上都客观而深刻地揭露了一夫多妻制的罪恶,尽管作者可能对此并没有自觉的意识。

其次是家族内部原因。1、创业人死亡,家人分其财产。《金瓶梅》中西门庆死后,其妾李娇儿、孙雪娥盗财离家,孟玉楼席卷自己丰厚的嫁妆重新嫁

人。家中仆人韩道国、汤来保拐盗巨款。2、创(守)业人死亡,族人分产。《醒世姻缘传》中无耻族人欺凌孤儿寡母、理直气壮哄抢“绝户”家财的场面令人触目惊心。3、创(守)业人死亡,后代不肖。《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中都重笔描叙这一原因。4、家庭伦理崩溃。《醒世姻缘传》中晁源纵妾凌妻、薛素姐殴夫逆姑,都是家庭衰亡的重要原因。《红楼梦》第七十五回贾探春一针见血地指出家庭内部争权夺利的丑态:“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5、家庭经济崩溃。《金瓶梅》中当家人西门庆死亡,孤儿寡母支撑不住门面,只有进项,没有出项,坐吃山空。《醒世姻缘传》中狄家败落也是为此。《红楼梦》中贾家、《歧路灯》中谭家都是由于家中只有挥霍的人、没有守成的人而入不敷出、濒临破产。

对家庭衰亡原因的剖析,表明这些作者不但面对家庭的兴衰际遇发出喟然感叹,而且试图寻找造成这些兴衰际遇的原因,并且在此基础上表达自己的人生观,或者试图开出济世良方。永绝盛音型的作品侧重于表达作者的人生观。《金瓶梅》所体现出的兰陵笑笑生的思想观念比较复杂,从总体上看,似乎有否定人间罪恶现象、提倡归入清净佛门的倾向(以孝哥出家为结局);西周生在《醒世姻缘传》中抒发了民风渐变、今不如昔的慨叹;随缘下士在《林兰香》中表达了彩云易散、霁月难逢、世事如梦的人生观。笙歌重奏型作品的作者则或多或少在作品中开出了济世良方。高鹗在《红楼梦》后四十回中找出的复兴之道是科考奏捷和皇恩浩荡;李绿园在《歧路灯》中开出的救世良方是回归儒教:“用心读书,亲近正人”;庾岭劳人在《蜃楼志》中归结的度世良方是超脱“酒色财气”。

家庭兴衰题材章回小说的文化内涵

永绝盛音型与笙歌重奏型作品对结局的不同处理,是由作者不同的世界观和创作意图决定的。总的来说,这六部作品的作者都能够直面现实,对现

实生活有深刻的认识,在展示人情世故、揭露社会罪恶、鞭笞黑暗势力方面有共同之处。但永绝盛音型作品的作者对时代的悲剧感体味得更为深刻、彻底,面对道德沦丧的社会,认为个人已无回天之力。因此他们按照生活的本身逻辑安排作品的结尾,没有粉饰太平。而笙歌重奏型作品的作者则由于种种原因,在理想的驱使下,给作品拖上了光明的尾巴,违背了他们在作品前半部忠实履行的描摹现实的创作原则。家庭是社会的缩影。这些作者面对着迅速衰落的家庭和社会,痛苦地思索着衰落的原因。他们试图在作品中开出济世良方,借回天之神力,挽回狂澜于欲坠。

高鹗在《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中用科举和皇恩两条道路挽救了贾家的彻底覆灭,这样的安排是不足为信的。自明末清初到康乾年间,科举的弊端已为众多有识之士识破。《西游补》、《三刻拍案惊奇》、《鸳鸯针》、《聊斋志异》中都有深刻的描写。乾隆年间更是出现了揭露、批判科举罪恶的专著《儒林外史》,说明否定科举的思想已经成为优秀文人之间普遍认可的社会思潮。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回书中也对科举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而高鹗竟然逆历史潮流而动,歌颂起科举制度来。他试图利用“兰桂齐芳”的科举途径为贾家设计一条复兴的道路,这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不具有普遍意义,是虚假的。高鹗为贾家设计的第二条复兴道路——“皇恩浩荡”,同样也是虚幻的。《红楼梦》前八十回通过元春省亲时对亲人哭诉的描写,通过贾府当家人贾母等时刻关注宫中情况、始终处于担惊受怕状态的描写,含蓄而深刻地指出“伴君如伴虎”的现实,揭示了“皇恩”的变动不居、不可依恃。这是符合历史现实的。因此,高鹗的安排,只是表达了他的一种善良愿望和迂腐理想。

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的意图在于,以谭绍闻为例,说明以儒家正统思想教育青年的重要性。在他的世界观和创作意图的指导下,作品前半部描写主人公的失足,及由此而引起家庭生活的艰难坎坷,

后半部则描写主人公回头后家庭的重新兴盛。至于这种安排的得失,杜贵晨先生的一段评论相当公允:

作者这样一种卫道的创作意图,极大地限制和损害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一、促使作者虚构了一个“败子回头”的故事,从大的社会环境看,不真实,不典型。归因于个人和家庭、亲友,掩盖了社会根源。二、这样一种创作意图,这样一种对地主阶级前途的强烈希望和信心,也使作者不能专心于生活画面的描绘,不时用抽象说教代替生动的叙述。影响了艺术形象的完整、鲜明与和谐,使作品带有封建修身教科书的气味。⑨

《蜃楼志》的结尾处有一段李匠山的议论:

天下的事剥复否泰,那里预定的来?我们前四年不知今日的光景,犹之今日不能预知后四年的光景也。总之,“酒色财气”四字看得破的多,跳得过的少。……惟吉士嗜酒而不乱,好色而不淫,多财而不聚,说他不使气,却又能驰骋于干戈荆棘之中,真是少年仅见!不是学问过人,不过天姿醇厚耳!若再充以学问,庶乎可几古人。

这段话总结了作品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借李匠山之口,在作品的曲终奏雅之处,明白道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原来庾岭劳人写作《蜃楼志》的意图是:通过对四年中与苏家有种种关系的各色人等命运沉浮的描写,塑造一个接近作者理想的人物——苏吉士的形象,借以表达作者提倡的要“跳得过”“酒色财气”的救世方针。为了贯彻这个创作意图,作者当然要为苏吉士安排一个理想的结局。在作品的结尾处,恶官、强盗、匪友、小人等种种与苏家作对的恶势力,无一例外得到惩处,全都消失不见,苏家竟是生活在理想的真空之中。而促使苏家转运的重要事件是平定妖僧摩刺的叛乱。关于这一事件的描写采用的是二三流的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的笔法,与整部作品呈现出的严谨的世情小说的描写笔法极不相衬,缺乏说服力。因此这个理想的结尾也

是不符合当时现实的,是虚幻的。

从作品的艺术水准上说,笙歌重奏型的作品不如永绝盛音型的作品成就高,⑩个中原因是发人深省的。只有忠实描绘时代的作品,才能够跨越时空,得以广泛流传。明清时期的时代特征是什么?是几千年不变的封建社会君主制度和家庭制度与早已变化发展了的社会现实的严重不协调,以及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给时代带来的浓重的悲剧氛围。杜贵晨先生指出,在“康乾盛世”,“两千多年停滞僵化的中国封建社会腐朽不堪,临近灭亡。对封建末日的预感,这在中国18世纪中叶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当时的文学正是这样一种忧虑和苦闷的产物。”

⑪其实这种现象可以提前到17世纪。

笙歌重奏型的作品虽然在结尾处粉饰了太平,但整部作品的情调仍然是难掩悲凉,而且所有的复兴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复兴,与沦落前的家庭盛况相比仍有天渊之别。原因有两个:一、这些作者的创作态度毕竟都是严肃的,忠实地描绘了自己深切感受到的悲凉的时代气氛。举例来说,高鹗续书与此后出现的大量玄怪无稽的续红之作就有根本的不同。二、时代的悲剧气氛是如此明显与强烈,使人欲掩饰而不能。《醒世姻缘传》极力塑造晁夫人超凡脱俗的“女善人”形象,实际上是力不从心、漏洞百出的。笙歌重奏型作品结尾的虚幻与不可信,都是由于这个原因。

从作品传播的角度看,笙歌重奏型作品不如永绝盛音型作品流传广。《歧路灯》创作于乾隆年间,直到清末及民国初年才有印本,而差不多创作于同时的《红楼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就已刊印,此前的八十回抄本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歧路灯》不如《红楼梦》受欢迎,与作品体现出的迂腐思想有着密切关系。高鹗续书历来号称“狗尾续貂”,被文人学士否定的多,肯定的少,也是为此。《蜃楼志》一直被目为“艳情小说”,它的价值近些年才为学者认识和肯定,它的艺术价值和流传范围事实上比前五部书要小得多。

这一题材的作品以辉煌巨著《金瓶梅》为开山之作,催生孕育了遗世独立的艺术奇葩《红楼梦》,至《蜃楼志》呈现出式微的状态,然后就绝迹了。这一题材在传播过程中体现出读者的选择,说明在当时已有广泛的人群深切感受到了悲凉的时代氛围。越是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时代氛围的作品,越是能够得到读者的肯定与接受。

鲁迅在阅读《红楼梦》时,敏锐地把握到了“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时代衰飒氛围。⑫其实这种氛围不仅体现在《红楼梦》中,也体现在明清时期出现的所有家庭兴衰题材的作品中,“呼吸而领会之者”,也并不独有贾宝玉一人,还有这些家庭兴衰题材作品的作者,和那个时代的所有敏感人士。这就是明清小说中家庭兴衰题材系列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深刻的文化意蕴。

①③潘承玉《论宋元明小说、戏曲发迹变泰题材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复旦学报》社科版1997年6月。

②王启忠《古代小说中复制出的第一个家庭环境》,《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6期。

④本文引用的《醒世姻缘传》原文都出自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⑤本文引用的《林兰香》原文都出自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⑥《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⑦《歧路灯》原文都出自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⑧《蜃楼志》,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下文再一一注明。

⑨《《歧路灯》简论》,收入《歧路灯论丛(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⑩⑪《红楼梦》的情况比较复杂、特殊,前八十回的艺术水准无疑是处于小说史上的最高峰,其无与伦比的光辉几乎淹没了后四十回的瑕疵。

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86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责任编辑:陶原珂

一部有广东特色的军事文化精品

——评介《广东省志·军事志》

□ 史 军

(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641)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8-0127-02

《广东省志·军事志》经编著者13年的辛劳,于1999年11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志是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编修《广东省志》的部署,由省军区组织编写,省军区副政委杨刚(现已离休)任主编。全书共139万多字,既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书,也是一部有广东特色的爱国、爱乡的生动教材。该书的特点是:

信息含量大。首先是时间跨度长,据有关资料记载,广东地区从东汉起便有地方志一类的书出现。而该志时间的上限更早,概述和大事记追溯到秦统一岭南时起,超越了历史的记载,下限大事记至1997年。在这二千多年时间内,广东地区重大军事行动基本都有记载。其次是覆盖面广,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所有门类基本都包含在内(保密者除外),大的方面就列有:军事地理、省军事体制、驻军、重大战事、军治(包括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兵役、民兵、人民防空等,可谓是“宏纤俱备,少有不包”。再次是篇幅大,解放前历朝的

旧志,有关军事的记载都很简单,或称“武备”、或称“兵防”、“兵事”,寥寥数语,缺项断线很多。该志却拥有文字近140万字,照片224张,图32张,是全省已出版的各分志中篇幅较大的一部,也是全国已出版的省级军事志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为军事研究工作和领导决策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

浓郁的广东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从军事角度讲,广东是近代西方列强“叩关索市”最早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民最早举起反侵略旗帜的地方。广东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从太平天国运动,到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其主要领导者和思想理论,无不出于广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与国民党合作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就在广东发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最早建立于广东。党领导的最早的工人、农民武装,是1921年8月中共广东支部在领导广东土木建筑工人罢工运动中所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和1924年5月党在南海县南浦乡成立的农团军。1924年11月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取得孙中山同意,组建的

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则是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军队。从那时起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历经曲折起伏，几十年始终坚持不断，直到广东解放。解放后，驻粤人民解放军又进行了剿匪、保卫海边防战斗以及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民兵建设。上述内容，志书各篇章都有准确的记载，是一部既有浓郁地方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感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材。

有较高的学术、文化品位。新编地方志不同于一般史书，不是史家专著，但也不是简单的史料汇编，它本身也是具有学术性的特殊体例的著述。该志的学术性首先是史料翔实，编纂科学。科学性首先必须是真实性。该志对入志史料均经过“志化”处理，即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偏求正、集散求全的精密加工，使入志史实均“言必有据、言从据出”，并且分门别类，先后有序地进行科学的排比，组合编纂，形成科学的系统结构体系。其次是著述性强，全志有正确的观点统率资料，用资料昭显观点。全志是三级述体，纵贯全书，统揽全书。全书三级述共5万字，梳理了历史脉络，总结了历史经验，指陈得失，彰明因果，揭示要旨，从广东军事演变的角度，展现了整个广东社会兴衰起伏的全貌。全书的表述讲究文采，有一定的文化品位，

努力做到可信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当然，方志不同于小说，它的文采和文化品位，主要表现在文字表述上力求精确、精炼、质朴、淡雅，具有深刻的内涵，有时也适当运用诗、词和文言文中有生命力的词句。如军事地理篇中讲到重要关隘梅关时写道：“唐开元四年（716年），内供奉、左拾遗张九龄命人于此处开凿岭路，从此梅岭山隘即成为广东与内地交往要冲。‘长亭短亭任驻足，十里五里供停骖，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道尽梅关古道之盛。”“关隘两边高峰雄峙，仅有一道通过。有云：‘高攀一线岭，下瞰百蛮天’。‘粤东之有梅岭，犹七闽之有仙霞，川蜀之有剑门，秦陇之有潼关也’。足见其险峻。自古跨越南岭作战，大都沿循此道。”读来如入诗境，恰当地反映了梅关的历史和关隘之险要。

《广东省志·军事志》的编著者甘于淡泊，辛劳耕作，为世修志，为业存史，努力使该志能做到资料精确，体例精当，著述精深，特色精采，文字精练，印装精美，可说是广东省的一部既是军事的又是历史的文化精品。

责任编辑：郭秀文

学 术 研 究

月 刊

2000 年第 8 期(总第 189 期)

主办单位: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地 址: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邮 编: 510050 电话: 020- 83846163

排 印: 番禺石楼官桥彩印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刊 号: ISSN1000- 7326
CN44- 1070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国内总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 64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M 268(北京 399 信箱)

出版日期: 8 月 20 日